结束暴政清单

异议人士将如何赢得21世纪公民抵抗运动的胜利

彼得·艾克曼

彼得·艾克曼的其他出版物

《战略性非暴力冲突：
二十世纪的人民力量动态》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与克里斯·克鲁格勒(Chris Kruegler)合著）
PRAEGER–1994年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世纪的非暴力冲突》
(A Force More Powerful:
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
（与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合著）
ST. MARTIN'S GRIFFIN–2000年

《如何赢得自由：
从公民斗争到持久民主》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与阿德里安·卡拉特尼基(Adrian Karatnycky)合著）
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2005年

《防止大规模暴行：
从国家保护责任到有权协助公民抵抗运动》
(Preventing Mass Atrocities:
From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to a Right to Assist (RtoA)
Campaigns of Civil Resistance)
（与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合著）
ICNC PRESS–2019年

封面：封面上的照片拍摄于非暴力冲突期间，这场冲突结束了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和他的军事盟友在苏丹长达30年的恐怖统治。令全世界专家惊讶的是，凭借早期公民抵抗运动的成功经验，苏丹异议人士熟练地设计并执行了一项致胜战略。

图片来源：拉娜·哈伦(Lana Haroun)

结束暴政清单

异议人士将如何赢得
21世纪公民抵抗运动的胜利

彼得·艾克曼

ICNC
PRESS

《结束暴政清单：异议人士将如何赢得21世纪公民抵抗运动的胜利》
(The Checklist to End Tyranny: How Dissidents Will Win 21st Century Civil Resistance Campaigns)

作者：彼得·艾克曼 (Peter Ackerman)
第一版：2021年9月
ICNC Press出版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600 New Hampshire Ave NW, Suite 710
Washington, D.C. 20037 USA

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
联系人：icnc@nonviolence-conflict.org

©2021 Peter Ackerman
保留所有权利。

ISBN：978-1-943271-50-4

结束暴政的清单

致谢 / 1

1 **简介 / 3**
公民抵抗在反暴政斗争中的角色演变

2 **克服恐惧和困惑 / 19**
异议人士必须知道的五个理念

3 **异议人士如何培养能力 / 41**
清单问题1-4

4 **异议人士如何应对冲突 / 75**
清单问题5-8

5 **异议人士如何增强信心 / 111**
自由清单练习

6 **历史性的选择 / 123**
放任暴政或开启第四次民主浪潮

附录 / 135
研讨会和在线课程评估

表格清单 / 141

图表清单 / 142

照片来源 / 143

照片：2010年茉莉花革命早期阶段，该革命导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 Ali)下台。

致谢

在吉恩·夏普(GENE SHARP)于2018年去世后，最初和我一起踏上“非暴力冲突”之旅的人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结婚49年的妻子，乔安尼·利多姆-艾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强调，为什么加强对非暴力冲突的理解对于维护人权和民主治理至关重要，这是我们一贯共同的价值观。

除了乔安尼的重要鼓励，没有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迪·梅里曼，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清单》的早期版本可以在我与哈迪合著的*《威权主义是否卷土重来?》(Is Authoritarianism Staging a Comeback?)*一书的某个章节中找到，此书是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出版的编辑卷。他与我在思想上的契合和他的贡献在本书的多个方面得以体现。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将*《结束暴政清单》*介绍至ICNC Press进行出版。特别感谢马切伊·巴特考斯基(Maciej Bartkowski)、布鲁斯·皮尔森(Bruce Pearson)、爱丽丝·雷恩(Alice Wren)和莉莲·海瑟薇(Lillian Hathaway)对草稿进行了大量编辑。

感谢许多学者，我在书中援引了他们的著作，也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学者包括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斯蒂芬·祖内斯(Stephen Zunes)、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和伊万·马罗维奇(Ivan Marovic)。

其他审校过本书的人包括亚伦·洛贝尔(Aaron Lobel)、鲁本·布里吉蒂(Reuben Brigety)和汉斯·宾嫩代克(Hans Binnendijk)。

总体而言，他们强化了该本书的内核思想，找出了矛盾所在以及发现了重要的遗漏之处。由于有他们的贡献，本卷的质量显著提高。

左侧：智利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运动，1988年。

人们普遍认为，暴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武力的使用。然而，利用罢工、抵制和大规模抗议等非暴力战术的被压迫民众往往是他们自身解放的最强大动力。

1

第一章

简介：

公民抵抗在反暴政斗争中的角色演变

人们普遍认为，暴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武力的使用。虽然对本国公民使用暴力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但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只要公民不明白如何才能（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破坏暴君的统治基础并迫使他下台，暴君就会一直存在。利用罢工、抵制、大规模抗议和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暴力战术的被压迫民众往往是他们自身解放的最强大动力。

异议人士和其他关注人权、无腐败民主治理发展的人越来越乐于接受这一好消息。但公民抵抗运动的潜力仍然不受重视，因为它产生的前提极大地挑战了关于权力性质的传统假设。政策制定者、学者、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观察者一直高估了暴君依靠暴力操纵民众的程度，他们自认为民众已受控制。与此同时，他们低估了普通人通过战略性非暴力手段破坏暴政、获得权利的能力。

这些观点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出现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将这一认识传播给异议人士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让他们能够拥有无限机会，生活在自由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初到中期，我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战略研究方向的博士候选人。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促使我对非对称作战产生了兴趣。这包括研究军事能力明显落后的对手如何利用包含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高度差异化战略和战术持续作战。我的一门战略理论课程的老师是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他后来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教授被认为是促进美苏对话、减少意外核战争威胁方面的杰出学者。

在一次讲座结束后，我找到了谢林教授，与他讨论军事能力较差的一方如何才能在冲突中战胜军事能力较强的对手。他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为什么军事资源较差的一方会获胜，那么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没有军事资源的一方该如何获胜呢？

谢林教授向我介绍了吉恩·夏普，夏普即将发表他标志性的三卷研究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夏普思想的核心凝聚于一篇关于权力的论文，它可以追溯到埃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1576年出版的*《甘愿奴役论》(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这是一本长达几个世纪的著作。德·拉波埃西写道：

> *只要下定决心不再为人奴仆，你将立刻获得自由。我并不是要求你推翻暴君的统治，而只是不要再支持他。那样你就会看到他，像一个失去基座的巨型雕像，跌倒在地，粉身碎骨。*[1]

1 埃蒂安·德·拉波埃西，“甘愿奴役论”，《埃蒂安·德·拉波埃西全集》(Oeuvates Complètes d'Etienne de La Boétie)（巴黎：J. Rouam & Cie, 1892年）：第12–14页，引用于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第一部分：《权力与斗争》(Power and Struggle)*（马萨诸塞州波士顿：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 1973年），34。

以下是夏普这一观点的当代版本：

> *从政治角度讲，非暴力行动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之上：人们并不总是按他人要求行事，有时他们也从事被禁止的活动。被统治者可能违反他们所反对的法律。工人可能停止工作，这可能使经济瘫痪。官僚机构可能拒绝执行命令。士兵和警察可能会在镇压群众时有所松懈，甚至会反叛。当所有这些事件同时发生时，曾经是“统治者”的人变成了普通人。这种权力的解体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冲突中。*
>
> *当人们拒绝合作、拒绝帮助、坚持反抗和斗争时，他们就等于剥夺了对手的基本人力援助与合作，这是任何政府或等级制度都需要的。如果人民反抗的状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政府或等级制度将不再拥有权力。这就是非暴力行动的基本政治假设。*[2]

对我来说，接触夏普的作品是一个关键的启发时刻。在接下来的45年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非暴力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无法质疑其准确性或革命意义。

在同一时期，我逐渐认识到用准确的术语描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夏普使用的是“非暴力行动”一词，而我用的是“公民抵抗”。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我更喜欢“公民抵抗”这个词的部分原因在于它降低了人们将其与“非暴力”概念混淆的风险。“非暴力”指的是道德立场，而“公民抵抗”指的是使用非暴力方法的冲突战略。

“非暴力”指的是道德立场，而“公民抵抗”指的是利用非暴力行动赢得权力的战略。

这一领域术语混淆的另一个例子是使用“抗议运动”一词作为公民抵抗的同义词。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公民抵抗包含了除了大规模抗议之外的许多战术，其中包括罢工和抵制，这些战术在非暴力行动的历史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示例请参见表1，非暴力行动术语：解释）。

2 吉恩·夏普(Gene Sharp)，*《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第一部分权力与斗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t One: Power and Struggle)*（马萨诸塞州波士顿：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1973年），63。

表1

非暴力行动术语：解释

非暴力行动最常用的同义词是**公民抵抗**和**非暴力冲突**。较少使用的同义词是**人民的力量**、**非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抵抗**，

“非暴力冲突”一词强调了一种反直觉的思想，即非暴力战略和战术可以成功地用于对抗装备精良的警察和军队。

从十多年前开始，“公民抵抗”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非暴力冲突的同义词。

其他被认为是公民抵抗运动同义词的术语实际上是混乱的根源。其中包括：

和平的异议，意味着平静的想法，而非暴力战术旨在破坏现状以消除暴君的合法性。

抗议运动，唤起数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戏剧化画面，但没有任何公民抵抗运动仅用抗议就取得了成功。需要一系列代表精心设计战略的不同战术。

战略性非暴力是一种拒绝暴力的伦理、道德或宗教戒律，可能会提醒我们伟大的道德领袖，如莫罕达斯·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然而，公民抵抗运动的许多领袖可能愿意采用暴力战术，如果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他们的事业。相反，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们选择保持非暴力纪律作为制胜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社会正义运动可以采用许多相同的战术，但其目的是通过倡导改变公众对气候变化、刑事司法改革、反种族主义或同性婚姻等具体问题的看法。胜利并不一定导致权力关系的永久调整。相反，所有公民抵抗运动的目的都是通过破坏具体对手的权力基础来击败对手，特别是在控制整个人口方面。

在本卷中，**公民抵抗运动(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一词与**公民抵抗运动(civil resistance campaign)**一词互换使用，因为两者都表示人类活动出于共同目的，在一段时间内的多个阶段表达。**异议人士**一词被用来指代与专制压迫的有害影响进行斗争的公民。这些影响包括法治精神的扭曲、腐败、人权的丧失以及其他威胁生命和自由的系统性不公正。这些人也被称为**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这些术语将互换使用。

暴政一词与**独裁**、**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几个词互换使用。这些政治制度的领导人被称为**暴君**、**独裁者**、**威权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控制社会上的权力杠杆，导致其公民人权受到系统性侵犯。

这里有必要区分**公民抵抗运动**、**战术**和**战略**。**公民抵抗运动**从异议人士的角度描述非暴力冲突的整个历史。**战术**描述暴力和非暴力主角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采取的行动。**战略**是战术对对手产生最大累积影响的关联。

有关非暴力行动一词的更多解释，请参阅哈迪·梅里曼和尼科拉·巴拉奇-尤瑟菲(Nicola Barrach-Yousefi)的*《公民抵抗术语表》(Glossary of Civil Resistance)*，可从ICNC 网站下载。

夏普的创新将为增强对公民抵抗的理解带来巨大的益处。*《非暴力行动方法》(The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全册介绍了198种方法(或战术),现收录在他的开创性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的第二卷中。[3]如果没有这份清单(以及之前的其他清单),非暴力行动将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为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在实际冲突中提供实用的建议。[4]

如今,夏普列出的方法中有11种被证明可能对暴君统治最具破坏性:

- 团体或集体请愿
- 抗议或支持集会
- 退出社会机构
- 消费者抵制某些商品和服务
- 下属政府单位故意降低效率、选择性不合作
- 生产商的抵制(生产商拒绝销售或以其他方式交付自己的产品)
- 拒绝支付费用、会费和摊款
- 更多罢工手段(工人逐个罢工,或按地区罢工;零敲碎打)
- 经济停摆(工人罢工,雇主同时停止经济活动)
- 留守罢工(占用工地)
- 行政系统负荷过大

在夏普的指导下,我撰写了题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战略》(Strategic Aspect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Movements)*的博士论文,并于1976年成功完成论文答辩。

---

3 吉恩·夏普(Gene Sharp),*《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第二部分非暴力行动方法》(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t Two: The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马萨诸塞州波士顿: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 1973年)。

4 请参阅克里希纳勒·施瑞达拉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没有暴力战争:甘地策略及其成就的研究》(War Without Violence: A Study of Gandhi's Method and Its Accomplishments)*(纽约: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9年);以及马丁·奥本海默(Martin Oppenheimer)和乔治·莱基(George Lakey),*《直接行动手册:民权和所有其他非暴力抗议运动的战略和战术》(A Manual for Direct Action: Strategy and Tactics for Civil Rights and all other Nonviolent Protest Movements)*(伊利诺伊州芝加哥:Quadrangle Books, 1965年)。

我的论文灵感来自谢林教授六十多年前的作品,*《作为国家防御手段的公民抵抗:反抗侵略的非暴力行动》(Civilian Resistance as a National Defence: Non-violent Action Against Aggression)*,*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谢林教授观察发现:*

> *暴君和被统治者处于某种对称的位置。被统治者可以拒绝暴君的大部分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形成纪律的组织来拒绝合作的话,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暴君可以拒绝被统治者所想要的一切—他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部队来拒绝他们。这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局面,任何一方如果有足够的纪律和组织,都可以拒绝对方的大部分要求;谁赢谁输还有待观察。*[5]

根据谢林教授的说法,公民抵抗者所选择的战术有成本和收益,威权主义反对者所使用的战术也是如此。赢家是那些为自己一方最有效地分配这些成本和收益的人。成熟的公民抵抗者希望制造干扰,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方阵营的背叛人数,最理想的情况是使用相对较小的干扰造成大量背叛现象的战术。成熟的威权主义者需要采取强制服从手段,通常是通过暴力,并且最理想地希望使用最少的暴力来达到最大程度的服从。背叛与服从的累积集合决定了谁赢谁输。

我想更全面地了解谁赢得了公民抵抗运动以及获胜的原因。

借鉴谢林教授的观点,我希望将公民抵抗的研究领域从权力研究(即确定哪一方实力最强)扩展到战略研究(即确定哪一方获得最多)。我想更充分地了解谁能够赢得公民抵抗运动的胜利及其原因。这样做的目的从来不是创建一个预测模型,而是强调那些可能有利于任何一方的特征。我的论文比较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案例:1905—1907年的第一次俄罗斯革命,以及特别强调1929—1931年的印度独立运动。

5 托马斯·克伦比·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关于公民防御的一些问题"(Some Questions on Civilian Defence),*《作为国家防御手段的公民抵抗:反抗侵略的非暴力行动》*,编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Stackpole Books, 1968年),第304页。

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是一次没有领导的自发的大规模非暴力起义，但是它在第一次杜马（议会）的创建中取得了一次反抗沙皇的胜利。不幸的是，这场运动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所笼络。随后，它演变成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零星暴力行为，这些暴力行为很容易被沙皇军队镇压，杜马（议会）也被解散。

印度独立运动由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领导，甘地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能够联合印度教和穆斯林迫使英国人离开印度。在他的创造性领导下，1930年食盐长征动员了2.5亿印度人。诸如对达拉萨纳盐矿的非暴力袭击等相关干扰迫使总督直接与甘地进行谈判。

这两种结果的巨大差异取决于每一组异议人士所做出的三个不同的决定：是否统一、是否计划和执行各种战术，以及是否保持非暴力纪律。

在俄国革命中，三项决定的答案都是“否”，而在印度独立运动中，三项决定的答案都是“是”。这些决定是异议人士自己做出的，而不是由他们反抗的威权主义者来决定的。而且，也不可能争辩哪一个威权主义者（俄罗斯沙皇还是印度总督）在保护自己的地位方面更有技巧，因为两者都被非暴力冲突事件搞得头晕目眩。因此，可以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印度人发动非暴力冲突的技能优于俄罗斯人；其次，谢林教授正确地指出，面对威权主义者，最“有纪律和组织”的异议人士最有可能获胜。

这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导致事件发生的社会科学争论：结构（即条件）或能动性（即技能）。

在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的战斗中，技能是决定谁赢得非暴力冲突的主要因素。

我认为，在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的斗争中，技能是决定谁赢得非暴力冲突的主要因素。绝大多数所谓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个结论荒谬可笑，因为每个暴君都拥有武器。但想想它的含义：如果先验条件优势无法预测异议人士的成败，那么他们发动公民抵抗运动的技能就变得至关重要。实际上，他们可以从非暴力冲突开始前一直到结束时重新划定似乎强加给他们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向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和其他相关选民传达这个充满希望的消息是我职业生涯的主要承诺。

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充足。从莫罕达斯·甘地时代到美国民权运动，从冷战时期东欧民主斗争再到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各国历史都是由公民抵抗运动塑造的。近几十年来，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巴林、布基纳法索、埃及、格鲁吉亚、危地马拉、香港、伊朗、黎巴嫩、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克兰、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一代运动和领导人。

其中许多国家的公民非暴力动员削弱了暴君的统治实力，扭转了民主倒退的局面，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增强了社会恢复力，保障了妇女、少数群体和其他受威胁群体的人权。虽然并非所有运动都能成功或巩固成果（如巴林或埃及），也有一些运动仍在进行中（如伊朗、缅甸、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但大量历史证据表明公民抵抗运动是从威权主义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最大推动力。暴君不会公开这么说，但这其实是他们最害怕的情况。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弱点）是他们试图统治和镇压的民众发起的在战略上稳健、广受欢迎和持续稳定的公民抵抗运动。

吉恩·夏普相信，公民抵抗运动曾经并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反暴君行动中发挥作用，而我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1983年，我们成立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AEI)，向在战火中面临压迫风险的异议人士传播这方面的知识。

认识到我们的最佳选择是推广关于如何有效发动公民抵抗运动的一般知识和观点，所以我们没有给出具体的战术建议。让异议人士“先在这里罢工，然后在那里抗议”，这样太危险了。每一场非暴力冲突的战略和战术都受到其国家文化、宗教、经济和其他因素的独特影响，而这些因素只有本土领导人才能理解。在提供建议之前，我们承认自己对他们的战场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暴力对手的意图和能力。

从左到右：彼得·艾克曼、吉恩·夏普和立陶宛国防部长奥德留斯·布特凯维丘斯(Audrius Butkevičius)拍摄于维尔纽斯，1991年。

然而，我们偶尔涉及冲突领域是为了帮助非暴力抗议者。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是1991年我们访问立陶宛，会见了总理和国防部长。俄罗斯军队最近进入该国，在维尔纽斯主要电视台的一次对峙中，立陶宛有150多人受伤。反对派想要一种能够替代武装防御的战略，以对抗他们担心迫在眉睫的全面入侵。

今天，立陶宛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完善的计划，进行大规模公民抵抗运动来反对可能发生的外国入侵。

在这次会面以及随后的许多其他会面中，我遇到了那些认为他们反抗独裁者的胜率很低的异议人士。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热切地寻求建议，想知道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最佳的非暴力战略。

除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我还支持制作了几部关于公民抵抗的电影。其中一部是艾美奖提名的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是该纪录片的主要内容顾问。它于2000年9月在美国公共电视(PBS)全国播出，讲述了六个非暴力抵抗的故事：

- 20世纪30年代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
- 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
- 1980年代中期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
- 20世纪40年代早期丹麦抵抗纳粹占领
- 80年代智利工人反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统治
- 1980年波兰独立工会和民主权利团结运动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背后要传达的信息是：尽管这些冲突发生在不同的大陆，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中，它们都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它们揭示了如何将非暴力战术结合成为连贯完整的战略，从而瓦解对手的权力，哪怕对手是最具压制性的威权主义者。

我参与制作的第二部电影《*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于2002年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播出。它讲述了号称“巴尔干屠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如何在群众组织的公民抵抗运动中被迫下台的故事。与群众的观点相反，他完全失去了权力，毫无抵抗之力。

《*推翻独裁者*》在2002年荣获皮博迪优秀纪录片奖(Peabody Award for documentary excellence)，同年被国际纪录片协会评选为当年最佳纪录片。与另外两部获奖的公民抵抗纪录片结合起来，这些影片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和方言。[6]观看人数达到数百万人，覆盖100多个国家。

6 《*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记录了2004年的乌克兰事件，《*埃及：被中断的革命?*》(*Egypt: Revolution Interrupted?*)记录了2011年埃及革命前后埃及发生的事件。所有影片均可从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icncfilms/免费播放。

这些电影的成功证实，人们对公民抵抗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EI)准备解决的问题。夏普希望AEI主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我则希望在创造和向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传播知识方面采取积极行动。2002年，我成立了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以支持该领域的原始研究和知识共享，从而推进符合《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民主治理。

ICNC的变革理论基于这三部分模型：

图1：ICNC的变革理论

这一模式强调知识更丰富的异议人士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存在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它还承认，如果要改变暴政，就必须勇于面对、敢于挑战。暴政造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不人道的恶劣环境，导致了广泛的暴力、死亡、灾难、失控的疾病、贫困、无知和腐败。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重新调整独裁者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公民抵抗使民众在与暴政作斗争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功，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生命损失。数据研究表明，公民抵抗最有可能带来稳定的民主转型，从而带来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

此外，公民抵抗运动比普遍认识到的要频繁得多，本世纪至今已有150多场新运动涌现，其中包括2010年至2019年间开始的95场新运动。在同一时期，新的公民抵抗运动数量远远超过新的暴力起义数量（请参见图2）。

然而，存在一个矛盾：尽管公民抵抗已成为世界各地首选的解放战略，但其成功率却大幅下降（请参见图3）。

图2：1900-2019年的非暴力和暴力群众运动（每十年的情况）

来源：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非暴力抵抗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第31卷，第3期（2020年7月）：第69–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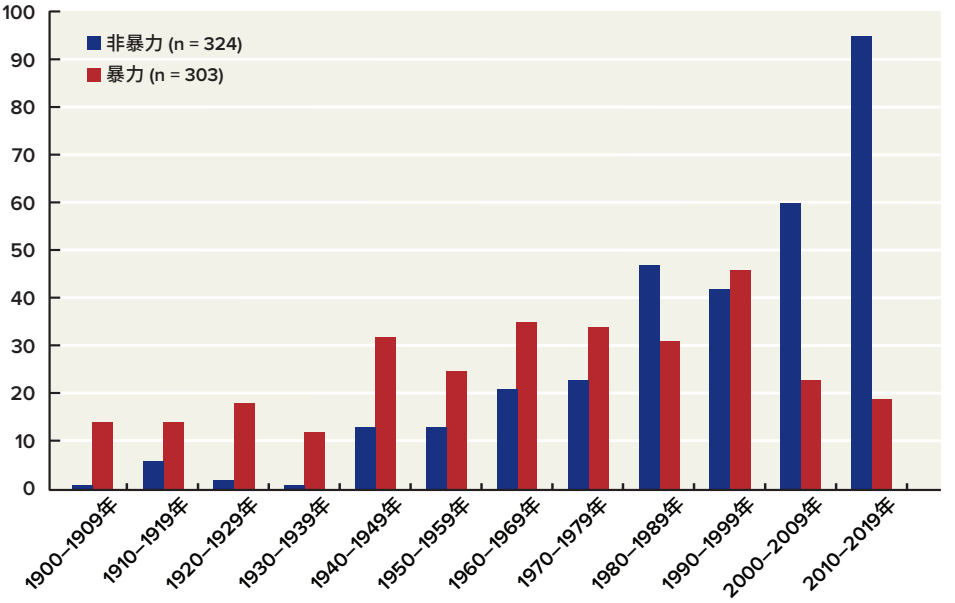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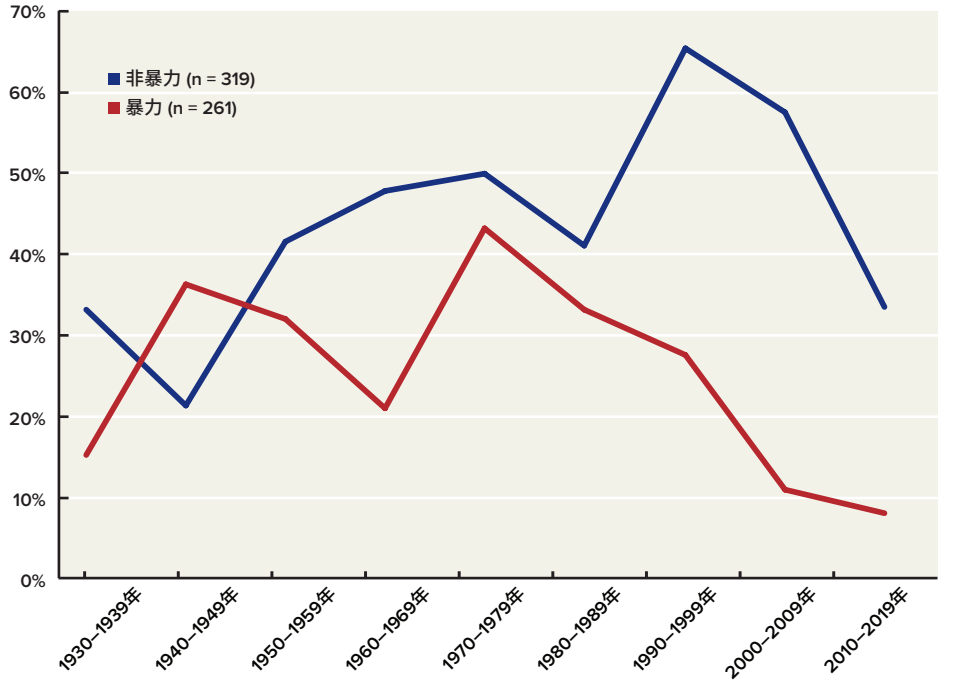


图3：1930-2019年的非暴力和暴力群众运动的成功率（每十年的情况）

来源：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非暴力抵抗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第31卷，第3期（2020年7月）：第69–84页。



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在应对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对其权力发起挑战时，独裁者提高了他们的技能。比如，暴君更加善于破坏异议人士的团结，在其内部煽动暴力，从而减少公众对非暴力冲突的参与。他们也更加善于利用尖端技术限制隐私和压制个人自由。

成功率下降的第二个原因是向那些致力于公民抵抗的人提供的教育和培训与非暴力运动的频率不匹配。事实证明，公民抵抗运动的信息对异议人士仍然是宝贵的，他们面对暴君的最大障碍是困惑和对如何规划和执行致胜战略缺乏信心。

不幸的是，目前掌握公民抵抗知识的异议人士数量只是现有需求的一小部分。

医生或士兵等职业专业人士接受广泛的教育和培训以磨练他们的技能和专长。这使他们能够在高度紧张和敌对的情况下正常发挥并获得成功。相反，异议人士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不是公认的职业人员，因此在教育或职业基础设施方面几乎或根本得不到支持。

因此，如果今天的异议人士想在公平的环境中与威权主义者竞争的话，找到提高其技能水平的新方法就至关重要。本卷致力于加强异议人士在挑战暴君及其盟友的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希望*《结束暴政清单》*能够提供新的创新方式，大幅增加有能力领导并赢得公民抵抗运动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数量。实现这一目标将重新调整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的权力平衡，并将成为点燃全球民主运动成功浪潮的关键因素。

右侧：2004年乌克兰基辅的橙色革命示威者。

УКРАЇНА
Так!
Так!
ТАК!
ТАК!
ТАК

非暴力冲突最好理解为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的权力竞争。当一场公民抵抗运动结束时，将会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这取决于哪一方有更高超的技能。

2

第二章

克服恐惧和困惑：

异议人士必须知道的五个理念

在过去十八年中，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加快了向全球公众传播公民抵抗知识的步伐。通过电影、研讨会、讲座和研究推广，我们与异议人士、学者、媒体专业人士、外交政策专业人士、公职人员和国际NGO团体成员进行了互动。我们的网站(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是一个关于公民抵抗的全球信息交流中心，将各种资源翻译成70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份清单会持续扩展（请参见表2）。

最重要的是，我们与来自各大洲10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异议人士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大量接触（请参见图4）。

我们预期的影响是表明广泛传播关于公民抵抗的知识如何减少冲突中致命的暴力，改善没有腐败和支持基本人权的民主统治的前景。

这些活动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得到认可。签署人包括：波兰团结运动领袖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他本人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托马斯·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研究世界民主状况的杰出学者；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第一任海军军官；以及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牧师，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战略家，1960年纳什维尔午餐台静坐活动的组织者。

表2：ICNC资源库中的74种语言

阿方奥罗莫语	克里米亚鞑靼语	希伯来语	库尔德语	挪威语	泰米尔语
阿姆哈拉语	克罗地亚语	印地语	吉尔吉斯语	普什图语	泰卢固语
阿拉伯语	达里语	匈牙利语	拉脱维亚语	波兰语	泰语
亚美尼亚语	荷兰语	印度尼西亚语	林加拉语	葡萄牙语（巴西）	藏语
阿塞拜疆语	英语	意大利语	立陶宛语	葡萄牙语（欧洲大陆）	提格雷尼亚语
俾路支语	爱沙尼亚语	日语	卢干达语	俄语	土耳其语
孟加拉语	波斯语	景颇语	马其顿语	塞尔维亚语	乌克兰语
白俄罗斯语	法语	坎纳达语	马达加斯加语	信德语	乌尔都语
波斯尼亚语	格鲁吉亚语	克伦语	马拉雅拉姆语	斯洛伐克语	乌兹别克语
缅甸语	德语	高棉语	玛雅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加泰罗尼亚语	古吉拉特语	基隆迪语	孟语	瓦希里语	科萨语
钦语	海地克里奥尔语	吉土巴语	蒙古语	塔加洛语	
汉语		韩语	尼泊尔语		

我们的经验是，无论来自何处，生活在暴政下的异议人士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作为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他们有三个选择，其中两个要么令人不快，要么充满未知风险。典型的异议人士已经拒绝了消极或默许丧失自由现状的选择。除了少数例外，他们也没有信心发动暴力起义。一些人已经卷入了一场失败的暴力起义，并希望考虑其他战略。

这就剩下了公民抵抗的第三种选择，异议人士持有两种近乎矛盾的信仰。首先，他们相信非暴力抵抗运动可能是他们赢得自由和权利的最后希望。其次，他们怀疑自己的独特环境是否让公民抵抗运动徒劳无功。最重要的是，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急切地寻找可以相信的思想，而与所有形式的竞争一样，信心是清晰思考、果断行动和保持韧性的关键。无论是异议人士还是暴君，只要他们的战略可行，就有可能在非暴力冲突中胜出。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次接触时，向异议人士传达五种不同的理念至关重要，以减少恐惧，创造战胜暴政对手的积极期望。

*我们(下述签署人)……为*2014年和平奖*进行提名,这是一个分享如何追求*无暴力正义*知识的首要组织。该组织由学者积极分子组成,在过去11年里,该组织以有形的成果、细致的学术和可靠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加强、深化和扩大了*可靠、实用信息*的传播。简单地说,我们提名的是一个让全世界都能够理解*非暴力行动*的团体……理念不会无师自通,人们只有在接触到经验丰富的实践者、思想家和可用的*最佳材料时*,才能最有效地学习理念和实践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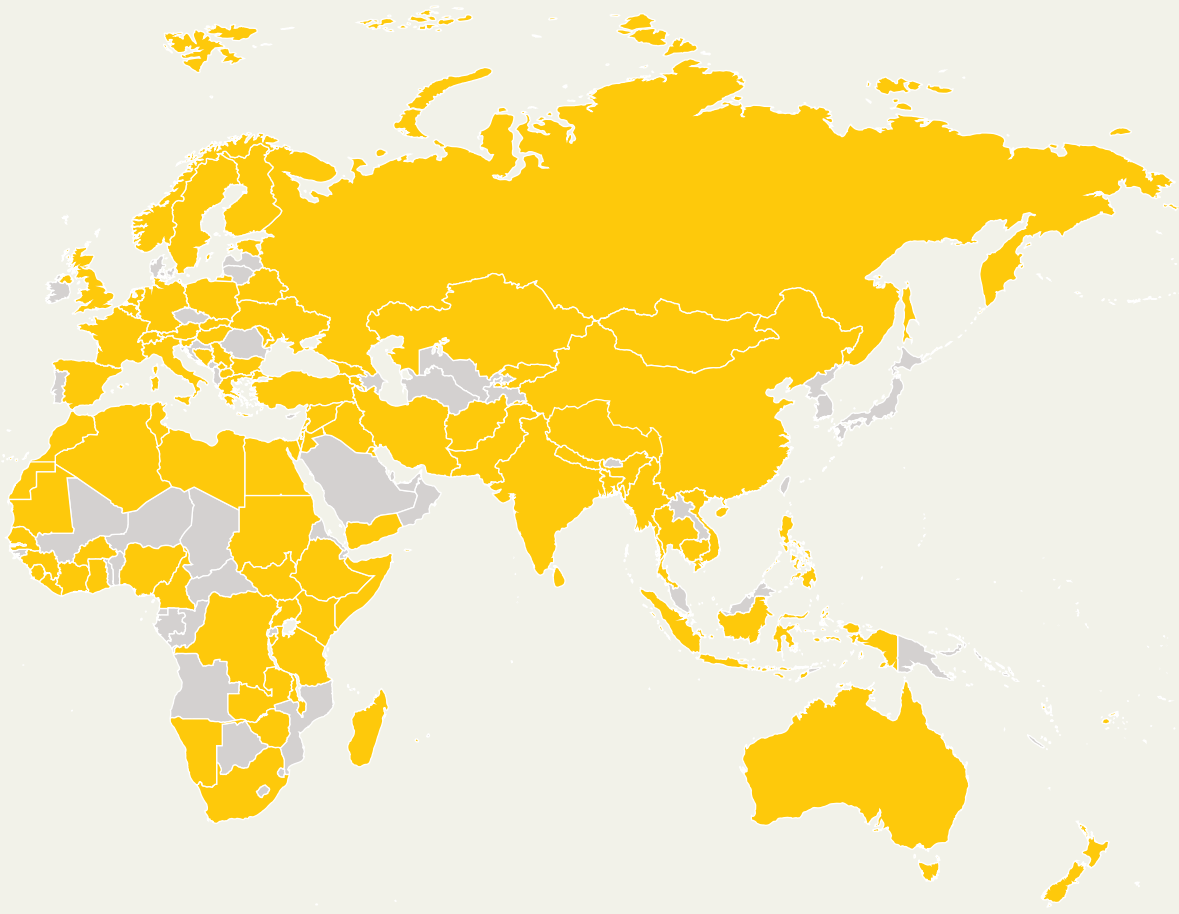
ICNC*在21世纪对公民抵抗运动的动态、*有效战略*和最佳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和全球性教授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我们相信,在过去十年中,*公民抵抗知识*传遍世界的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原创作品。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条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国家内部的*和平扩张*的重要全球战线就不会以如此有组织和持续性的方式出现。*

签署人:莱赫·瓦文萨、托马斯·谢林、拉里·戴尔蒙德、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詹姆斯·劳森等

图4：ICNC的全球影响力吸引了各国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新闻记者参与其中

该地图指出ICNC至少有一名参与者亲自出席了为期至少四天的现场研讨会或研讨会的国家和地区（以黄色表示）。多年来，在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ICNC与参与者进行了多次接触。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白俄罗斯
比利时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西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缅甸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科特迪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几内亚（科纳克里）
希腊
危地马拉
海地
洪都拉斯
香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科索沃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其顿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尔代夫
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
摩尔多瓦
蒙古
摩洛哥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俄罗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索马里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坦桑尼亚
泰国
西藏
汤加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联合王国
美国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西巴布亚
西撒哈拉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图4：ICNC的全球影响力

表4

异议人士必须知道的5个理念：

1. 异议人士应该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安慰：他们走的道路很多人以前都走过，将来也会走。

2. 异议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具体冲突环境并不妨碍他们成功。

3. 基于暴力战术的战略获胜概率很低，因为它们通向胜利的途径有限。相反，拒绝暴力战术和保持非暴力纪律创造了更多的获胜途径。

4. 公民抵抗运动是民主转型最可靠的推动力。

5. 为提高成功机会，异议人士可以做的最重要事情是发展他们组织、动员和抵抗的技能，这样他们就比那些威权主义对手更优秀。

理念 1

异议人士应该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安慰：他们走的道路很多人以前都走过，将来也会走。

过去，关于公民抵抗的个案研究并不总是随处可见。例如在1976年，我的论文是对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十六年后，我的第一本书《*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的人民力量动态*》比较了六个案例。2000年，我的第二本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个世纪的非暴力冲突*》仅研究了十三个案例。

2007年，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开始资助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和结果(NAVCO)数据项目的开发，该项目促成了2011年获奖著作《*公民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 violence Conflicts*)，作者为埃丽卡·切诺维斯和玛丽亚·斯蒂芬。[7]该书分析了1900年至2006年间的106个非暴力运动案例，并定量地肯定了在挑战残暴政权时，公民抵抗相比于暴力起义的优越性。

自2011年以来，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和结果数据项目记录了持续增加的非暴力冲突案件，截至2019年底共计325起。该数据库是开源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轻易地找到与自己产生共鸣的类似案例。[8]该项目还扩展到包括日常活动内部观察，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短期互动如何影响活动的方向。累积起来，总数据条目以百万计。

《*公民抵抗为何有效*》一书的出版在全球范围内为非暴力冲突这个研究领域创造了巨大的信誉和兴趣。此外，它所依据的数据证实了开始公民抵抗运动的决定是明智的，但不是独特的。

---

7 《*公民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获得2012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颁发的关于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的最佳书籍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8 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和结果数据项目目前由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主办，网址：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navco。

理念 2

异议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具体冲突环境并不妨碍他们成功。

特别是外交政策专业人士经常提出的观点是：非暴力抵抗只能在温和或略有争议的对手面前取得成功，在贫穷或充满种族分裂的社会中也无法取得成功。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失败、智利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以及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一直被忽视。最近的例子包括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倒台、突尼斯的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和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21世纪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这些专制政权都不能说是温和或不愿使用严厉镇压甚至大规模屠杀。这些国家都没有经济增长。这些案件还包括具有高度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

一些怀疑论者回应说，“你肯定认为像朝鲜或中国这样的极权政府不会轻易倒台，对吗?”首先，任何暴政的倒台都绝非易事。其次，重要的是要记住，暴政并不总是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即使在外部人士看来是在掌控局面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也会被削弱。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当暴政持续下去时，他们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当他们倒台时，他们的倒台突然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第三，独裁政权的寿命取决于暴君是否有能力制定保持权力的战略。对于朝鲜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都不是静态的或封闭的，否则为什么这些政权需要如此多的压迫性措施来让人民听话呢?在这样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公民抵抗的早期阶段可以从放松暴君对民众的控制开始。一波又一波的非暴力冲突会增加获胜的可能性。

这些定性例子得到定量分析的支持。2008年，自由之家组织发布了一项名为*《公民运动和民主转型动态的有利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s for Civic Movements and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的研究报告，研究了1975年至2006年间67次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统治过渡中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及其对公民抵抗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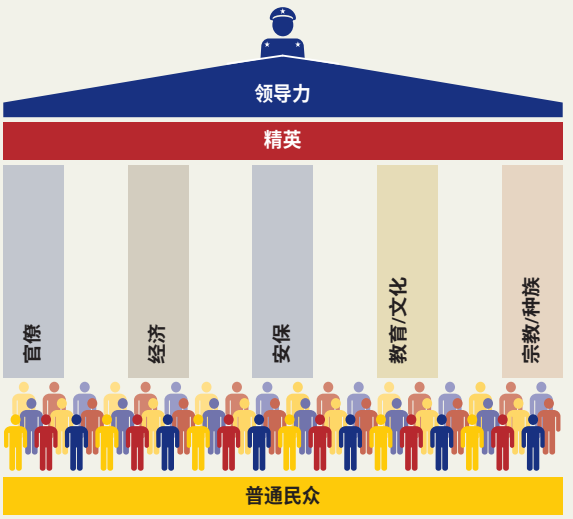
在该研究中，无论是政治因素还是环境因素，对于公民抵抗运动的成败，都没有任何统计学意义。公民运动在较不发达、经济贫穷国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与在发达、富裕社会一样大。这项研究也没有发现任何重要证据表明种族或宗教两极分化对形成团结的公民反对力量有重大影响。政权类型似乎也没有对公民运动获得广泛支持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9]

理念 3

基于暴力战术的战略获胜概率很低，因为它们通向胜利的途径有限。相反，拒绝暴力战术和保持非暴力纪律创造了更多的获胜途径。

这一结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基于定量研究。关于结构原因，请参见图5，其中人口分为四部分。首先是最高层领导阶层，他们是政权暴政的最大受益者。第二个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他们让领导层有机会执行他们的压迫性使命。第三个是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支柱。支柱因国家和文化而异，唯一不变的是代表

图5：战场共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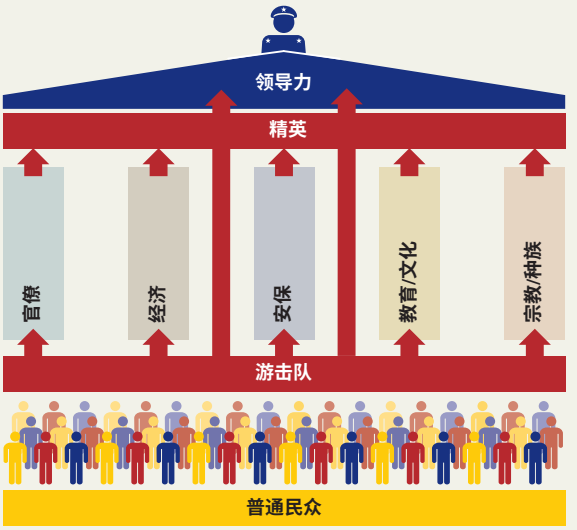
这“战场”图表也用于在清单问题 1 中描述公民抵抗的基本策略。

9 埃莉诺·马尔尚(Eleanor Marchant)和阿奇·普丁顿(Arch Puddington)，*《公民运动和民主转型动态的有利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s for Civic Movements and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华盛顿特区：Freedom House, 2008年7月），第1页。

安保部队的支柱。第四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中的一些公民负责维护和服务支柱。另一些人则在较难识别和控制的非正规的社会领域工作。

在暴力起义理论中(如图6所示),发动游击队杀死那些维护支柱的社会关键成员。然后他们杀害精英,直到安保部队无法再保护领导人为止。

图6:暴力起义: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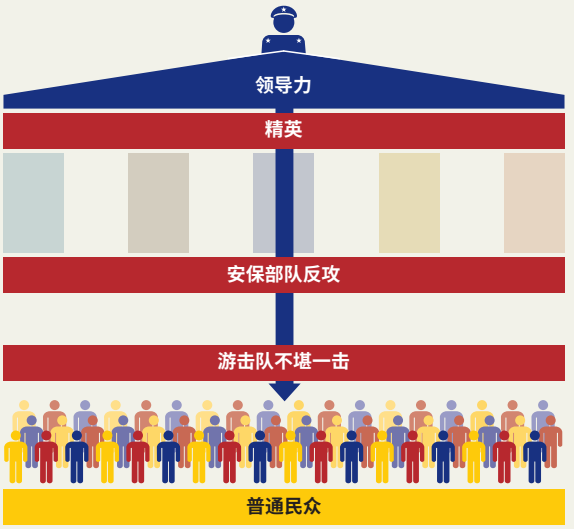
通常,在如此暴力的情况下,没有完整的政府团体来谈判权力移交。如果起义取得胜利,暴君及其追随者必须逃亡,叛乱分子就得以掌权。

图7显示了武装起义战略充满风险的原因。暴力起义分子通常在军事上对暴君的安保部队不利。除非暴力起义分子取得早期重大胜利,否则他们的军事能力将迅速恶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暴君的安保部队就会包围马车以保护他们的关键支持者并进行反击以消灭暴力起义分子。

当然，负面影响最大的将是普通民众，他们会受到武装斗争的巨大附带性伤害。此外，一场失败的暴力起义可能使民众沉寂数年，使他们不愿采取任何抵抗措施，包括任何依靠非暴力手段反对暴君。

许多案例的数据证实了暴力起义相对来说是徒劳无益的。有几点值得我们考虑：

图7：暴力起义：风险



- 在过去120年中，非暴力冲突的成功率至少是暴力起义的两倍。
- 成功的非暴力起义平均持续时间为三年，成功的暴力起义则为九年。
- 暴力起义期间大规模杀害一千名或更多的公民抵抗分子的可能性大约是公民抵抗运动期间的三倍。

- 与暴力起义推翻暴政相比，一场胜利的公民抵抗运动成功过度为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要高出九倍。
- 即使公民抵抗运动失败，在未来五年内仍有35%的机会成功过渡到民主政治。这种恢复力与失败的暴力起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五年后几乎不可能成功。[10]

这一数据清楚地表明，在反抗暴君的暴动中实施暴力是不理性的，公民抵抗运动的风险回报率要好得多。

理念 4 | 公民抵抗运动是民主转型最可靠的推动力。

学者乔纳森·平克尼研究非暴力冲突前后的民主状态。在他的研究中，*《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在群众非暴力起义后建立民主》(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他确定，无论一个国家处于过渡前的民主治理状态如何，由公民抵抗运动产生的政治转型最有可能带来民主结果（请参见图8）。平克尼总结道：

> *统计证据有力地支持非暴力抵抗发挥了强大的民主化作用的观点。这种作用不能用有利条件来解释。公民抵抗在一些最恶劣、最专制的政权中发生并取得成功。这不是万能之计，像一个国家的地区政治环境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样的因素在决定民主化可能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极端不民主的国家，公民抵抗也会极大地影响一国的政治转型，导致民主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1]

这一发现对异议人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也与全球当中关于如何推进和保护民主的假设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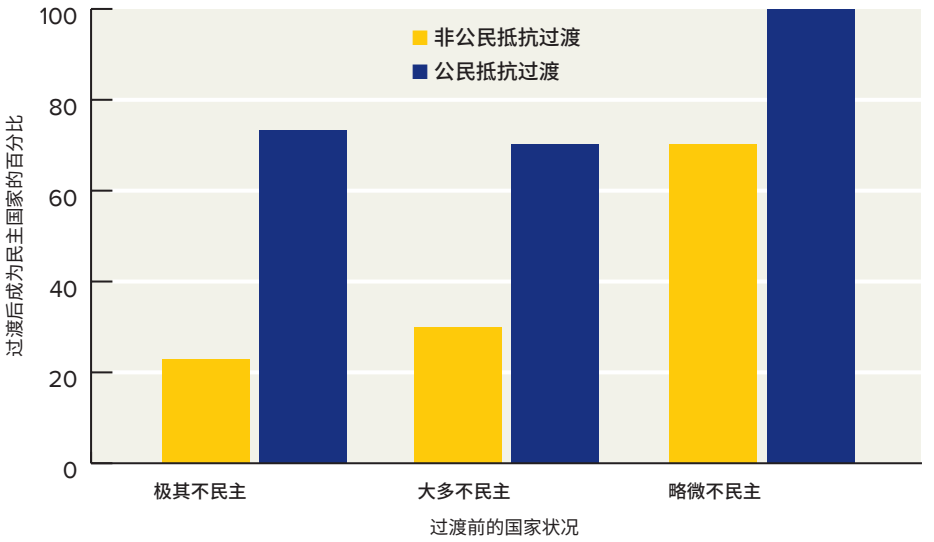
---

10 请参阅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的*《防止大规模暴行：从国家保护责任到有权协助公民抵抗运动》(Preventing Mass Atrocities: From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 to a Right to Assist (RtoA) Campaigns of Civil Resistance)*，讨论这些数据要点，该书可从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免费下载。

11 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在群众非暴力起义后建立民主》(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18年），第40页。

图8：过渡前的民主水平和过渡后的民主水平

来源：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在群众非暴力起义后建立民主》(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18年），第40页。



理念 5

为提高成功机会，异议人士可以做的最重要事情是发展他们组织、动员和抵抗的技能，这样他们就比那些威权主义对手更优秀。

公民抵抗运动最好被理解为异议人士（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和暴君之间的权力竞争。当非暴力冲突结束时，技能的高低将决定谁胜谁负。

通过类比，想想任何体育赛事，无论是网球、摔跤、篮球还是足球。如果双方都有夺冠的强烈愿望，那么两个人或球队会在准备比赛时试图超越对方。在每一项重要运动中，会投入数十亿美元来为为运动员及其教练提供住宿设施。

以退役四星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等军事人物堪称典范的职业生涯为例。他曾担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指挥海军驱逐舰、驱逐舰中队和航母战斗群作战。当我问上将，他受训的时间与指挥时间的比值，他的回答是“6比1”。此外，教育和培训时间几乎完全集中于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和中期。斯塔夫里迪斯上将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和其他著名的战争学院。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他获得了弗莱彻

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国际事务博士学位。

有没有人认为异议人士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所受的训练与行动的比率差不多?是否有受人尊敬的机构专门负责在可预测的职业道路上提高异议人士的能力?大多数公民在刚刚离开或从事一项无关的职业后承担异议人士的角色。在对暴君进行公民抵抗之前所获得的领导才能哪去了呢?暴君最大的资产不是他的军事实力;而是他在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中散布恐惧和困惑的能力。结果可能是当迫切需要公民抵抗运动时,民众会处于被动消极状态。

通过了解本章的五种理念,异议人士可以为深入学习公民抵抗运动打下基础。

ICNC在创造机会为异议人士和民主积极分子提供教育,以便增强他们对公民抵抗运动的理解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为期5天的研讨会和7周的在线课程一直是ICNC针对公民抵抗运动的高级跨学科研究的关键教育形式。自2006年以来,我们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参加这些活动(请参见图9背面)。

在这些会议期间,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的积极分子、学者、新闻记者、非政府组织成员和政策界都进行了密切合作。他们都追求能够深入理解公民抵抗运动的形成、组织、战略、动员、建立联盟、沟通、选择战术、谈判和创造变革。这些课程由著名国际学者和过去公民抵抗运动的老兵教授,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外部行动者在支持或镇压公民抵抗方面的作用、民主转型的挑战以及在运动中用来应对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的战略。

按来源地分类的 ICNC在线课程参与者

图9：按来源地分类的ICNC在线课程学员

当谈到这些研讨会的质量时，很多事情都利害攸关。在与这么多异议人士进行多年的接触后，我们观察到暴君最大的资产不是军事资源。反而是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不得不应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可变因素很容易导致他们的混乱、冷漠和分裂，从而给暴君带来巨大的好处。对抗非暴力冲突的环境是复杂的，公民抵抗者（需要基层人员和基于联盟的协作，将一系列战术安排成制胜战略）往往会感到迷茫。赌上了人民的生命和自由，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会造成暴君所希望的消极局面，也会助长暴君坚不可摧的幻觉。

这就是为什么反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ICNC了解项目参与者如何响应所获得的知识和支持。为此，ICNC收集了数百份由项目参与者、受赠人和合作者完成的书面和口头评估。以下是一些关键发现：

表5：参与者评估的主要结果

- **ICNC的教育计划和内容在非政府组织领域独一无二，它非常有用，与大多数参与者参加过的其他任何培训或研讨会不同。**
- **根据ICNC的计划和拨款，参与者表示，他们：**
  - **a. 更积极地参与公民抵抗和运动组织；**
  - **b. 运用他们在实践领域学到的知识；并且**
  - **c. 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其他人。**
- **在活动中相遇并共同学习的参与者之间出现了长期协作和团结网络。**
-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人权而进行的公民抵抗运动是由ICNC的项目和赠款支持产生的。**

请参见附录，其中提供了其他评估数据和往常的五天日程。

一些重要专家也给予了肯定，包括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詹姆斯·劳森博士，他组织了20世纪60年代纳什维尔午餐柜台静坐活动。劳森博士在过去60年里培训了数千人，曾在几所大学任教，最近赢得了国会金质奖章：

我想这是一个我常希望能够建立的能动性。它在传播、宣传非暴力斗争、非暴力行动、公民抵抗等现象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过去100年任何一次都要多。它做了更多的工作，让人们认识到他们面对当今世界做出的选择，我们如何斗争，如何抵制错误，并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选择并非空中楼阁，这是在过去120年中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的具体工作中描绘出来的。

劳森牧师出席了2016年的研讨会，并表示ICNC的工作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和西方文明中最关键的工作，不接受反驳”。

毫无疑问，这些研讨会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课程设置的亲密性（或者在线课程的深度）和课程的透彻性。同来自该地区许多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面对同样的希望和恐惧，学生们能够增强信心。

但在研讨会或在线课程结束后，异议人士回到祖国战火中又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对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满意，但是他们参加这些研讨会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知识。他们的活动表明，没有数千名也有数百名同胞可能依赖从讲习班获得的信息。因此，观点必须清晰、直截了当，并且能够准确、轻松地传播，以便那些不在场的人也能有效地利用该观点。

因此，不应低估这一点以及其他与知识共享和应用有关的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崛起，非暴力民主运动数量急剧增加，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两种趋势同时存在，解释了为何异议人士对教育援助的需求激增。而教育援助会使他们的运动更加强大。

这就需要在没有ICNC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也能传播信息，并使信息可以运用于日常生活。为此，应该向异议人士提供更多工具，支持他们成为自己的教育者和教练。第5章中描述的“自由清单练习”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创性方法。本练习的基础是一份包含第3章和第4章所述八个问题的清单。

清单问题为异议人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基础来评估其竞选活动目前的竞争力状况。它们可以帮助指出优势、劣势以及需要重点和调整的关键领域。在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面临多重要求的环境下，这样的分析可以大大降低失败的可能性。《清单》可以帮助异议人士摆脱迷茫，增强信心，指引前进的道路。

清单揭示了公民抵抗运动如何以及为什么失败或获胜，以及如何找出替代战术途径。

《清单》中的八个问题分为两类："培养能力"和"应对冲突"。它们旨在产生一种主观反应，不是当前状况，而是未来的动力。每个清单问题的选项均为"是"或"否"，但随着非暴力冲突的展开，其强度会有所不同且会不断变化。

异议人士以及有组织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团体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应认真考虑。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这么多可变因素在起作用，结束暴政清单太简单化了。他们可能会说，未来非暴力冲突中的关键决策需要关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独特因素。

《清单》并不主张忽视冲突中的具体因素。相反，《清单》促进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范围内了解这些因素。该清单应向异议人士揭示他们的公民抵抗运动如何以及为什么失败或获胜，以及如何找出替代战术。

制定一份以帮助公民抵抗运动、打击暴政为目标的清单绝非易事。如果考虑不周，它可能会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

然而，在许多复杂的领域（如多用途房地产开发或诸如航空和急诊医疗等生死问题）清单已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表6

结束暴政清单：

培养能力

1.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本着理想、领袖和获胜战略来团结大众？
2.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同时使其战术选择多样化？
3. 公民抵抗运动的战术使用顺序是否基于破坏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4.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发现了让外部支持更有价值的方法？

应对冲突

5. 面对暴政的公民数量和多样性是否有可能增加？
6. 暴君对暴力镇压效果的信念是否会减弱？
7. 暴君关键支持者中的潜在背叛者是否会增加？
8. 冲突后的政治秩序是否可能与民主价值观出现一致？

正如使用清单的其他学科一样，非暴力冲突的风险也很高。那些参与公民抵抗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冒着生命、财产和目前存在的自由的危险。为了做出有效决策而必须处理的信息可能会令人感觉极其复杂。《清单》将集中于冲突中重要的长期可变因素，减少对不那么重要但往往非常明显和情绪化的短期因素的依赖。

1960年，美国纳什维尔，学生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静坐。

关于这一点，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研究了检查单在各种情况下的重要性，他写道：

> *清单似乎能够避免在出乎意料的任务中取得失败，从而保护所有人，甚至是有经验的人。它们提供了一种认知网络系统。它们抓住了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精神缺陷—记忆、注意力和细心严谨的缺陷。*[12]

> *在真正复杂的条件下，即需要的知识超过个人的知识范围，并且处于不可预测的支配地位时，[有效的清单]确保简单但关键的东西不会被忽视，并且确保人们顺利交谈和协调合作，以便处理他们所知道的细微差别和不可预测性。*[13]

这八个清单问题是具有普适性的，与任何非暴力冲突都有关。但它们决不能被理解为成功的公式或与之混淆。同样，《清单》无法确定异议人士和暴君谁胜谁负。但是，它可以提供一套关键且持续的指标来了解公民对自由的需求是如何（或没有）克服专制政权根深蒂固的权力的。

一般的清单问题将产生非常具体的答案，这些答案基于只有当地异议人士才能知道的、外部人士不一定能理解的最佳信息。此外，根据冲突的具体情况，并非所有八个清单问题在任何给定时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清单的答案从“否”改为“是”的重要性可能会随着暴君带来的具体挑战而上升或下降。

这些问题有助于将公民抵抗运动获胜的概率最大化。异议人士以及有组织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团体在回答问题之前应认真考虑。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动员数百万人起来战斗。如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可见第5章“自由清单练习”。这项工作的最大价值是与人民就行动的重点方面达成共识。这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保持较高的期望。与此同时，民众保持自信可以粉碎独裁者想要制造冷漠绝望情绪的企图。

---

12 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清单革命：如何持续、正确、安全地把事情做好》(The Checklist Manifesto: How to Get Things Right)*（纽约：Picador，2009年），第47页。

13 葛文德(Gawande)，第79页。

公民抵抗战略在许多不同的冲突中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因为暴君依靠广泛服从来继续掌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生活在独裁政体下的公民拒绝永远保持冷漠。

3

第三章

异议人士如何培养能力

清单问题1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本着理想、领袖和获胜战略来团结大众？

公民抵抗运动成功的主要特征是团结。“分而治之”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上各地暴君的格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种条件下受到压迫的人不容易团结起来。对于大多数公民抵抗运动来说，如何实现团结这一内部挑战可以决定何时才能让暴君处于下风。

公民抵抗运动中的团结有三个方面：

- 渴望
- 领导力
- 战略

■ 渴望

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消极地等待，寄希望于政权能够自行发展，逐渐变得更加温和，同时紧紧抓住在压迫下生活中所剩无几的人类价值；要么发动暴动，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推翻独裁统治。

对于那些选择暴动的人来说，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必须与卷入冲突的风险相平衡。这些渴望可以用“摆脱”或“自由”来表达。

“摆脱”是抵抗暴政最危险特征的保护伞，包括暴力事件、肆意拘留、资产没收和与之相关的威胁。“自由”是人类发现和成就的各种可能性，包括不受审查的言论、不受限制的旅行、私人创业和宗教表达。

社会上的人口群体中，可能存在着对“摆脱”类别的共同向往。然而，由于每个个体、不同文化或宗教群体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自由”类别的类型和强度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实现这些愿望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跨性别、年龄、种族、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高参与率。

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团结渴望并不要求对渴望进行严格鉴定或要求人民观点一致。不同的团体未必都同样致力于公民抵抗运动，但只要他们都支持和参与到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运动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关键是每位异议人士在后暴政社会所渴望的东西并不与他们的同僚所渴望的东西相对立。要求是相互容忍双方的愿望的不同性，而不是一致性。

在公民抵抗运动的高潮中，人们或许要与他们不熟悉的人合作。如果有人怀疑某些异议人士暗藏威胁他人的野心，那么竞选活动就会受到影响。然而，非暴力战术的成功实施（需要共同承担风险并协调行动）将会有助于增强信任、消除怀疑。

■ 领导力

从长期看，如果领导者无法增强团队信心，那么尊重愿景的多样性也就无从实现。异议领袖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不同群体为公民抵抗运动共同努力。要做到这一点，领导人必须满足民众的期望，即领导人拥有能够获胜并化解发动非暴力冲突风险的战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公民能够忍受暴君的残酷和腐败。由于没有暴君会愿意放弃权力，从而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与暴君进行重大权力重组的必要性，而这一点会让实现团结变得更加容易。

尽管暴君善于分而治之，但挑战他们的领导人必须更善于实现团结。这就要求公民抵抗运动领导人必须深刻了解他们动员的目标人群的不满和价值观。领导人的有效沟通必须与普通人的个人经验和感受产生共鸣。即使前景黯淡，也能号召他们继续参与非暴力抵抗运动。

与作战的军队不同，公民抵抗运动对动员人口没有正式的指挥和控制权力。因此，必须以公民认为与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相当的方式组织和执行战术决策。另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是，愿景相同的公民对风险的容忍度可能大不相同。领导人也必须意识到这种矛盾。

战术决策必须以公民认为与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相称的方式组织和执行。

每个公民抵抗运动的领导层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运作方式。一些领导层可能采取等级制度，而另一些则采用更加分散的制度。大多数领导层两者兼具，这反映出每一次公民抵抗运动中不同的领导特征。对于每一个名义上或有魅力的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有许多地方领导人需要培养在代表整体发展联盟、谈判和凝聚不同群体利益方面的高超技能。来自一个国家不同地理区域、代表不同群体的不同领导人在不同规模（地方或国家）下共同努力才能保持长期团结。

每种领导风格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甘地的魅力领导力是团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反对英国统治的唯一途径。按照当时英国的要求，进入谈判的条件便是甘地单方面中止1930年的食盐运动。在这一情形下，公民抵抗才得以暂停。然后甘地亲自前往英国兰开斯特与英国人谈判。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并正确预测甘地暂停行动将消散势头。这样一来，当地警察也不可能背叛。

与甘地不同，伊朗的绿色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有着同样的不固定的领导风格，在最初几个月也走上了同样的轨迹。在这两个例子中，早期的权力主要来自街头抗议活动。香港异议人士建议抗议者“成为像水一样的人！我们是无形式的。我们没有形状。我们可以流动。我们可以崩溃。我们就像水！”[14]

这种无定型领导力有两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因为摸不透抵抗者的踪迹，暴君无法彻底镇压抗议运动。其次，正是这种领导形式的自发性抓住了意料之外的机遇，从而点燃并激发了全体人民的愤怒情绪。

另一方面，无定型领导层的问题在于它难以实现战术选择的多样化和排序整合。随着大规模抗议等单一战术的效果逐渐减弱（随着暴君完善防御手段），抗议者的信心也随之减弱。更糟糕的是，随着抗议者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恐惧，反对暴力统治的力量可能无法团结起来。

非暴力冲突展开的时间越长，对结构化领导力的需求就越大。否则，一场公民抵抗运动就会退化为随机行动，效果会逐渐减弱。

如果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觉得这些领导人乐于接受他们最好的理念，他们就更有可能支持协调领导力。成功的活动将实现一个开放的沟通循环，跨区域的人们可以向领导决策者持续提供意见。关键是保持对方各地区的持续努力和信任。

14 Mary Hui, Twitter帖子, 2019年6月25日晚上11:07。
https://twitter.com/maryhui/status/1143717367521824768。

在国家层面，一场运动的所有支持者试图决定该运动的主要战略方向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明智的。相反，由最高领导层决定特定地区的具体战术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公民抵抗运动应该考虑到冲突各方的环境、威胁、机会和能力。在地方层面，没有人比在这些社区生活和组织起来的异议人士更了解这些因素。

这种基层影响力为公民抵抗运动创造了机会和挑战。它使运动能够根据当地最准确的信息采取行动。但不能保证这些积极分子会做出与公民抵抗运动总体战略目标一致的战术决策。无论是政府、军队还是企业，这是所有大型组织都面临的问题。然而，与其他实体不同，公民抵抗运动不能为服从者提供加薪和晋升，也不能为解雇或制裁违抗者。公民抵抗运动毕竟是一种自愿的努力，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因此，公民抵抗运动依赖于无形的激励让人们团结起来，引导他们在运动致胜策略的总体范围内采取行动。

最重要的是，每个民族的权力运动都受到其公民文化的影响，包括他们在艺术、宗教、种族习俗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偏好和规范。公民抵抗运动的文化在影响其如何向暴君施压方面至关重要。文化可以激发团队合作、实现包容、执行问责和制定纪律。这推动了战略思维而非反思行动的高质量发展。运动文化就像DNA。它提供了一个印记，使非暴力运动在没有高度集中的指挥和控制的情况下更容易运作。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倾向实现最大化的民众参与率。

■ 战略

如果团结需要领导者有能力满足人民结束暴政愿望，那么它也需要受到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致胜理论。

随着本世纪非暴力冲突频发，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更需要了解人民权力的成败的原因。非暴力冲突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况，因为它利用了两个基本现实：第一，威权主义者的政权依靠受压迫民众的广泛服从来维持其控制；第二，并非所有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每个人都同样坚定地保持忠诚。图10所示的战场与第2章所示的战场相同，用于描述暴力起义战略的风险。

图10：战场共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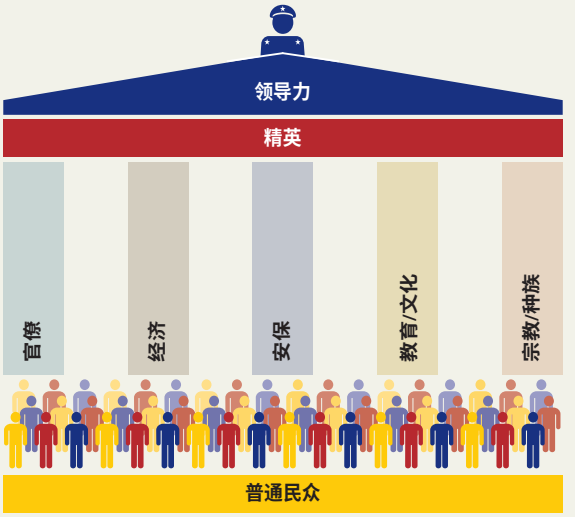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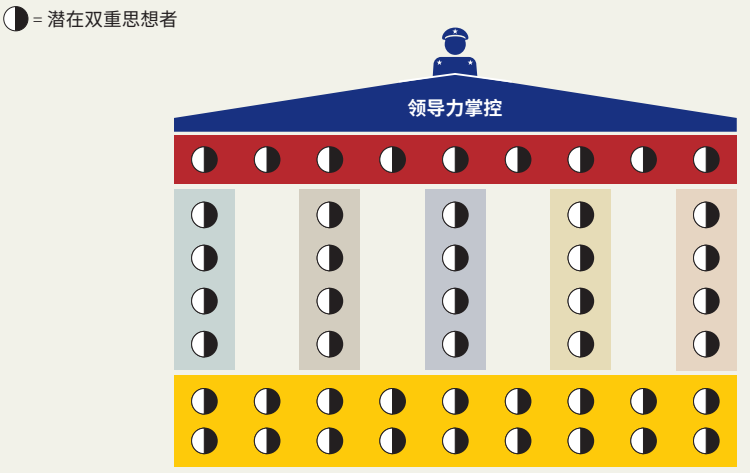


图11所示的机会由来自俄罗斯劳改营的著名异议人士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描述。

> *每个极权主义社会都由三个群体组成：真正的信仰者、双重思想者和异议人士。在每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中，无论其文化或地理环境如何，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从对革命信息的真正信仰转变为双重思维的过程。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但因为害怕所以不敢这么说。还有异议人士，他们是敢于跨越双重思维和一切事物的界限的先驱。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内化，然后表达和最终作用于这个国家的内心。*[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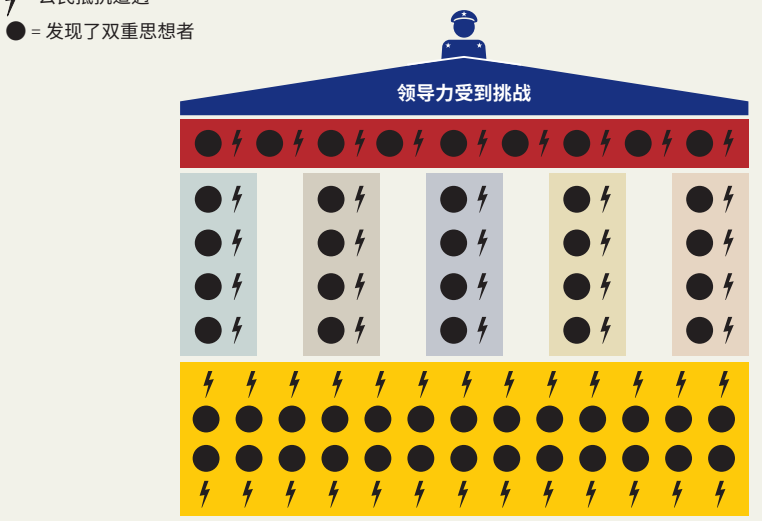
15 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街头智慧(Street Smar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9年6月26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la-xpm-2009-jun-26-oe-sharansky26-story.html（2021年7月8日访问）。

图11：机遇



双重思想者可以从“潜伏”转向“公开”，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背叛者。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挑战暴君对国内安宁和合法性的要求。通过多次战术交锋，它将潜在的双重思想者（指的是那些具有同情心但不愿冒险，因此常常隐藏起来的人）变成了公开的双重思想者（那些不再完全忠于政权的人），然后变成了背叛者（那些已知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盟友）。

图12：公民抵抗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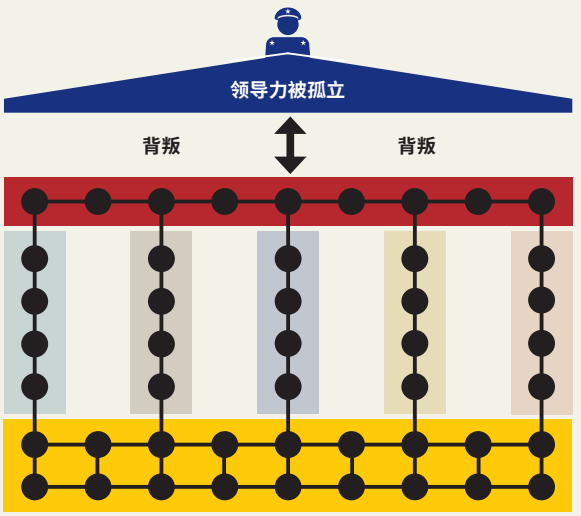
在图12中，公民抵抗的战术破坏了现状，双重思想者从潜伏走向公开。随着这一趋势的加速，暴君更难维持其不可战胜的光环。

图13中，公民抵抗运动获胜。双重思想者不断涌现，变得更加活跃，与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在一起。人们更容易看到他们与暴君的分歧，包括公开支持或加入抵抗运动。随着联系的深化和扩散，背叛者队伍不断壮大。最终，暴君和他的统治基础陷入混乱，从而导致合法性和影响力的急剧丧失。结果要么是暴君彻底退出，要么是就新的权力共享安排展开谈判。

当战术干扰累积到一定程度，激发更多背叛者时，非暴力冲突就会获得成功。公民抵抗运动的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战术选择，这也留下了许多通往胜利的方法。然而，盲目选择战术而不考虑其影响将破坏团结。如果没有持续规划流程来评估他们的表现、根据弱点进行调整，人们不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

图13：公民抵抗获胜

● = 双重思想者联合起来诱发背叛；领导权随波逐流。



公民抵抗运动是暴力反抗的最佳选择，因此没有比如何对抗残酷的专制政权更重要的决定了。就像2011年至今的叙利亚那样，误判这一战略可能导致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16]

清单问题2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同时使其战术选择多样化？

在公民抵抗运动中战术的实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目的是给暴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造成损失。

在公民抵抗运动中，战术上的具有无限可能性。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这一范围是无限的，因为战术选择来自如何破坏暴君对社会各方面可接受的公民行为的期望。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伤害为目的的战术不属于非暴力冲突。他们属于暴力起义战略。非暴力战术可以增强暴力战略能力，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

吉恩·夏普列出的198种方法是50年前创建的，那时还是一个更为简单的时期。在当今日益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关闭暴君期望控制的普通商业和社会机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公布了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创建的346种战术列表，其中包括夏普的198种原始战术。[17]

下面是41个公民抵抗运动事件，它们是非暴力战术的具体例子。

16 请参阅马切伊·巴特考斯基(Maciej Bartkowski)和朱莉娅·塔勒布(Julia Taleb)，“叙利亚斗争的缺乏远见和重要教训”(Myopia of the Syrian Struggle and Key Lessons)*摘自《威权主义是否卷土重来?》(Is Authoritarianism Staging a Comeback?)* 马修·杰·伯罗斯(Mathew J. Burrows)和玛丽亚·杰·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华盛顿特区：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2015年)。https://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 Authoritarianism _ Chapter10.pdf

17 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21世纪公民抵抗战术》(Civil Resistance Tactics in the 21st Century)*(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21年)。

表7：41次使用非暴力战术的公民抵抗运动

非暴力运动	地点	年份	关键非暴力战术
1. 反对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总统的微笑革命	阿尔及利亚	2019–2020年	每周的抗议示威；学生罢工（学生罢课）；全面罢工；妇女发起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广场”；工人罢工并关闭交通系统；大规模抵制总统选举
2. 反引渡和支持自治运动	香港	2019–2020年	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占领大学校园和公园等公共空间；全面罢工；劳工罢工；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大规模静坐；形成一条50公里长的“人路”，受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非暴力独立运动期间组织的波罗路的启发，该路被称为“香港之路(Hong Kong Way)”；选举组织，在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阵营取得压倒性胜利，投票率创历史新高
3. 反对奥马尔·巴希尔总统的革命	苏丹	2018–2019年	示威；全面罢工；士兵庇护反对政权安保部队的抗议；为纪念领导起义的妇女而举行的抗议；向武装部队总部游行；静坐；持续罢工
4. 反对强制要求穿戴希贾布（穆斯林妇女出门戴的头巾）的妇女运动	伊朗	2018–2019年	妇女站上公共电箱，在公共场所摘下头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她们的行动照片；男子加入抗议，重新上演类似的行动并将其发在社交媒体上
5. 天鹅绒革命	亚美尼亚	2018年	抗议游行穿过亚美尼亚多个城镇；在首都主要广场静坐；群众游行；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成员加入抗议；封锁街道；工人罢工
6. “你很臭！”运动	黎巴嫩	2015–2016年	高喊抗议；滑稽口号；将政治人物与垃圾危机联系起来；首都街头抗议
7. *Ficha Limpa*组织（“清洁记录(Clean Record)”）运动，制定反腐败法案	巴西	2008–2010年	通过社交网络定期发出警告，呼吁采取具体行动；在线请愿以支持反腐败法案；向立法者发送电子邮件、拨打电话；电子请愿摹因；推文；视频
8. 为反腐败委员会辩护的运动	印度尼西亚	2009年	流行歌手创作了反腐败歌曲；请愿；传单；挂横幅；静坐；在警察局前集会；音乐会；街头剧场；公共表演；偶发艺术，如“为了健康的印尼，打击腐败”，为国家的福祉举行群众性活动
9. 打击警察贪污活动	乌干达	2009–2019年	与执法当局就反腐败运动与警察之间的合作制定谅解备忘录；社区监测警察行为；举办道德培训讲习班，并在培训结束时签署警察廉正承诺；收集关于过去六个月是否有人向警察行贿的信息调查；与居民举行会议，讨论警察行为守则和报告警察滥用职权和腐败

非暴力运动	地点	年份	关键非暴力战术
10. 反对专制君主制的民主革命	尼泊尔	2006年	一般地区和全国性罢工（*总罢工*）；游行；示威；包围政府大楼；大规模抗议；学生领导的抗议和示威
11. 社会审计反腐败运动	肯尼亚	2005年	举办社区论坛，教育人们了解公共项目及其预算编制过程；收集社区需求方面的投入；收集公共项目进度、质量和成本方面的信息；检查公共项目；与居民和官员举行公开听证会；木偶戏，用幽默的方式嘲弄和羞辱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
12. 民主观察站(Shayfeen)（“我们在观察你(We See You)”）反腐败活动	埃及	2005年	推出广受欢迎的网站shayfeen.com；标志为一只眼睛，暗示人们关注着当局腐败情况；分发10万个带有民主观察站标志的茶杯和25万个装有标语的面包塑料袋：“我们在观察你，在选举中我们正观察着你”；拍摄投票过程，收集舞弊证据
13. 反抗叙利亚军队和统治国家机构的独立起义	黎巴嫩	2005年	公开葬礼和葬礼抗议；为“真相”举行集会；在首都烈士广场设立永久抗议营地；民众自愿捐款维持广场帐篷营地；非暴力积极分子侵占国歌和国旗；没有展示党旗；大规模抗议
*14. 反保护费组织(Addiopizzo)*在西西里打击黑手党的（“再见保护费(Goodbye Protection Money)”）运动	意大利	2004年	巴勒莫灯柱贴纸活动：“支付*保护费*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民族”；在栏杆和桥梁上悬挂写有反黑手党标语的纸张；在足球比赛中展示一张“团结起来反对*保护费*”的纸张；收集那些将购买免*保护费*企业商品的人的签名；通过光顾商店来支持那些拒付*保护费*的店主；道德消费主义行为（资助免*保护费*企业）联合企业和客户反对*保护费*；在免*保护费*商店的窗户上贴上特殊的标志，*免保护费*商用电话簿；免*保护费*产品标签；联合集会和示威；创建游行队伍；支持免*保护费*旅游业；在企业发布拒绝与黑手党做生意的声明后对此进行合规检查，确保企业说到做到
15. 西撒哈拉人的非暴力自决斗争	西撒哈拉	1999–2010年	学生守夜；在市中心静坐；占领中心广场；展示被禁止使用的西撒哈拉国旗；在主城外设置抗议营地

非暴力运动	地点	年份	关键非暴力战术
16. 第五支柱组织反腐败运动	印度	2004年–至今	培训人们如何根据“知情权”法提出请求；拒绝行贿；公开承诺反腐败；象征性的抵制（创建零卢比纸币，以表明人们不愿意行贿）；举行作文比赛；组成“人路”；静坐；紧急召开公开会议；使用传单；签名收藏；纪念；乡村社区服务；戏剧/表演；建立举报腐败的电话热线；在政府办公室外面公开张贴准确的官僚收费（例如许可证），以便人们知道各种服务的法律成本
17. 橙色革命	乌克兰	2004–2005年	占领迈丹广场；搭帐篷设营地；组织支持营地的社会服务；罢工；示威；日常音乐会；舞台表演；通过退休军官和国际联系与安保部队接触；吸收军队站到抗议者阵营；军队命令忠诚的安保部队保护手无寸铁的抗议者
18. 妇女领导的和平运动呼吁结束内战	利比里亚	2003年	基督教和穆斯林妇女联合团体发起了抗议运动以求结束内战；穿着象征和平的全白衣服，持续一周每天聚集在鱼市；性罢工：在战争结束前不让男人们亲近；在蒙罗维亚街头组织游行；在加纳阿克拉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大楼前组织静坐；威胁除非签署和平协议，否则将在大楼内脱下衣服并扣留男人们
19. 黑名单腐败候选人	韩国	2000年	推出一个热门网站，介绍被列入黑名单的政治候选人；记录不适合被提名的候选人和为清廉的候选人发声宣传；争取让候选人做出实施政治改革的承诺；颁布《和平宪章》，在抗议期间灌输非暴力纪律；在集会上号召念到被列入黑名单的候选人名字时举黄牌示意；组织红灯节，观众高举红牌，并大喊“滚出去”；烛光集会；签名募捐；自行车集会；农民车队；儿童抗议；安排清廉、受人尊敬的影子候选人去监视被列入黑名单的候选人
20. 巴布亚之春	西巴布亚	1999–2004年	建立巴布亚平行管理机构；包括巴布亚妇女商人在内的抗议示威；升起被禁用的巴布亚旗帜（晨星旗帜）
21. 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非暴力运动	塞尔维亚	1998–2000年	集会；游行；示威；摇滚音乐会；收集米洛舍维奇的负面材料；罢工；抵制；请愿；公开声明；封锁主要道路；占领公共场所和建筑物；街头剧院和带有政治倾向、反对米洛舍维奇意味的幽默小品；反对派与安保部队进行沟通
22. “黑暗一分钟，光明永恒”反腐败运动	土耳其	1997年	每天晚上，人们会同时关灯一分钟；敲着锅碗瓢盆；手电筒；十字路口鸣喇叭；烛光守夜；街坊游行

非暴力运动	地点	年份	关键非暴力战术
23. 三月革命	马里	1991年	利用被称为“格里奥”的世袭音乐家传播有关抵抗、示威、学生罢工、和平游行的信息和故事
24. 公民抵抗运动	科索沃	1989–1997年	在科索沃建立平行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学校系统；抗议；劳工罢工；抵制塞族管理的学校和政府机构
25. 民主抗议	中国	1987–1989年	举办民主沙龙；将海报作为主要宣战略；海报；学生请愿；学生领导的示威；向居民宣传抗议活动信息；学校抵制；向当局致以公开信；天安门广场前绝食抗议
26. 第一次暴动	巴勒斯坦	1987–1993年	巴勒斯坦劳工罢工；抵制；平行机构；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委员会
27. 团结运动	波兰	1980年	工人占领工厂；成立独立专业协会；为反对审查制度而秘密出版书籍；秘密教育；罢工；示威；抗议；抗议歌曲和幽默形式
28. 反种族隔离运动	南非	1980–1994年	抵制伊丽莎白港白人所有企业；反对种族隔离立法和做法的公民抗议；公共葬礼游行；公开声明；多种族和平游行；跪地游行；示威；罢工和逗留；抵制出租；罢课；抵制体育和文化活动；国际制裁、撤资和抵制运动；建立合作社、社区诊所、法律资源中心等社区替代机构
29. 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	智利	1985–1988年	劳工罢工、消极怠工；以教会为基础的非暴力抵抗训练；示威游行；唱歌；在特定的日子里，人们慢慢走、开车减速；敲锅碗瓢盆；艺术抗议；组织选举
30. 人民力量革命	菲律宾	1983–1986年	烛光守夜；集会；示威；选举组织；抵制亲政权媒体；学校罢工罢课；全面罢工；动员群众以保护背叛政权的非暴力部队；示威者以拥抱和祈祷向忠于政权的士兵致以问候
31. 抵抗苏联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	政治不合作；静坐；示威；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对苏联军队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十诫”发表在《*布拉格之夜*》*(Vecerni Prah)*（苏联入侵六天后）报纸上。当苏联士兵向当地人民寻求援助时，《十诫》要求人们做到以下几点： 1. 不知道； 2. 不在乎； 3. 不要说； 4. 没有； 5. 不知道怎么做； 6. 不要给予； 7. 不能做； 8. 不出售； 9. 不显示；以及 10. 什么也不做。

非暴力运动	地点	年份	关键非暴力战术
32. 美国民权运动的纳什维尔运动	美国	1960年	在教堂地下室进行积极培训和演习；午餐柜台静坐；冲向监狱；抵制市中心的商业活动；群众一路朝着市长办公室的方向游行示威
33. 积极行动独立运动	加纳	1949–1951年	采取经济手段，抵制英国商品、关闭商店、静坐、建立独立学校
34. 孟加拉语运动	孟加拉国	1948–1952年	全面罢工；葬礼；设立语言行动委员会和社会文化组织；罢工（联合国设立国际母语日以纪念这一和平运动）
35. 非暴力抵抗纳粹占领	丹麦	1940–1944年	丹麦公民抵抗的“十诫”鼓吹和推动为纳粹工作时应消极怠工；拖延或停止对纳粹使用的交通工具；抵制德国电影和报纸；抵制纳粹商店；保护任何被纳粹党追捕的人，这一点有助于拯救90%的丹麦犹太人
36. 印度独立斗争	印度	1930–1931年	反对英国盐税和盐生产、销售垄断的普遍公民抗议；甘地及其支持者发表公开声明和讲话；群众请愿；包括公开祈祷和展示印度国旗在内的象征性行为；唱歌；跳舞；游行（食盐长征）；公开哀悼被英国人杀害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对英国商品实行经济抵制；罢工（“部分罢工”）；学校罢课；占用盐矿；经济不合作和自给自足（家庭手工制作）
37. 1919年埃及脱英独立革命	埃及	1919–1921年	支持完全独立的签名运动；学生罢课；工人和农民罢工；妇女戴面纱抗议；公共葬礼示威；抵制英国商品；群众为国家独立祈祷；使用戏剧、音乐和文学手段宣传不服从口号
38. 波斯烟草抗议	伊朗	1890–1892年	抵制烟草制品和反对英国公司垄断波斯烟草生产、销售和出口的非暴力示威活动
39. 俄罗斯波兰抵制俄罗斯化	分裂的波兰	1885–1914年	波兰飞行大学(Polish Flying University)的发展壮大（玛丽·居里(Marie Curie)，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就毕业于这所非法大学）；抵制俄罗斯国立学校；建立波兰祖国学校(Polish Motherland Schools)
40. 哈布斯堡家族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消极抵抗运动	匈牙利	1850–1860年	拒绝服兵役；拒绝在社会上讲德语；抵制官方庆祝活动；抵制法院；抵制奥地利商品；拒绝为奥地利士兵提供食宿
41. 美国殖民地反英国王室的印花税运动	英国美洲殖民地	1765–1766年	不进口；抵制行动；拒绝交税；抵制英国产品

尽管在这41个案例中采用了广泛的战术，但它们可以分为两类。首先，非暴力战术可以根据异议人士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分类。*集中性战术*（例如集会抗议或支持）是高风险的，因为它们是独裁者实施暴力的主要目标。*分散性战术*（例如退出社会机构）风险较低，因为它们代表了太多分散和非必要的暴力镇压目标。

其次，非暴力战术也可以根据暴君必须应对的不同方式进行分类。在某些作为行为中，暴君必须强迫异议人士停止他们的行为，比如普遍性罢工。还有一些不作为行为，比如消费者抵制某些商品和服务，这就要求暴君引导异议人士恢复正常活动。

最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使用的战术都来自于这些类别。依赖任何一种战术都不可能构成致胜战略，因为并非所有公民都愿意接受同样的风险。多重战术使暴君陷入困境，他们将发现很难在惩罚抵抗的同时奖励停止不服从。

如果使用多种不同的战术为抵抗者创造了战略优势，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在混战中加入一套谨慎的暴力战术?”当非暴力冲突似乎暂时失去势头，沮丧情绪加剧时，这种争论往往会出现。因此，所有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都需要确信公民抵抗运动相对于暴力起义的优势，并且必须准备好论证和捍卫这一点。

任何人认为公民抵抗运动需要容忍想要参与暴力的盟友都是错误的。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公民抵抗运动坚持非暴力纪律，但在运动之外出现了一个暴力团体或叛乱，并开始参与暴力活动。那会怎么样呢?这一动态是否有助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暴力团体让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看起来是合理的，而暴力威胁吓得当局向更“温和”的公民抵抗者让步。然而，这一论点并不为历史所证实。学者埃丽卡·切诺维斯和库尔特·朔克(Kurt Schock)对1900年至2006年间的106场非暴力运动进行了研究，以便寻求政府的根本变革。[18]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他们都无法找到证据证明公民抵抗运动与活跃的暴力团体（有时被称为"暴力侧翼"）并存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切诺维斯和朔克确实发现了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证明与暴力一方互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有暴力侧翼参与的公民抵抗运动比没有暴力侧翼的公民抵抗运动的影响平均减少17%。由于高水平的平民参与是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暴力侧翼间接降低了在冲突中获胜的机会。

切诺维斯和朔克还发现，暴力侧翼的存在与异议人士之间的高度摩擦密切相关。混合暴力和非暴力战术会降低运动保持统一的希望，从而降低获胜机会。暴力侧翼也增加了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更容易受到镇压的可能性，这抑制了对运动的参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成功的机会。

切诺维斯和朔克发现关于暴力和公民抵抗不相容，这并不奇怪。暴力起义和公民抵抗运动的运作方式完全矛盾。即使是有限的暴力也会破坏让公民抵抗运动有效的势头。这也是暴君通过使用*内奸*（“煽动者”）拼命煽动人们参与暴力或煽动暴力的原因之一。

任何认为公民抵抗运动需要容忍想要参与暴力的盟友的人都是错误的。支持这样一个“大帐篷”论在功能上意味着公民抵抗运动应该欢迎那些与非暴力冲突概念格格不入的势力。任何对愿意使用暴力的盟友的依赖都将破坏维持非暴力纪律所带来的信心和明确性。暴君的主要支持者的分裂和背叛是成功的关键，但暴力起义者的存在抑制了这种分裂和背叛。常识告诉我们，当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受到那些希望他们投奔到自己一边的人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威胁时，他们是不可能暴露自己的。

18 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库尔特·朔克(Kurt Schock)，“当代武装挑战是否影响了大规模非暴力活动的结果?”(Do Contemporaneous Armed Challenges Affect the Outcomes of Mass Nonviolent Campaigns?)，摘自*《动员：国际季刊》(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第20卷，第4期（2015年）：第427–451页。

一个问题是破坏行为应该被视为暴力还是非暴力战术。答案是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在旅客列车到达之前炸毁列车轨道是一种暴力战术。但如果在火车通过前铁轨被炸毁，并且给予充分警告，那么这可能是一种非暴力战术。财产破坏和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身体健康构成威胁的破坏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在拆除监控基础设施方面，最容易划出这条亮线的莫过于此。用恶意软件禁用摄像头或影响用于社会控制的数据库很难被视为暴力行为。暴君可能认为这些破坏行为是暴力行为，因为它们造成破坏，但大规模抗议、罢工和抵制也造成破坏，挑战暴君的合法性。

清单问题3

公民抵抗运动的战术使用顺序是否基于破坏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异议人士既要选择正确的战术，又要决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进行排序。这些选择的结果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成功的非暴力冲突平均时间为三年。假设冲突能得到短期解决，一次采用一种战术而不考虑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就可能导致失败。

在某种无形的程度上，非暴力战术的影响将取决于以往非暴力战术的成败。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竞选的不同阶段实施的同样的非暴力战术可以给暴君带来截然不同的压力。在冲突早期阶段发动全面罢工可能为时过早，但在后期可能会证明是决定性的。这一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将2000年塞尔维亚事件与1989年中国事件和2003年委内瑞拉事件进行对比。

在塞尔维亚，针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的战略顺序战术导致他在2000年10月下台。纪录片《*推翻独裁者*》记录了米洛舍维奇被推翻的重大事件，这场战斗在后来被称为“推土机革命”（在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中，工程车辆冲向被视为米洛舍维奇宣传据点的国家电视台大楼）。2000年10月5日，数十万抗议者聚集在贝尔格莱德。

但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是自发的。事实上，它们是源自塞尔维亚社会各团体的战略性规划和顺序活动战术的高潮。他们十余青少年和学生领导的团体*Otpor!*为首的反政权活动和恶作剧。Otpor!（意为“抵抗!”）成立于两年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残暴的政权从民众的恐惧变成了笑柄。Otpor的培训强调战略规划、具体创造性非暴力行为以及保持非暴力纪律的绝对必要性。该组织在团结分裂的反对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起了*Gotovje!*（“他完了!”）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2000年9月的总统选举。积极分子分发了200多万张标有*Gotov je!*口号的贴纸，并在全国各地散布反政府涂鸦。反对派还向警方和军方求助，希望他们转而支持抵抗运动。当米洛舍维奇企图窃取选举结果时，民众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2000年9月27日大选三天后，米洛舍维奇错误地宣称科什图尼察没有赢得多数席位，因此要与他进行决选。随后，非暴力示威以学生的罢工开始，蔓延到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罢工。其他工人团体很快加入了克鲁巴拉河(Kolubara)地区罢工矿工的行列。克鲁巴拉河生产了该国大部分电力。这导致塞族居民的全面罢工，运输工人封锁了主要公路和主要道路。罢工使全国各地的城镇陷入瘫痪，使政权力量分散。10月4日，罢工支持者阻止忠于现政权的警察破坏克鲁巴拉河罢工，反对派向米洛舍维奇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下台。据估计，10月5日，全国各地多达100万人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参加首都非暴力群众集会。一天后，当警方显然不会再站在政权一边时，米洛舍维奇承认选举失败并投降。

公民抵抗运动遭遇重大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将各种非暴力战略组合成连贯的战略计划。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大规模动员在一个国家蔓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1989年天安门抗议和2002-2003年委内瑞拉全面罢工的教训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民主派学生街头抗议的单一战术集中在许多城市，但最明显的是在首都。反对派力量的地理集中只是象征性的强大力量，为政权提供了更多孤立他们的机会。暴君可以切断他们与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沟通，包围他们的抗议活动，并由其忠诚的武装部队迅速进行残酷镇压。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宣传把首都的学生描绘成恐怖分子和暴力篡夺者。回想起来，这次公民抵抗运动由于未能使其战术多样化并在北京以外执行而消散了一切可能的势头。回首往事，由于未能实现战术多样化并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实施，这次公民抵抗运动失去了任何可能存在的势头。

在委内瑞拉，政治反对派在2002年发动了一场罢工，迫使当时的总统查韦斯(Chavez)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由商业和工会联合会领导的罢工持续了三个月，以失败告终。私营电视网每天都不受限制地报道罢工，帮助维持罢工势头。罢工最初导致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停产，但也在公众中产生分歧。此举未能赢得普通委内瑞拉民众的支持，许多企业主选择不加入。查韦斯还动员支持者，组织了大型亲政府和反罢工集会，指责罢工者造成汽油和基本食品短缺，影响了委内瑞拉民众。

公民抵抗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无法将一系列不同的非暴力战术组合成连贯的战略计划。

在一次反击中(与2020年香港发生的情况类似),委内瑞拉政府开始解雇罢工的高管、经理和工人,并引入由忠诚员工组成的罢工工人重启工作。随着更多最初参加罢工的中小企业为避免破产而重新开业,而政府宣传继续动员公众反对罢工者,政府要求结束罢工的压力有所增加。军方对查韦斯的忠诚度仍然很强,当局得以实施镇压措施,包括解雇数千名罢工者和进行有针对性的逮捕,最终镇压了罢工。

在文章"非暴力抵抗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中,切诺维斯为今天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提供建议,解释了塞尔维亚、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不同结果:

> *在大规模动员之前参与精心规划、组织、培训和联盟建设的运动比那些在制定政治计划和战略之前走上街头的运动更有可能吸引大批多样的追随者。*[19]

在她的文章中,切诺维斯接着指出本世纪公民抵抗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非暴力冲突案件的急剧加速和这些冲突的成功率的大幅下降。这可以解释为,像塞尔维亚这样以异议人士为动力的国家越来越少,而像中国和委内瑞拉这样以暴君为动力的国家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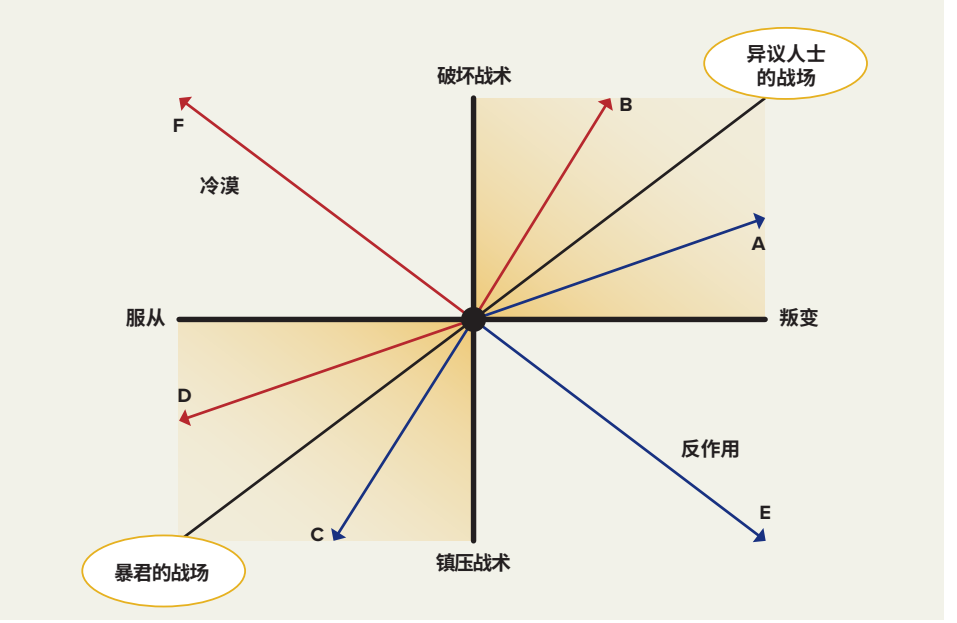
为了保持势头,异议人士必须优先采取以下战术:

- 加强社会混乱与暴君最依赖者的背叛之间的关系;
- 削弱暴君赖以维持秩序的镇压和服从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如图14所示。右上象限描述异议人士的战场。异议人士的任务是确定战术的优先顺序,这样他们就能沿着直线A前进,将社会混乱降到最低水平,从而产生最大数量的暴君叛军。暴君想降低异议人士战术的效率,就像直线B一样,即使是通过非暴力战术进行高度破坏,也会导致叛军减少。如果暴君让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沿直线B迁移的努力取得成功,那么最终社会混乱不会导致背叛,并使反对派如直线F所示漠不关心。

19 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非暴力抵抗的未来"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31卷,第3期(2020年7月):第69–84页。

图14：按预期影响确定优先顺序



左下象限描述了暴君的战场。暴君渴望用最低限度的暴力镇压来榨取公民最大程度的服从（直线D）。相反，当暴君认为他必须依靠最大程度的暴力镇压（必须使用大量资源并削弱政治合法性）来榨取最低程度的社会服从时，公民抵抗运动就会受益（直线C）。当镇压强度和规模的增加产生的不是服从而是背叛，那么镇压就会产生反作用（直线E）。

非暴力冲突是发生在异议人士和暴君战场上的战术交锋的总和。这些交锋的结果越频繁地落到绿线上，异议人士就越有可能拥有高超技能。当结果追踪橙线时，这可能反映了暴君的高超技能。

每场比赛的势头都很难定义，但对于争取胜利的选手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衡量非暴力冲突势头的一种方法是根据谁发起了最具战术意义的交锋。在异议人士的战场上采取的战术对异议人士是进攻性的，对暴君是防御性的。反之亦然，当战术开始在暴君的势力范围内，变成了对暴君的攻击，对异议人士的防御。反之，当战术开始在暴君的领地，对暴君来说是进攻性的，对异议人士来说是防御性的。在这个概念框架下，谁最频繁地进攻，谁的势头对他们有利。

然而，积极势头不应该完全用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在冲突中使用非暴力战术的频率来衡量。无论是委内瑞拉、香港、白俄罗斯、俄罗斯还是伊朗，威权主义者都在以更快的速度使用他们的战术，这也是成功率下降的原因。

在涉及技能的情况下，另一个衡量势头的指标可能是哪一方在每次战术交锋中给对手造成最大的脆弱性。具体地说，呼吁破坏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遭到冷漠对待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暴君对更强烈镇压的依赖有多大可能会起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势头的最好理解是，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脆弱程度的相对变化。

在非暴力冲突的每一个时刻，重要的是要评估在暴君的镇压起反作用之前，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可能退化为冷漠。防止冷漠的最好办法是扩大战术交锋的种类，这样总是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对抗，让暴君措手不及。制造反作用的最好办法是让暴君投资于不能强迫的暴力。

在选择战术和如何排序时，异议人士应该考虑到创新层面，即使用可信的非暴力威胁。非暴力冲突中的每一种战术都可能是短期直接压力或长期间接压力的来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暴君通常曾经使用暴力，因此当政权威胁使用暴力时，民众会认为这种威胁确实有可能发生。但非暴力行动的威胁并不能立即让人信服，因为特定非暴力冲突的异议人士不太可能曾经实施类似战术。异议人士首次威胁使用某种战术（例如抵制）可能不会被相信。

这其中的一个例外是大规模抗议，这种战术在非暴力冲突中最经常出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语言的力量：国家对抗议公告的反应”(The Power of Words: State Reactions to Protest Announcements)中，约翰内斯·瓦勒(Johannes Vüller)和艾丽莎·施瓦茨(Elisa Schwarz)指出：

> *组织经常在抗议活动实施之前宣布抗议活动，以动员意识、招募支持者并获得媒体关注。*[20]

> *面对抗议声明，政府有三种不同的选择：(a)无视声明；(b)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不会实施抗议；或(c)作出让步，防止抗议发生。*[21]

如果暴君拒绝承担忽视抗议声明的风险，不采取预防措施，暴君就被迫做出让步。这立刻给了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优势，因为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将意识到暴君的不适感和不愿使用武力。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种威胁暴君的机会延伸到包括罢工、抵制和其他许多作为和不作为的非暴力战术上。

要使任何特定战术成为可信的威胁，就必须在实施之前拥有足够的权力，让暴君通过谈判避免下一次使用。

香港异议人士使用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战术是2019年8月占领机场三天。由于成功关闭了香港国际机场，他们随后可以威胁在任何时候在机场静坐。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开始和结束占领。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同时，香港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采取其他可能被开启或关闭或威胁的战术。

清单问题4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发现了让外部支持更有价值的方法？

异议人士常常认为，他们的成功所缺少的环节是外部支持。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渴望世界承认他们的困境。

---

20 约翰内斯·瓦勒(Johannes Vüllers)和艾丽莎·施瓦茨(Elisa Schwarz)，“语言的力量：国家对抗议公告的反应”(The Power of Words: State Reactions to Protest Announcements)，*《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第52卷*，第3期(2019年)：第347页。

21 瓦勒(Vüllers)和施瓦茨(Schwarz)，“语言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第353页。

埃丽卡·切诺维斯和玛丽亚·斯蒂芬开创性的研究《*外部支持在非暴力活动中的作用：毒酒还是圣杯？*》(*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in Nonviolent Campaigns: Poisoned Chalice or Holy Grail?*)系统地评估外部援助对目标广大的非暴力冲突（即试图实现政权更迭的冲突）的影响。切诺维斯和斯蒂芬认识到21世纪非暴力冲突中的外部作用无处不在，认识到他们如何帮助“激发高度参与、维持非暴力纪律、阻止镇压和引导安保部队背叛”。[22]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公民抵抗运动必须依靠外部援助来避免失败的观点。

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的首次。以前的所有研究都比较集中于对民主或半民主社会运动的外部援助，或对直接挑战暴君权威的武装叛乱的外部援助。

研究的定量部分包括分析从25000起公开报告的外部援助事件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到在全世界开展的68个目标广大的非暴力运动：2000年至2014年期间开展了67次运动，一次历史案例（南非）在此期间以外开展。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研究的定性部分包括对主要利益相关者、捐助者、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人权倡导者和其他八项活动的80次采访。

通过整合这些定性和定量数据，研究回顾：

- 援助时间（请参见表8）
- 支持类型（请参见表9）
- 支持者类型（请参见表10）
- 接受者类型（请参见表11）

表8-11整理了这些数据，以说明外部援助如何能够“保持高度参与、保持非暴力纪律、阻止镇压和引诱背叛”。[23]

22 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杰·斯蒂芬(Maria Stephan)，《*外部支持在非暴力活动中的作用：毒酒还是圣杯？*》(*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in Nonviolent Campaigns: Poisoned Chalice or Holy Grail?*)（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 2021年），第1页。

23 切诺维斯和(Chenoweth)斯蒂芬(Stephan)，《*外部支持的作用*》(*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第18页。

图15：21世纪早期运动的八个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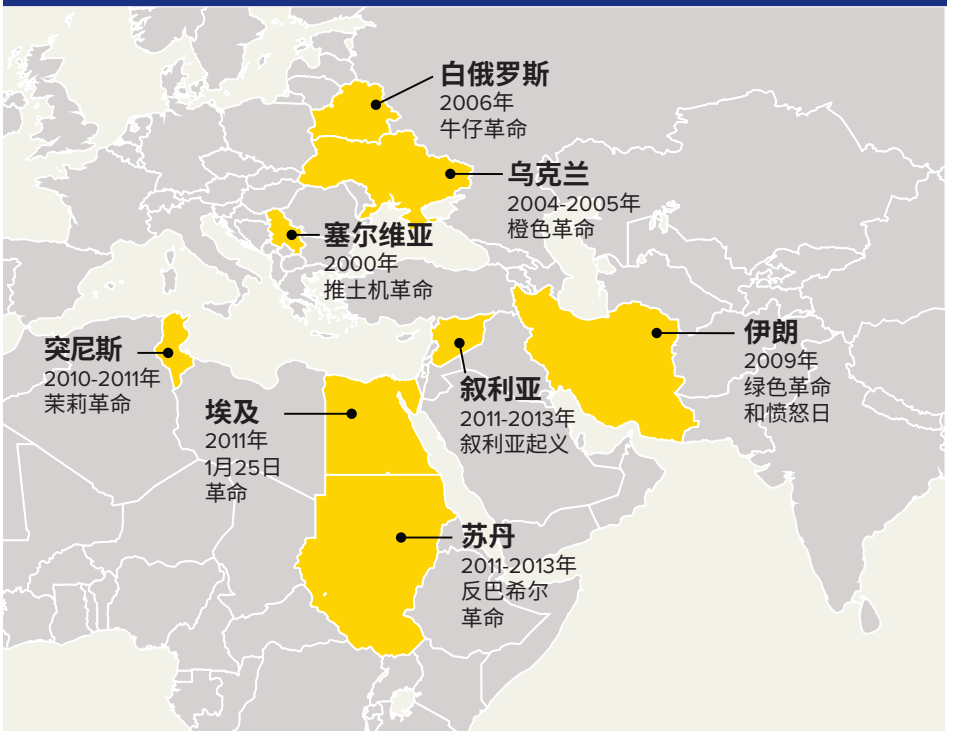


表8：援助时间

■ **运动前：**在运动开始前五年开始的外来援助事件。例如，向媒体组织提供财政援助以保护新闻自由，为学生积极分子举办培训讲习班，或者在选举前使用电脑或手机对工人进行民意调查。

■ **高峰运动：**在大规模动员期间开始的外部援助事件-即，作为最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至少观察到1000名参与者不断进行动员。

例如，向倡导公民权利的公民社会团体提供小额赠款，向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提供法律援助，或通过外交手段表达对反对派的支持和声援。

■ **运动后：**在运动结束后的两年期间开始的外部援助事件，无论是成功的（即现任国家领导人被撤职或领土独立），还是失败的（即运动复员，观察到的参加者低于1000人）。例如，调解关于宪法改革的对话会议，提供经济救济以支持民主改革，或呼吁过渡正义进程。

表9：支持类型

■ **财务** 直接货币援助（如小额或大额赠款、奖学金、现金、贷款、罢工基金、法律基金、食品、药品、债务减免等）。*示例：1997-2001年，芬兰将13236美元用于民主参与和公民社会，以支持印度在墨西哥民主中的代表权（竞选前支持、反卡尔德隆运动，墨西哥）。*

■ **道德/象征** 非暴力团结行动（例如数字运动或宣传、代表自己国家的团体动员、展示积极的事业和工作、提供奖励、访问该国、直接参与该国的运动，如2011年7月美国大使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与叙利亚人一起游行）。*示例：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为2000年8月18日选举抗议活动期间被拘留以来一直未露面的两名男子发出公开呼吁，要求为他们提供支持信（秘鲁，反藤森运动，最佳运动支持）。*

■ **技术** 援助，在规划、后勤、情报、协调、召集积极分子、进行和提供背景研究以及执行与活动相关的任务方面提供协助（例如，让积极分子相互联系，警告即将发生的镇压，在不一定进行培训的情况下提供实际空间进行培训和组织，对情况进行战略分析，提供直接法律援助，提供直接医疗援助）。提供设备（如手机、电脑、照相机）、印刷、书籍和文章、翻译。建立关系或为建立关系而召开会议。*示例：2002-2005年，英国政府承诺出资80万英镑在乌克兰建立一个独立的媒体中心，进行合作和培训记者、政治家、企业、各阶层、法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乌克兰，最橙色革命，最佳运动支持）。*

■ **培训** 提供领导力培训、组织能力建设、劳动组织、运动培训、法律培训、医疗培训。请注意，这个类别明确要求支持者培训活动家（不仅仅提供培训空间，这被编码为技术支持）。*示例：斯洛伐克学术信息局(Slovak Academic Information Agency)和自由之家于1999年3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乌克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高加索和立陶宛的OK'98运动领导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使与会者熟悉斯洛伐克公民社会组织在增加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方面的经验。研讨会主要是为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随从设计的，这两个国家仍在与威权主义者的政权作斗争，能够充分利用斯洛伐克1999年的经验（塞尔维亚，推土机革命，运动前支持）。*

■ **非暴力平民保护** 保护性伴随、非暴力互动、监控、冲突参与者之间的调解、监控政权行为、停火等当地情况。*示例：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详述了叙利亚政府首次报道的记者死亡事件，并表达了愤怒(叙利亚起义，最佳运动支持)。*

■ **对政权的制裁** 针对政权对该运动的行为，发布积极的制裁(例如，具体的双边或多边惩罚)。包括旅行禁令、禁止参加会议、冻结资产、实施武器禁运或其他措施(例如，反对种族隔离的跨国公司撤出南非等)。*示例：1985年，在墨尔本，工会分子扣留南非工程货物，作为释放南非工会分子的虚拟赎金(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最佳运动支持)。*

■ **背叛者的安全通道** 为政权精英提供庇护、特赦、黄金降落伞或其他激励措施，让他们向竞选让步或离开该国。*示例：2010年，美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总统共同谈判临时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下台(吉尔吉斯斯坦，反对临时政府，最佳运动支持)。*

■ **防止/减轻镇压** 为积极分子提供庇护所，给予积极分子庇护或难民身份，要求从监狱释放积极分子，谴责或发表策略回应抗议积极分子受到虐待、起诉、逮捕和审判战犯等)、阻止或拖延军事援助物资运送。*示例：印度政府对加尤姆政权2003-2008年镇压民主示威者表示关切(马尔代夫，反加尤姆运动，最佳运动支持)。*

■ **取消支持** 盟国撤销对反对派政府的实质支持(例如，美国总统里根威胁要减少对马科斯领导下的菲律宾的援助，美国在2013年年中停止对埃及的援助)。*示例：1985年，法国召回驻南非大使，宣布将阻止在南非进行新的投资，并表示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谴责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并敦促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一致行动(最佳活动支持，反种族隔离运动，南非)。*

表10：支持者类型

■ **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 从事援助其他国家人民活动的正式私人组织。可以包括宣传组织（例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非暴力和平部队(Nonviolent Peaceforce)、国际和解联谊会(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例如开放社会(Open Society)、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非暴力国际(Nonviolence International)）、人道主义组织（例如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和红新月会(Red Crescent)）、教育或培训团体（例如CANVAS，Rhize）以及宗教团体附属机构（例如天主教救济服务(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示例：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马尔代夫选举观察(Maldives Election Watch)、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保护记者委员会。*

■ **侨民团体** 一群居住在国外的人，代表居住在本国的人进行宣传（例如加拿大的泰米尔人、美国的苏丹人）。*示例：黎巴嫩人在科威特、叙利亚侨民在约旦、马拉维侨民论坛。*

■ **大学/学生团体** 由从事倡导活动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例如代表东帝汶积极分子倡导的印度尼西亚学生）。*示例：麦吉尔大学学生、哈佛大学学生、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特区联盟、多所大学的伊朗学生。*

■ **跨国团结网络(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network, TAN)** 动员起来支持其他国家斗争的积极分子的正式或非正式集合。通常（但并非总是）涉及代表全球南方团体动员的全球北方团体（例如美国名人动员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包括外部运动（例如2011年埃及4月6日积极分子向威斯康星州劳工积极分子送披萨）。不包括跨国工会或有组织劳工团体，它们分开编码（见下文）。*示例：加拿大选举观察员(Canadian Election Observers)、美国非洲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n Africa)、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American Committee on Africa)、FEMEN 。*

■ **个人** 以个人身份行事的人（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名人支持者、金融家）。不包括在任何其他类别的有组织团体中担任其角色的人员。*示例：达赖喇嘛(Dalai Lama)、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贝蒂·威廉斯(Betty Williams)。*

■ **国际政府组织(IGO)** 多边政府组织，例如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或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包括欧洲联盟等区域政府间组织。*示例：儿童基金会(UNICEF)、开发计划署(UNDP)、欧安组织(OSCE)、北约(NATO)、欧共体(EC)、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IMF)。*

■ **公司** 公司或企业。通常是跨国公司，例如壳牌石油、通用汽车、AT&T或耐克。*示例：巴克莱、摩托罗拉、推特、DigitalGlobe、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谷歌思想。*

■ **外国政府** 外国政府（例如美国政府）、政府内部的机构（例如美国国务院）或代表政府行事的个人（例如美国国务卿）。*示例：美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挪威、瑞典、俄罗斯、法国、印度。*

■ **跨国劳工组织/工会** 跨国非政府劳工团体（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不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它是IGO。*示例：工匠和装饰工工会(Operative Painters and Decorators Union)、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of Czechoslovakia)、劳联-产联(AFL-CIO)、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COSATU)、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 **叛军/准军事/民兵团体** 来自国内或国外的非国家或半国家武装行为者（如越南叛乱分子向南非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提供建议）。*示例：哈马斯、真主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 **媒体** 直接报道该运动的正式或非正式媒体组织。*示例：电台自由广播(Omroep voor Radio Freedom/Omroep voor Radio Freedom)、泛非通讯社(Pan African News Agency)、卫报(The Guardian)、晨星(Morning Star)、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表11：接受者类型

■ **公民社会组织(CSO)** 正式的公民社会组织。可包括地方或跨国宣传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非暴力和平部队、国际和解联谊会）、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如开放社会、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非暴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教育或培训团体（如CANVAS、Rhize）以及宗教团体和机构（如天主教救济服务）。可以包括国营或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示例：赞比亚非政府组织(Zambian NGOs)、独立电子媒体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Electronic Media)、自由选举和民主中心(Center for Free Elections and Democracy)、Izlaz 2000、黎巴嫩红十字会(Lebanese Red Cross)。*

■ **大学/学生团体** 由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从事宣传活动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例如倡导人权的印度尼西亚学生）。*示例：多哥学生团体、教科文组织项目学校学生、突尼斯大学毕业生、海地青年团体。*

■ **个人** 以个人身份行事的人（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名人支持者、金融家）。不包括在任何其他类别的有组织团体中担任其角色的人员。*示例：博主温佐奈(Win Zaw Naing)、札哈纳(Zarganar)（缅甸最著名的喜剧演员）、前总理阿卜杜勒·卡里姆·艾里亚尼(Abd Al-Karim Al-Iryani)、UNDP贝鲁特实习生、未指定的个人。*

■ **企业或公司** 本地公司或企业。通常是位于运动所涉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是国有或独立的。*示例：南非黑人商人、突尼斯乳业公司(Tunisian Dairy Sector)、乌克兰电信(Ukrainian Telekritika)。*

■ **政府** 政府或政府部门（如埃及政府）、政府内部的机构（如埃及军方）或代表政府行事的个人（如埃及军方参谋长）。*示例：泰国政府、尼泊尔政府、白俄罗斯政府。*

■ **劳工组织/工会** 有组织的劳工团体（如工会）。可以是国有或独立的。*示例：乌克兰独立媒体工会(Independent Media Trade Union of Ukraine)和乌克兰全国记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the Journalists of Ukraine)、玻利维亚劳工党(Bolivian Labor Party)、白俄罗斯工会(Belarusian labor unions)、南非工会大会(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 **叛军/准军事/民兵团体** 来自国内或国外的非国家或半国家武装行为者（如越南叛乱分子向南非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提供建议）。*示例：苏丹革命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西巴布亚叛军。*

■ **当地媒体** 直接报道该运动的正式或非正式媒体机构。可以是国有或独立的。*示例：Charter-97、Radi B92、独立电子媒体协会(Association for Independent Electronic Media, ANEM)、黎巴嫩广播公司(Lebanes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正式的反对党：** 在该国运作的合法反对党。*示例：扎吉德诺联盟(Zajedno Coalition)、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尼泊尔毛派党(Maoist Party of Nepal)、苏丹大会党(Sudanese Congress Party)、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

■ **运动积极分子** 平民，包括积极分子、运动领袖和在上述任何类别之外接受直接援助的草根团体。*例子：南非、赞比亚、乌克兰、突尼斯、也门、埃及、伊朗的运动积极分子。*

■ **未指定** 有支持证据，但有关支持的可用信息过于笼统，无法指定接受者。*示例：叙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多哥、突尼斯、乌克兰、南非、黎巴嫩、缅甸、泰国未指明的公众接受者。*

■ **其他** 此处未列出的所有其他。*示例：赞比亚传统领袖、塞尔维亚当地少数民族、菲律宾拉卡斯社区、玻利维亚瓦斯战争受害者亲属、泰国女领袖。*

这一非同寻常的信息百科全书使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能够全面准确地确定最有希望的外部援助机会。切诺维斯和斯蒂芬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九项一般性意见：

- *在过去2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没有国际关注和参与的非暴力起义。*
- *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机构的长期投资可以加强非暴力运动的社会基础。*
- *在动员高峰前接受培训的活动家更有可能动员高人数、低死亡率和具有更大的背叛风险的运动。培训提供了重要的技能建设功能，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建立关系、同伴学习的直接渠道和战略规划的空间。*
- *通过政治、外交和安全参与减轻政权镇压是支持非暴力组织和动员环境的关键援助形式。*
- *一般来说，来自外国政府的支持似乎间接帮助了大多数竞选活动。但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直接政府援助有助于运动获胜。*
- *同时对武装团体的外部支持往往以多种方式破坏非暴力运动。*
- *专制政权通常受益于强大盟友的外部支持，这对活跃分子构成了重大挑战。*
- *直接资助运动对运动特征或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障碍的灵活捐助资金对运动最有帮助。*
- *捐助者协调对于有效支持和利用非暴力运动非常重要。这些见解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外部援助的人员和内容，还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提供外部援助。*团结和凝聚力对运动和捐助者都很重要。*[24]

24 切诺维斯(Chenoweth)和斯蒂芬(Stephan)，*《外部支持的作用》(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第1-3页。

反马科斯农民在1986年菲律宾人民权力运动期间举行抗议。

虽然这项研究肯定了有许多机会利用外来援助，但每一种形式的干预都有注意事项一些，只有一种除外："培训似乎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更能有效地支持非暴力运动。"[25]

显然，为了让世界新老暴君"退休"，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必须变得更有竞争力。训练尽可能多的异议人士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将知识传递给数十万关键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为全人类提供破坏暴政的最大机会之一。这应该是全世界努力的重点，特别是来自私人和基础的支持。

25 同上，5.

在衡量公民抵抗运动的恢复力时，数字最为重要。暴君很清楚，更多的竞选参与者将降低暴力镇压的影响，从而降低他们控制当前所统治人口的能力。

4

第四章

异议人士如何应对冲突

清单问题5

面对暴政的公民数量和多样性是否有可能增加?

平民参与率是运动领导人在非暴力冲突过程中监测和刺激的最重要趋势之一。参与公民抵抗活动的人数和多样性的变化是一个晴雨表,表明这种势头是对暴君有利还是对异议人士有利。

在衡量运动的恢复力时,数字最为重要。暴君很清楚,公民抵抗活动参与者越多,他们使用暴力镇压的影响就越小,他们维持对民众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

随着竞选阵营的支持基础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拥有独特技能、机会和资源的新团体,它可以通过开辟对抗暴君的新战线来实现战术多元化。例如,工厂工人可能罢工(第一战线),随后也会有停止工作的矿工加入罢工(第二战线)。学生可以罢课(第三战线)。农民可能在分散的地理基础上扰乱粮食供应链(第四战线)。随着冲突的推进,在其他战线(例如医疗设施和体育赛事)可能会采用越来越多的新战术。每一支公民抵抗者都有自己的网络和资产,而暴君则不得不不断动用自己的资源,以试图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重获控制。

正如团体可以拒绝独裁者进入他们的网络和资产一样，他们也可以向日益壮大的公民抵抗运动提供这些能力。这一点的一个表现方式是，运动的支持者齐心协力建立平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替代政权压迫性的现状。随着参与的增加，这些替代机构成为运动力量和恢复力的基础，它们可以在稳定和巩固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运动接近民主转型的时候。[26]

高平民参与率也增加了脱离暴君支持的可能性。参加竞选的人越多，竞选活动与对手主要支持者的联系就越紧密。公务员、政客、安保部队成员、从政权中获益的商人、司法人员以及为国家媒体工作的记者可能都认识参与非暴力冲突的人。他们的态度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他们可能会因为从独裁统治中获利而羞愧。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宗教权威和他们所关心的其他人越同情这场运动并批评暴君，他们的忠诚就越有可能发生转变。

有一类参与者需要特别注意，即妇女在公民抵抗中的作用。妇女在过去得到普遍承认的运动中更为重要。1949年至2013年期间，至少有95次妇女前线参与的非暴力运动成功地对抗了军事上更强大的外国占领者、殖民者或国内专制政权（请参见表12）。抵抗运动中的女性(Women in Resistance, WiRe)数据集表明，“女性的参与与成功的抵抗运动高度相关。”[27] 妇女的参与增加了公众参与程度，增加了从军队叛逃的可能性，也提高了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事实上，女性前线参与的缺失使得公民抵抗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了24%。[28]

---

26 另请参见马切伊·巴特考斯基(Maciej Bartkowski)，“作为公民抵抗的另类制度建设”(Alternative Institution-Building as Civil Resistance)，*《运动的思想》(Minds of the Movement)*，2018年6月13日发布。https://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blog_post/alternative-institutional-building-civil-resistance/

27 埃丽卡·切诺维斯、康纳·塞尔(Conor Seyle)和萨哈纳·达尔玛普里(Sahana Dharmapuri)，*《女性参与与非暴力活动的命运：关于抵抗女性数据集的报告*（政策简报）》(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the Fate of Nonviolent Campaigns: A Report on the Women in Resistance (WIRE) Data Set (Policy Brief))（科罗拉多州布鲁姆菲尔德：One Earth Future，2019年10月）。https://www.oneearthfuture.org/file/1964/download?token=VUcOhryR。

28 同上。

表12：1949年至2013年间，95次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有大量女性在前线参与反对外国或国内暴政。[29]

运动	地点	开始	结束	目标
大会人民党运动	加纳	1949年	1957年	英国统治
反希门尼斯(Jimenez)运动	委内瑞拉	1958年	1958年	希门尼斯独裁政权
四月革命	韩国	1960年	1960年	李承晚(Rhee)政权
赞比亚独立运动	赞比亚	1961年	1963年	英国统治
反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运动	希腊	1963年	1963年	卡拉曼利斯政权
反陳运动	越南南部	1964年	1965年	越南总理陳文香
反齐拉纳(Tsiranana)运动	马达加斯加	1972年	1972年	齐拉纳政权
希腊反军事运动	希腊	1973年	1974年	军事统治
康乃馨革命	葡萄牙	1973年	1974年	军事统治
1973年泰国起义	泰国	1973年	1973年	军事独裁
民主运动	阿根廷	1977年	1983年	军政府
反布托运动	巴基斯坦	1977年	1977年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总理
玻利维亚反军政府运动	玻利维亚	1977年	1982年	军政府
反英迪拉运动（第三阶段）	印度	1977年	1977年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总理
伊朗革命	伊朗	1977年	1979年	沙阿礼萨·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
台湾民主运动	台湾	1979年	1985年	专制政权
团结	波兰	1980年	1989年	共产党政权
反皮诺切特运动	智利	1983年	1989年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人民力量	菲律宾	1983年	1986年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乌拉圭反军事运动	乌拉圭	1984年	1985年	军事统治
南非第二次反抗运动	南非	1984年	1994年	种族隔离
Diretas já	巴西	1984年	1985年	军事统治
反杜瓦利埃运动	海地	1985年	1986年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 Claude Duvalier)

29 根据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抵抗女性数据集》(Women in Resistance Dataset)*，第一版（2019年），由哈佛Dataverse发行，第三版，https://doi.org/10.7910/DVN/BYFJ3Z。

运动	地点	开始	结束	目标
反贾法尔运动	苏丹	1985年	1985年	贾法尔·尼梅瑞(Jaafar Nimeiry)
韩国反军事运动	韩国	1986年	1987年	军政府
反厄尔萨德(Ershad)运动	孟加拉国	1987年	1990年	军事统治
反 PRI 运动	墨西哥	1987年	2000年	腐败政府
歌唱革命	爱沙尼亚	1987年	1991年	共产党政权
阿根廷反政变运动	阿根廷	1987年	1987年	未遂政变
白俄罗斯反共运动	白俄罗斯	1988年	1991年	共产党政权
民主运动/萨犹迪斯(Sajudis)	立陶宛	1988年	1991年	立陶宛政权
东帝汶抵抗	东帝汶	1989年	1999年	印度尼西亚占领
蒙古族反共产党	蒙古	1989年	1990年	共产党政权
科特迪瓦民主运动	象牙海岸	1989年	1990年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elix Houphouët Boigny)政权
贝宁反共产党	贝宁	1989年	1990年	共产党政权
民主运动	拉脱维亚	1989年	1991年	共产党政权
天鹅绒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	1989年	1989年	共产党政权
公众反对暴力	斯洛伐克	1989年	1992年	捷克共产党政府
斯洛文尼亚反共产党	斯洛文尼亚	1989年	1990年	共产党政权
民主运动	匈牙利	1989年	1989年	共产党政权
反伯纳姆/霍伊特运动	圭亚那	1990年	1992年	伯纳姆/霍伊特(Burnham/Hoyte)独裁政权
尼日尔反军事运动	尼日尔	1990年	1992年	军事统治
CCCN与工会民主运动	中非共和国	1990年	1993年	科林巴(Kolingba)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民主运动	吉尔吉斯斯坦	1990年	1991年	共产党政权
赞比亚反一党统治	赞比亚	1990年	1991年	一党制
马里反军事运动	马里	1990年	1991年	军事统治
骚动	尼泊尔	1990年	1990年	君主制/潘查亚(Panchayat)政权
学生会抗议	乌克兰	1990年	1990年	马索尔(Masol)政权
民主运动	俄罗斯	1990年	1991年	反政变
斯洛文尼亚独立运动	斯洛文尼亚	1990年	1991年	南斯拉夫统治
阿尔巴尼亚反共产党	阿尔巴尼亚	1990年	1991年	共产党政权

运动	地点	开始	结束	目标
反阿拉普·莫伊(Arap Moi)运动	肯尼亚	1990年	1991年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 (Daniel Arap Moi)
主动之声	马达加斯加	1991年	1993年	迪迪埃·拉齐拉卡 (Didier Radsiraka)
反班达(Banda)运动	马拉维	1992年	1994年	班达政权
民主运动	泰国	1992年	1992年	苏钦达(Suchinda)政权
尼日利亚反军事运动	尼日利亚	1993年	1999年	军事统治
反米洛舍维奇运动	塞尔维亚	1996年	2000年	米洛舍维奇政权
反苏哈托(Suharto)运动	印度尼西亚	1997年	1998年	苏哈托统治
学生抗议（反哈比比(Habibie)）	印度尼西亚	1999年	1999年	帕夏鲁丁·优素福·哈比比 (BJ Habibie)总统
克罗地亚民主运动	克罗地亚	1999年	2000年	半总统制
反迪乌夫(Diouf)运动	塞内加尔	2000年	2000年	迪乌夫政府
反藤森(Fujimori)运动	秘鲁	2000年	2000年	藤森政府
反罗林斯(Rawlings)运动	加纳	2000年	2000年	罗林斯政府
第二次人民权力运动	菲律宾	2001年	2001年	埃斯特拉达(Estrada)政权
反齐卢巴(Chiluba)运动	赞比亚	2001年	2001年	齐卢巴政权
尼泊尔反政府	尼泊尔	2002年	2006年	尼泊尔政府;戒严法
民主运动	马达加斯加	2002年	2002年	拉齐拉卡政权
反桑切斯·德洛扎达 (Sanchez de Lozada)运动	玻利维亚	2003年	2003年	桑切斯·德洛扎达总统
反加约姆(Gayoom)运动	马尔代夫	2003年	2008年	加约姆政权
反阿里斯蒂德(Aristide)运动	海地	2003年	2004年	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Jean Bertrand Aristide)
玫瑰革命	格鲁吉亚	2003年	2003年	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 政权
郁金香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	2005年	2005年	阿卡耶夫(Akayev)政权
多哥反纳辛贝(Gnassingbe)/政变危机	多哥	2005年	2005年	福雷·纳辛贝(Faure Gnassingbe) 总统政权
反他信(Thaksin)运动	泰国	2005年	2006年	他信政权
福拉吉多的叛乱	厄瓜多尔	2005年	2005年	厄瓜多尔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 (Lucio Gutierrez)上校
雪松革命	黎巴嫩	2005年	2005年	叙利亚部队
阿瓦米联盟抗议	孟加拉国	2006年	2007年	临时政府
黎巴嫩政治危机	黎巴嫩	2006年	2008年	福阿德·西尼乌拉(Fouad Siniora) 总理政府

运动	地点	开始	结束	目标
反穆沙拉夫(Musharraf)运动(律师运动)	巴基斯坦	2007年	2008年	穆沙拉夫政府
反萨卡什维利(Saakashvilli)运动	格鲁吉亚	2007年	2013年	萨卡什维利政权
反穆巴拉克(Mubarak)运动	埃及	2007年	2011年	政府
餐具革命(厨具/厨房工具革命)	冰岛	2008年	2009年	盖尔·哈尔德(Geir Haarde)总理政府
人民民主联盟运动	泰国	2008年	2008年	人民力量党政府
反拉瓦卢马纳纳(Ravalomanana)运动	马达加斯加	2009年	2009年	拉瓦卢马纳纳政府
第二次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	2010年	2010年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亲瓦塔拉(Ouattara)运动	象牙海岸	2010年	2011年	巴博(Gbagbo)政权
茉莉花革命	突尼斯	2010年	2011年	本·阿里政权
毛派反政府抗议	尼泊尔	2010年	2010年	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Madhav Kumar Nepal)政府
反穆塔里卡(Mutharika)运动	马拉维	2011年	2012年	穆塔里卡总统政府
反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运动	也门	2011年	2012年	政府(萨利赫政权)
反伊斯兰政府抗议	突尼斯	2013年	2014年	恩纳达(Ennahda)党
与我共舞运动	保加利亚	2013年	2014年	奥雷沙夫斯基(Oresharski)总理政府
公民民主运动	泰国	2013年	2014年	英拉(Yingluck)政府
欧马丹	乌克兰	2013年	2014年	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总统
反穆尔西(Morsi)抗议	埃及	2013年	2013年	穆尔西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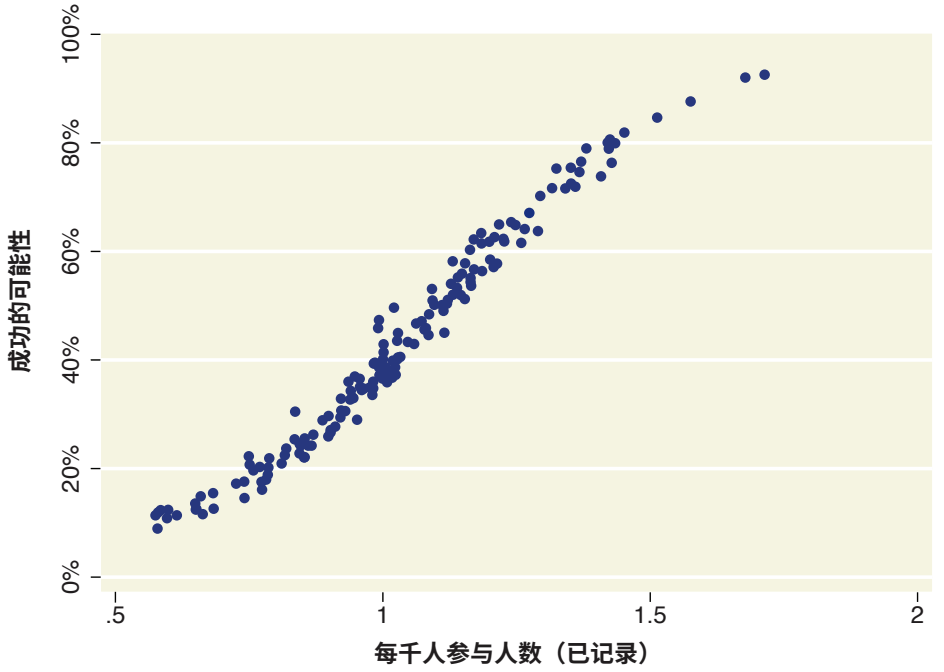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应尽量减少参与运动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低水平的参与都不如高水平的参与好。根据切诺维斯和斯蒂芬:

> *从空间和时间看,大型运动比小型运动更有可能成功。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积极参与者,就会使运动达到最终结果的可能性提高10%以上。考虑[图16],它显示了人均参与人数对预测运动成功概率的影响。显然,随着参与的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30]

30 切诺维斯(Chenoweth)和斯蒂芬(Stephan),《公民抵抗为何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第39页。

图16：参与对竞选成功概率的影响

来源：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杰·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公民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纽约州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年），第40页。



要使公民抵抗成功，是否需要公民参与的门槛？答案是肯定的，有阈值水平，但每个运动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只有事后才知道。

在定量研究中，切诺维斯和斯蒂芬将运动的“参与”定义为“个体积极而可观察地参与集体行动”。[31]根据这一指标，切诺维斯后来发现，在1945年到2014年间的167次非暴力运动中，有165次成功地实现了3.5%或以上的社会人口参与。事实上，许多非暴力运动在参与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32]

31 切诺维斯(Chenoweth)和斯蒂芬(Stephan)，第30页。

32 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关于3.5%规则的问题、回答和一些警示的最新报道”(Questions, Answers, and Some Cautionary Updates Regarding the 3.5% Rule)，*《卡尔讨论系列论文》(Car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20年5月（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2020年春季）。

一个社会3.5%的人口参与度可能看起来非常小，在很多方面的确如此。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切诺维斯–斯蒂芬对“参与”的定义着眼于任何一天*可观察到明显*参与公民抵抗战术的最高人数（例如全国各地参加抗议或其他示威活动的人数）。因此，它不一定代表运动参与的全部规模，因为公民抵抗的许多参与形式是不容易被外部研究者在事后评估中观察到的。具体地说，分散战术或不作为战术（即罢工和抵制）很难按参与率衡量。

每一个观察到的运动参与者都有消极的支持者，他们积极影响公民抵抗运动，他们与认识的人谈论这场运动，让其他人更积极地参与，或者为受迫害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及其家人提供保护、庇护和支持。一个由父母子女、婶叔伯和堂兄弟姐妹组成的大家庭可能只有一个人积极参与冲突，但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支持这一运动，并且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联络人名单来激励他人。

因此，切诺维斯和斯蒂芬确定的3.5%参与门槛很可能低于实际参与人数（其中许多人未必可见），而且肯定低于支持运动目标的总人数。尽管如此，3.5%的统计数据表明公民抵抗力量是多么强大。一个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可能需要大多数人积极或被动地支持该运动，或者至少不阻碍该运动，但它并不需要大多数人在特定时间进行高风险动员以取得成效。当成千上万或数百万人民决定他们将以有组织和战略性的方式明显或无形地撤回对暴君的支持时，暴君就没有能力继续胁迫他们并继续掌权。

目前活跃在战斗中的异议人士的数量，并不比未来可招募的潜在支持者和异议人士的数量更重要。

目前活跃在战斗中的异议人士的数量，并不比未来可招募的潜在支持者和异议人士的数量更重要。竞选领导层不能对高参与率沾沾自喜，因为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热情并在情感上脱离冲突。如果不维持参与率，参与率就会下降，甚至从高水平下降的参与率也是消极的发展。

维持高参与率的方法之一是给公民分配需要定期参与的任务。甘地要求印度人民使用个人织布机纺布。服从甘地的要求有三个好处：它保持了民众的团结和对持续非暴力冲突的认识；它创造了基础，异议人士随时准备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战术；它通过破坏印度国内对产品的出口需求向兰开夏纺织厂施压。

甘地建设性计划目前的表现是建立替代机构。卢克·阿布斯(Luke Abbs)在他的研究*《非暴力抵抗对内战和平转型的影响》(The Impact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War)*中写道：

> *替代机构通常由非暴力运动形成，以对抗效率低下或只是歧视性的国家机构。替代机构，如平行教育和治理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其基础是能够促进包容性的基层活动。*[33]

通过建立替代机构保持高参与率将继续鼓励潜在的双重思想者考虑随着冲突的演变暴露自己。

要动员人民，运动首先要分析为什么人们在社会中仍然服从。吉恩·夏普列举了人们服从压迫性制度的七个核心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在夏普的清单上有所扩展。这里列出了十个核心原因。确定这些原因中哪些对人口的不同阶层有效（甚至包括个人遭遇）是一项重要任务。

33 卢克·阿布斯(Luke Abbs)，*《非暴力抵抗对内战和平转型的影响》(The Impact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War)*（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21年），第45页。

表13

1 害怕惩罚

2 习惯

3 道德义务

4 自利

5 用尺进行心理鉴定

10 个核心原因
人们为什么服从压迫制度

6 冷漠+冷淡

7 缺乏自信

8 无知

9 遵从

10 社区

■ 害怕惩罚

许多人服从是因为害怕惩罚。暴君对不服从的制裁可能包括失去工作、职业声誉、特权、地位、晋升、金钱、财产、法律权利或社区排斥。如果一个政权有选择地和战略性地使用这些非暴力制裁，可能会非常强大。该政权进一步实施低级别制裁的威胁可能与实际使用更严厉制裁（包括人身镇压、监禁、酷刑和死亡）一样具有威胁性。有些人担心自己会受到制裁，大多数人担心制裁会对他们的家人或他们深深关心的其他人产生影响。

关于制裁需要注意的是，其威慑作用是最强大的。国家没有能力一次强迫一个人服从集体，因此它们所做的就是制造对制裁的全面恐惧，使绝大多数人立刻服从。他们通过攻击任何公开违抗命令的人来做到这一点，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人作为榜样，向其他人传播恐惧。

■ 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动或主动服从感知到的权威可以成为习惯。经过多年的训练，人们可能不再质疑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当被接受的权威人物（例如老板、宗教领袖、社区长者、教师、医生、户主）告诉他们要做某事时，他们不假思索地听从命令。

■ 道德义务

有些人遵守压迫性的法律或做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他们的道德义务。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服从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或者是为了延续文化或宗教传统，这比他们个人对自由的偏好更为重要。。

■ 自私自利

私立是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就业、社会地位、家庭安全、大学录取、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其他物质福利或特权都可能导致顺从。一些州试图直接雇佣许多人，以便他们能将这些人的私利与国家的生存联系起来。商界成员也常常因自身利益而与现状联系在一起。

■ 与统治者的心理认同

有些统治者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部落、民族或国家的父亲。人们觉得与这些统治者几乎是一种家庭关系，超越理性地信任他们，在情感上与他们有联系，认为对统治者有利的就是对民族或国家有利的东西。有时，这些统治者带领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如与殖民列强的斗争），然后这个时刻被神话化，成为他们声称拥有持久合法性的基础。在其他情况下，统治者声称拥有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权威，这使他们看上去天生正确，超出了正常的批评。

■ 冷漠和冷淡

人们可能屈服于压迫性统治，因为他们声称自己不关心政治，对暴君所造成的苦难冷漠或冷淡。他们可能会说，痛苦是“本来的样子，一直以来的样子”，因此不值得激动。然而，冷漠和冷淡的说法可能掩盖了更深的无助感。很多人如果觉得自己能产生影响，或者更确切地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就会对自己的压抑做些什么。

■ 缺乏自信

暴君故意营造出一种不可战胜的形象，试图摧毁人们对自己成功挑战体制的能力的信心，或者摧毁人们对暴君统治之外还有其他选择的信心。暴君打压反对派团体，声称没有其他团体或领导人有资格统治。如果出现有人试图挑战暴君而失败的情况，暴君就会对这些情况进行大量宣传，以增强普通民众的绝望情绪。

■ 无知

信息就是权力，暴君竭尽全力让人民不知道政权的腐败、无能、任人唯亲和滥用权力（除了那些他们故意宣传以制造民众恐惧的滥用）。暴君将国家所承受的一切困难都归咎于他人。当公民抵抗运动在腐败、侵犯人权或缺乏政府问责等问题上挑战暴君时，暴君声称成千上万或数百万公民抵抗者本身就是外部阴谋的一部分，是对国家的威胁。人们可能会认为，暴君永远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自愿花时间参加民主运动，冒着风险，做出牺牲，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这是可以通过一些外国势力的行为来解释的。然而，出于无知，有些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并因此继续服从暴君。

■ 一致性

人们在人群中感到安全。当许多人服从命令时，一个人更有可能加入他们而不是特立独行。人们对不一致性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成为第一个停止遵循常规、提出困难的问题、并冒着失去匿名和融入社会的好处的风险的人，是困难和有风险的。

■ 社区

集体意识可以成为同意和服从的强大动力。如果一个社区为人们提供了身份、意义、归属感和认同感，人们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继续成为该社区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个人不同意社区在非暴力冲突期间的行为方式。社区还可以施加同伴压力或设定社会期望，导致人们怀疑或忽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不再以维护社区的名义批判性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

非暴力冲突的领导人需要以高度的粒度盘点他们的支持者。他们需要了解个人被动和顺从的确切原因，并找到办法激励有助于竞选的具体行动。好消息是，当最初不情愿决定完成任何作为公民抵抗力量一部分的任务（或大或小）的人，他们的欲望往往会增长，去做更多事情。前异议人士也是如此：一个简单的反抗行为可以提醒他们自己的力量，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成为胜利的公民抵抗运动的一部分。

清单问题6 暴君对暴力镇压效果的信念是否会减弱？

正如运动员相对信心水平巨大波动导致体育比赛不可预测一样，暴君对暴力镇压的效果的信念以及他释放这种信念的实际能力也取决于他的信心。但如何衡量暴君的信心在增加还是下降？衡量暴君的信仰现状已经相当困难，但要预测这些信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演变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塞尔维亚，促成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倒台的奥特波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伊万·马罗维奇提供了一个相关的见解。他认为认识到暴力程度的下降是“从外而内发生的”，暴君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他的镇压会起反作用的人，因为有几个领先指标在亲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看来更为明显。异议人士将体验到更多的行动自由，鼓励他们参与更高调的破坏活动。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可能会更快地暴露自己，因为对报复的恐惧要低得多。而潜在的背叛者（尤其是来自军队和警察的背叛者）将意识到，仅仅威胁拒绝成为暴力的代理人，他们就可以严格限制暴君使用武力的选择。

暴君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对人民权力运动使用暴力。事实上，从1900年到2006年，88%的（暴力和非暴力）起义都遭遇了暴力。此外，公民抵抗运动遇到暴力镇压时的成功率大约下降三分之一。

暴力可以削弱运动的领导层，限制行动和言论自由，没收必要的资产，剥夺家庭的住所、食物和药品。此外，暴力可以通过镇压一个派别同时向另一个派别让步而制造分裂。最后，暴力可以诱使最沮丧和最害怕的公民抵抗运动成员违背他们对非暴力纪律的承诺。频繁镇压的累积影响会强化民众的恐惧感和无力感，阻碍独立沟通和行进。这些可能性正是暴君在处于强势地位时诉诸暴力的原因。

独裁者可能会发现，在权力衰落时，使用暴力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当使用镇压被认为是独裁政权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因素时，独裁者的正确战略应该是增加暴行直到击败非暴力冲突。这一观点的逻辑后果是暴君使用暴力的意愿应该保持很高，而且永远不会放弃。然而，这一观点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

- 暴君的镇压能力在非暴力冲突期间不会改变；以及
- 暴君镇压的影响不会在冲突过程中改变。

在非暴力冲突中，这些变量可能大幅波动，导致暴君很难评估每一次镇压的价值。异议人士所做的战略决策（特别是在维持高水平的平民参与和严格的非暴力纪律方面）会加剧这些波动，让暴君不确定自己的镇压是否能让他继续掌权。

随着政权对权力的控制减弱，暴君的默认立场是依赖于越来越残酷的镇压。诉诸更残酷的手段并不一定是实力的象征，但可以成为暴君即将失败的领先指标。正是在这个最软弱的时刻，独裁者对警察和军队的命令最有可能被违抗。

感知是关键，但现实也起着作用，因为对暴君来说，依靠暴力来进行政治控制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一个政权来说，镇压最明显的代价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金钱的分配。镇压需要人员、设备（如车辆、防暴装备、武器、监控技术、监狱、法院）以及补偿执法者的资金。每天付钱给警察，让他们上街调查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并将他们送进监狱，代价高昂。解决大规模监禁问题的成本甚至会更高。政权可以接受这些代价，只要它们制造足够的恐惧让社会其他成员犹豫不决和服从。然而，面对持续的大规模抵抗，持续镇压的财政负担可能迅速变得不可持续。

公众示威可能是一个政权最明显的非暴力战术，当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时，它们将变得难以控制。当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城镇发生抗议示威时，政权安保部队就会捉襟见肘。他们无法有效地集中在任何一个领域，政权控制公共示威的能力将严重受损。

现在想一想，如果一场运动同时进行消费者抵制等分散行动，压力将如何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怎么可能查明谁参与了抵制？他们逮捕了谁？如果全国各地有数百万人参与罢工，安保部队怎么能找到他们并逮捕他们？

除了试图压制公民抵抗运动的人力、物质和财政成本外，一个政权使用暴力镇压还会带来失去合法性的风险。该政权被揭露违反了它声称珍视的价值观，背叛了它声称所代表的人民的信任。当非暴力异议人士鼓吹自由和广泛认同的政治信仰时，针对他们的暴力镇压将严重破坏政权对公众想象的控制。

人们可能开始不再把暴君视为国家及其公民的强大爱国保护者，而是将其视为愿意牺牲公共利益来保护自身利益的人。暴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他们的个人形象与国家和国旗的形象同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任何对暴君的批评都是反爱国或叛国。但当暴君被揭露将动用任何国家资源保护自己不受民众、有组织、非暴力异见的侵害时，暴君就不能再声称爱国主义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了。他被视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罪犯、一个叛徒或一个占领者，与他的一小撮亲信一起，为了自私的目的掠夺社会和利用公共资源。

随着威权主义者的合法性开始削弱，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基础越来越坚定。被动的支持者变得更积极，更愿意承担风险。中立或不参与的团体受到暴君不可原谅的暴力的冒犯。暴君无休止的镇压粉碎了一些人可能对他的美德、政权的目的甚至维持现状的幻想。暴君意识到持续暴力可能导致更多支持者忠诚度转变和背叛，从而自身陷入生存困境。

加剧困境的是，暴力镇压的增加将引起国际行动者的高度关注和监督。其中包括多边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侨民社区。即使是与暴君结盟的国家也会随着暴君暴行的暴露而改变忠诚或缓和支持。一般而言，暴君镇压所带来的国际关注增加将导致外部行动者对如何应对冲突的考量发生变化。如果他的国家的某个盟友完全反对他，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对暴君不利。

如果有数百万人参与罢工，安保部队如何找到他们并逮捕他们？

对暴君来说，最具破坏性的风险是他下令对公民使用暴力，而他的副手拒绝服从。这种拒绝将暴君置于致命的危险之中，除非异议人士通过鼓励暴力派别或打破非暴力纪律来释放压力。面对暴力侵害的风险，为了自卫，他的副手们会服从暴君的暴力要求。

一位娴熟的公民抵抗运动领导人必须将不遵守暴君命令的前景放在暴君头脑中的首位。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通过将作为和集中战术与不作为和分散战术排序进行多样化，以保持战斗并经受住压制。只要这一能力存在并以越来越高的技能执行，暴君最终就会失去信心，不再相信镇压是防止权力丧失的终极武器。正是这些战略技能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公民抵抗运动成功的可能性是暴力起义的两倍。

然而，有些人指出，过去正确的事情在将来未必正确。比如，你可以说，今天的最新技术让暴君在与异议人士的斗争中永远受益。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数字独裁者：技术如何强化专制”(Digital Dictators: How Technology Strengthens Autocracy)的文章，作者安德烈埃·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埃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和约瑟夫·怀特(Joseph Wright)写道：

> *人工智能驱动监控的进步是数字威权主义最显著的演变。高分辨率摄像头、人脸识别、间谍恶意软件、自动文本分析、大数据处理等，开启了一系列公民控制新方法。*[34]

作者还认为，技术加强了压迫和服从之间的联系，而异议人士希望消除这种联系。他们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

> *独裁政权不仅利用技术镇压抗议，还强化了旧的控制方法。我们的分析表明，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镇压的独裁政权也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暴力镇压，特别是酷刑和杀害反对者。这表明威权主义领导人不会用数字镇压取代传统镇压。相反，通过让威权主义者的政权更容易识别反对派，数字镇压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决定谁应该被破门或被关进牢房。这种更紧密地针对反对者的做法，减少了诉诸于无区别镇压的必要性，这种镇压可能会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应和精英的背叛。*[35]

34 安德烈埃·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埃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和约瑟夫·怀特(Joseph Wright)，“数字独裁者：技术如何强化专制” (Digital Dictators: How Technology Strengthens Autocracy)，《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0年3月/4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2-06/digital-dictators

35 肯德尔-泰勒(Kendall-Taylor)、弗朗茨(Frantz)和怀特(Wright)，“数字独裁者” (Digital Dictators)。

讨论到此结束了吗?当前的技术进步会继续有利于暴君,直到他们成为未来非暴力冲突的赢家吗?这不太可能。26年前,我观察到:

> *改变冲突环境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由于有组织的社会冲突需要改善廉价、高效和谨慎的沟通渠道,因此战略性非暴力冲突更容易实施,也更具相关性。事实上,从个人计算机到传真机、寻呼机和手机等新技术已经为非暴力斗争实践者创造了全新的机会。尽管有许多战略家利用这些新机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但我们必须指出,技术进步并没有给民主和非暴力人士带来永久的优势。同样的工具也可以用来统治和镇压。他们不会解除非暴力战略家的基本战略义务:超越对手。*[36]

因此,我们不应认为新的技术发展将给暴君而不是异议人士带来永久的利益,因为局势可能迅速逆转。例如,今天的食品行业使用非常小的射频标签来跟踪盛放送货上门产品的包装袋。想象一下,拿着这个标签,提高传输范围,然后把它放在一张邮票大小的卡片上,另一面粘住。向伊朗、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威权主义国家发送数百万个标签。异议人士现在将有一种新形式的标识挂在室外墙壁上,以表达颠复信息或传达如何以及在哪里执行特定的非暴力战术。另一个技术机会的例子是翻领别针,它能发出信号,让放置在街头的州级高分辨率扫描仪无法探测到个人的脸。或者一个小型手电筒装置,它可以烧毁监控镜头,使其无法使用。此外,有什么理由认为最新、最具破坏性的恶意软件只能供暴君使用?

---

36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克里斯托弗·克鲁格勒(Christopher Kruegler),*《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的人民力量动态》(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Praeger Publishers, 1994年),第xxiii页。

“数字独裁者”的作者肯德尔-泰勒、弗朗茨和怀特指出了中国人工智能(AI)最有害(也最聪明)的用途:

> *没有哪个政权能像中国那样彻底地利用人工智能的压制潜力。中共收集了数量惊人的个人和企业数据:纳税申报表、银行对账单、购买记录、犯罪和医疗记录。当局随后利用AI分析这些信息并编制“社会信用评分”,试图利用这些评分设定可接受行为的参数并改善公民控制。被认为“不可信任”的个人或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国家资助的福利之外,如免押金的公寓租赁,或者被禁止乘坐飞机和铁路旅行。尽管中共仍在完善这一体系,但大数据分析和决策技术的进步只能改善政权的预测控制能力,也就是政府所谓的“社会管理”。*[37]

如果人工智能可以用于社会控制,那么应用程序可以被开发为异议人士识别潜在政权背叛者的手段。比如,应该有办法允许人们参与匿名公投以表明他们不断变化的忠诚和偏好。这一能力将提供揭示社会真实偏好的机会。这可能证明威权主义者的支持率比一般认为的要弱得多,有可能为更大程度的公民不服从铺平道路。

中国今天花费的数十亿美元可能会导致对技术产品的过度依赖,而技术产品必然会退化。在不远的未来,主要依靠技术维持权力的暴君可能会发现,他们创造了一个现代版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例子,而这个防线是假想的而非实际存在的。

清单问题7 暴君关键支持者的背叛可能性是否会增加?

除非暴君及其最亲密的盟友发生信仰危机并单方面放弃权力,否则非暴力冲突不可能不发生背叛,特别是在安保部队。如果背叛发生在暴君最依赖其控制民众的支持者中,则受益最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背叛令暴君感到意外,这将导致他在使用武力上犹豫不决,因为他将不确定下一步哪个盟友会让他失望。

37 肯德尔-泰勒(Kendall-Taylor)、弗朗茨(Frantz)和怀特(Wright),“数字独裁者”(Digital Dictators)。

对专制政府的一个普遍误解是他们是铁板一块的，他们的支持者永远团结在一起。但是，暴政依赖于许多不同个人和团体的支持，包括企业主、劳工、银行家、官僚、警察、军人、法官、宗教组织领导人以及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等行业的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文化、历史、社会网络和竞争对手。只有在这些不同的个人和团体控制彼此之间的分歧、缓和不同利益并采取合作行动支持政权的情况下，专制政权才能有效运作。只要有反对意见，暴君就必须将其孤立并使其沉默。

大多数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些选区的能力是固定不变的，而非暴力运动对这些条件的影响很小。比如，安保部队的兵力是根据预算、设备、人员、培训和经验来计算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公民抵抗运动要面对的是一位拥有一贯镇压能力的暴君。但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抵抗运动能够侵蚀暴君安全部门的能力和凝聚力。异议人士通过加剧安全部门内部个人和单位之间的分歧、增加维持现状的不确定性以及助长背叛来达到这一目的。

安保部队不是唯一一个在冲突过程中背叛暴君的群体，但他们是最受研究关注的群体。在对塞尔维亚（2000年）和乌克兰（2004年）的比较研究中，阿妮卡·宾嫩代克(Anika Binnendijk)和伊万·马罗维奇就非暴力冲突中军队背叛的重要性作出了以下结论：

> *对国家安保部队的战略关注可以在非暴力斗争的战场上发挥三大作用：防御、威慑和压制。防御角度，它可能会再次使政权的暴力武器对其盟友和非暴力运动本身的冲击减弱（艾克曼和克鲁格勒，1994年）。随着镇压成本的增加和镇压反对派的能力的降低，政权领导层可能会被吓阻，不再试图使用强制性武力（达尔(Dahl)，1971年）。最后，一场运动削弱了政权的核心力量之一，可能迫使其接受新的选举标准，甚至下台。*[38]

38 阿妮卡·宾嫩代克(Anika Binnendijk)和伊万·马罗维奇(Ivan Marovic)，“权力与说服：影响塞尔维亚（2000年）和乌克兰（2004年）国家安保部队的非暴力战略”（Power and Persuasion: Nonviolent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State Security Forces in Serbia (2000) and Ukraine (2004)），*《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第39卷，第3期（2006年9月）：第411– 429页。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发现，在公民抵抗运动中曾出现“[安保部队]在执行政权命令时出现大规模、系统性崩溃”的案例，[39]他们发现，出现此类背叛会使运动成功的概率提高58%。

以下是安保部队背叛对非暴力冲突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十一个重要例子。

表14：安保部队大量背叛的非暴力运动

运动	年份
伊朗针对巴列维国王的非暴力革命	1978-79年
智利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	1985-1988年
菲律宾人民的力量	1983-1986年
苏联对八月政变的非暴力抵抗	1990年
塞尔维亚推土机革命	2000年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2004年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	2011年
在布基纳法索发起的针对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的布基纳法索起义	2014年
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	2018年
玻利维亚民众起义反对总统莫拉莱斯	2018-2019年
阿尔及利亚的微笑革命	2019-2020年

39 切诺维斯(Chenoweth)和斯蒂芬(Stephan)，*《公民抵抗为何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第48页。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的研究没有集中于常规的个人从安保部队背叛，也没有将运动成功率与司法、商界、政党、官媒、官僚机构、宗教机构的领导人物或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物背叛联系起来。然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统一规律，所有对于威权主义者政权的背叛对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都是有益的。

实现暴君最亲密盟友的背叛要比动员普通公民参与非暴力冲突困难得多。一个三心两意的异议人士，在参加了一次针对暴君的非暴力战术交锋后，可能会退却。然而，一旦一个知名的潜在双重思想者透露了自己的双重思想者身份，就没有回头路了。当关键的暴君效忠者思想发生变化时，他们会在冲突持续期间保持这种思想。

随着运动参与者数量的增加，潜在背叛者的数量也会增加。相反，随着运动参与度的减少，潜在的双重思想者会选择隐藏起来，直到他们感觉到势头逆转，新形势有利于异议人士。这就是为什么背叛更有可能发生在非暴力冲突的中后期。

什么样的论据鼓励公民脱离专制政权?对于所有冒着独特风险的潜在背叛者，没有公式或一刀切的方法。吉恩·夏普构想并确定了由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所触发的整个冲突过程中的四种变化机制。[40]其中每一种机制都描述了公民抵抗运动改变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并恰当地描述了诱导背叛者公开放弃暴政的四种方式：

- 转换；
- 迁就；
- 被迫；以及
- 分裂。

40 吉恩·夏普(Gene Sharp)，*《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性第三部分非暴力行动动态》(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Action)*（马萨诸塞州波士顿：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1973年）。

■ 转换

在转换过程中，仅凭这项运动能带来的好处，能够说服一个人或团体，这一事业值得支持。潜在的背叛者从忠于政权开始。在他们一生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努力使政权成功。要说服潜在的双重思想者放弃这一使命，异议人士首先必须制造认知失调。这需要多次接触。如果想要转换潜在的背叛者，需要由公民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对其积极培养。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必须通过定期与有背叛倾向的人对话来不断扩大潜在转换者名单。

通过破坏现状的非暴力战术，以及在文化上感同身受的沟通，公民抵抗运动可以在所谓效忠者身上制造认知失调。潜在的背叛者逐渐对政权赖以存在的谎言更加敏感，并开始意识到政权正在为自己的利益剥削人民，包括他们。关键人物可能开始将非暴力运动视为民众渴望的真正代表。在转换过程中，希望和信心开始取代绝望和迷失。随着转换风险的降低，双重思想者开始更多地显露出来。随着暴君的脆弱性日益显现，人们对运动成功前景的信心也随之增强。

■ 迁就

迁就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决定他们的自身利益在于转移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在商人和其他经济精英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他们通过公民抵抗运动意识到他们可能会因为继续被动或积极地与政权结盟而失去越来越多的金钱。因为企业主主要关心的是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价值，所以支持威权主义者与其说是原则，不如说是权宜之计。如果暴君变得更加暴虐，他们可能会认识到通过背叛来满足公民抵抗运动的要求是保护他们财务状况的最有效方法。当公民抵抗运动危及企业所有者和工人的经济利益时，是否继续参与暴君的不道德统治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

■ 被迫

被迫是指那些积极反对公民抵抗运动的人由于害怕继续支持暴君的后果而背叛。当前盟友确信暴君的统治即将结束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他们对暴君的持续忠诚不再是安全的选择。相反，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好准备，迎接公民抵抗运动不可避免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过渡时期。有很多忠心的暴君支持者最终背叛的例子，当他们开始觉得暴君已经完蛋了，他们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暴君，亲手实现自己的预言。

■ 分裂

分裂是指一个政权迅速而无法控制地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忠诚的政权存在了。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往往是一种危险的局面，除非他们能够迅速用一个受欢迎且可实现的过渡计划填补权力真空。在不清楚下一步应该采取何种治理形式的情况下，前政权支持者和军方可能会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新政权，企图发动政变并试图通过武力“恢复稳定”。为了防止这一可能性，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增加与他们的背叛目标的对话。他们还可以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制定过渡进程和计划，在需要时可以作为模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机制描述了不忠是如何发酵和爆发破坏独裁的。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背叛都始于公开行为。背叛的形式可能只是缓慢或低效地执行命令。可能包括匿名破坏或故意错误提交重要文件的行为。可能包括开始与公民抵抗运动领导人进行地下谈判，并向他们传递信息和资源。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些微妙和低层次的背叛行为大多难以发现或对抗。公开的违抗很容易识别和惩罚，而故意的无能和秘密的违抗更难对付。

群体或子群体的背叛会加速来自其他人的背叛。经济学家兼政治学家提莫·库兰(Timur Kuran)解释说,(出于任何原因)对政权不满的人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公开表达他们的真实偏好(即反政权)还是通过表达对政权的支持来伪造他们的真实偏好。[41]选择隐瞒真实偏好的人会为此付出心理代价。他们仍将继续服从政权,直到这样做的外部风险超过表达他们真正偏好的好处。

不同的人在暴露自己真实偏好时,有不同的风险容忍度阈值。对一些人来说,继续伪造偏好的内在心理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非暴力冲突初期就决定必须表达他们对政权的真实感情。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开始改变其他同样伪造偏好的旁观者内心的算盘。当旁观者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背叛时,他们也决定背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背叛,背叛的好处被认为超过了继续服从政权的好处。

2005年至2009年间,我担任自由之家主席,其中一位共同主席是马克·帕尔默(Mark Palmer)。马克是美国推进民主的象征。他的著名著作《*打破邪恶的真实轴心:如何到2025年驱逐世界最后的独裁者*》(*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How to Oust the World's Last Dictators by 2025*),受到与本卷相同价值观的推动。马克在1986-1990年的重要年份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他告诉我,在这个动荡时期,匈牙利宣传部长与他接触。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问马克在后共产主义匈牙利,他能做些什么。马克反应迅速:"当然要开一家通信公司。"马克告诉我,这正是前宣传部长最后所做的。想想马克的话给他带来的安慰吧。他对深渊、对某些定义模糊但危险的"过渡正义"的恐惧被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他未来的希望和乐观。这使得宣传部长不再执着于以工具人的角色支持日益不合法的共产党领导层。

41 提莫·库兰(Timur Kuran),《*私下的真相、公开的谎言*》(*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马萨诸塞州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年)。

库兰将一个人选择表达对政权的真正偏好的点称为“革命门槛”。他指出，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革命门槛，但随着背叛门槛较低的人开始触发背叛门槛较高的人背叛，会出现一连串背叛。如果相信有百分之一的人已经背叛，有些人可能愿意背叛。随着革命门槛为“1%”的人加入运动，他们的参与会将运动总参与率提高到2%。这反过来又触发了“2%”革命门槛的人群，他们的参与会让总参与率达到3 %，进而引发下一轮背叛……

对某些清单问题的回答对于催化背叛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平民参与（清单问题5）、非暴力纪律（清单问题2）和战略规划（清单问题3）。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表明，平民参与程度高大大增加了安保部队背叛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对于非暴力运动来说，随着抵抗运动成员的增加，安保部队背叛的概率稳步增加”，“规模最大的非暴力运动发生安保部队背叛的概率约为60%，比规模最小的非暴力运动增加50%以上。”[42]参与公民抵抗的人越多，他们与政权支持者的联系就越多，不管是基于亲属关系还是个人或职业关系。所有这些接触点都可以用来施加影响和触发背叛。

《清单》的另一个有助于导致背叛的方面是保持非暴力纪律。如果暴君的支持者感到身体受到威胁，他们绝不会表现出背叛的意图。此外，由于非暴力纪律与公众高运动参与度相关，维持非暴力纪律也可能间接导致背叛。

42 切诺维斯(Chenoweth)和斯蒂芬(Stephan)，*《公民抵抗为何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第48页。

相反，虽然安保部队背叛可以而且确实发生在暴力起义期间，但发生的频率较低。原因有几个。暴力起义实际上可以增加政权与其支持者之间的凝聚力，后者因为共同的威胁而感到团结一致。安保部队不太可能相信，如果他们转而忠诚于暴力起义，他们就不会受到报复。

赢得公民抵抗运动的每一项战略都需要考虑详细的计划，通过有意识的战术排序实现背叛最大化。每个潜在团体及其个别成员都应成为目标，并进行多次接触。一次接触将潜在的双重思想者转变为活跃的异议者，这不是一个现实的期望。有些情况下，个人已经成熟接受这种转变，但需要更多的鼓励。有争议的思想需要时间在个人意识中成熟。这通常会经历四个阶段：

- 背叛？一个可怕的想法对我来说充满了危险。
- 背叛？我听说其他人有这种可能性。
- 背叛？我一直都知道这有道理。
- 背叛？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主意。

要理解如何推动背叛，关键的第一步是发现和评估事实。对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想要影响的特定群体成员越熟悉，这些活动家就越有能力开发有效的定制战术和沟通。详细了解个人倾向至关重要。

为了彻底，需要为支持暴政的每个团体、子团体和个人制定互动计划。然后，必须就谁应该成为背叛的主要目标进行先后排序。目标的灵活性也是关键，因为任何战术的成败都可能决定下一步要与哪些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对话。

也许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没有什么比扩大与一群潜在的双重思想者的对话更能与成功联系在一起了。只要运动呈现积极势头，他们就可以继续推动不可阻挡的背叛浪潮，暴君不可能将形势逆转。

清单问题8

冲突后的政治秩序是否可能与民主价值观出现一致?

如果一场反对专制政权的成功运动是由公民抵抗推动的,那么它最有可能带来民主。异议人士对这种说法高度自信,因为有多种支持数据来源。其中之一是学者乔纳森·平克尼的一项重要研究,他考察了331次非民主政权的过渡,其中包括78个由公民抵抗引起的过渡。[43]

平克尼在评论公民抵抗推动政治转型的一系列国家时发现,"这些国家非常多样化。这不仅仅是拉美故事、非洲故事、欧洲故事,而是一个具有深刻变革效应的全球现象故事。"[44]

在进行统计分析后,他的主要结论是:

非暴力抵抗对民主的独立影响是巨大的,如果非暴力抵抗引发政权过渡,那么国家以至少某种基本的最低民主水平结束过渡的可能性

图17:至少有一个公民抵抗导致过渡的国家(1945–2015年)

来源: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在群众非暴力起义后建立民主》(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18年),第27页。

■ 从1945年到2015年至少有一次公民抵抗导致过渡的国家

43 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在群众非暴力起义后建立民主》(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 Building Democracy After Popular Nonviolent Uprisings)*(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18年)。

44 平克尼(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第27页。

将增加一倍以上。如果没有公民抵抗，过渡结束时跨越民主门槛的概率约为30％。如果有公民抵抗，这一概率跃升至70%左右。[45]

平克尼关于公民抵抗运动成功后民主结果概率为70%的结论证实了非暴力起义的影响。

然而，这也应该促使我们思考一个事实，即30%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这表明，即使公民抵抗运动获胜，也仍然存在无法实现民主秩序的风险。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在非暴力冲突的早期阶段基于共同的愿望团结一致推翻暴君是一个挑战，但就暴君下台后政府机构如何分配利益达成详细一致则是另一个挑战。例如，农民可能希望更便宜的按揭利率，以及继续就农产品销售提供补贴。城市居民可能会关心清洁用水和改善公共安全。公共部门工会可能要求更早的退休日期和更丰厚的养老金。职工父母可能希望更好的工作前景和必要的工资水平。学生毕业后可以要求奖学金和更多就业保证。老年人可以优先考虑降低药品价格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这份清单可能会增加，但没有人确定冲突结束后谁的关切会被优先解决或将如何对这些关切进行排序。

一开始就把精力集中在地方事务的细枝末节上，会消耗抵抗运动的能量。即使是异议人士之间微小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被聪明的暴君利用。异议人士越频繁地为未来的利益争吵，信任就越会被削弱。

随着对未来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不可避免地增长，一心想削弱暴君的领导人很难满足这一需求。缺乏对运动领袖能够带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序过渡的信心，在某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把对暴君所提供的可预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物质福利的渴望放在定义模糊的“民主”转型之前。

45　平克尼(Pinckney)，《*当公民抵抗获得成功*》(*When Civil Resistance Succeeds*)，第38页。

甘地在1931年成功举行了“争取印度独立的食盐长征”之后来到英国进行谈判。

此外，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越紧张，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就越不可能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关于冲突后秩序将带来什么的一些普遍接受的观点可能会让现有政权的关键支持者有信心背叛。

在某些情况下，公民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可能需要听从政治领导人的指挥，他们对于激励民众接受后专制秩序至关重要。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期间，1980年代有300个公民团体充当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领导人的代理人，这些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事实上，那些仍然被监禁的人是公民抵抗运动的受益者，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会接受使他们获得自由的战略。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从未放弃使用暴力结束种族隔离。尽管他享有崇高的地位，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层在1970年代依赖游击队暴力未取得成功，沮丧之余他们决心参与公民抵抗运动。1980年代面对非暴力冲突的最好例子之一就是由姆胡塞利·杰克(MkhuseliJack)领导的伊丽莎白港消费者抵制运动，影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记述了这一运动。*[46]

46 该纪录有多种语言版本，可在以下网页查阅：https://www.nonviolence-conflict.org/force-powerful-english/。

尽管曼德拉对使用暴力反对种族隔离的开放态度在战略上并不合理，但也不应该贬低他出狱后的关键作用和才华。他在政治上非常成功，以非暴力方式进行了权力交接，最终实现了自由选举，使他成为种族隔离后南非首位总统。

伊朗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声称，数百万反对现政权的伊朗公民在民主、世俗主义、世界人权宣言、所有伊朗人（不分宗教、性别和种族）的平等公民权利以及致力于镇压毛拉并避免武装斗争的公民抵抗运动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指出，在未来也存在分歧的领域或人们“为了同意而同意”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朗未来民主制度中的国家象征是国王还是民选总统，以及人民治理国家的细节，包括权力如何在不同地区分配。

著名的异议人士和作家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指出，运动必须至少赢得两个胜利：首先，他们必须战胜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其次，他们必须赢得他们所主张的东西。没有一本普适的剧本把两场胜利联系起来。

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设计非暴力战术，使得后专制社会中具有潜在竞争利益的群体之间能加强合作。在非暴力冲突中，当重心不同的人承担风险并肩而立时，就有了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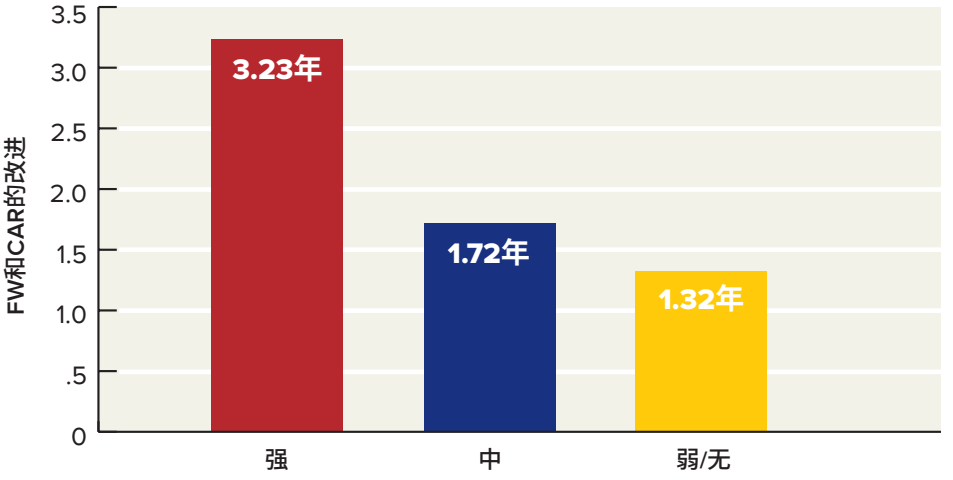
2005年，我与人合做进行了一项研究：*《如何赢得自由：从公民斗争到持久民主》*。它回顾了过去33年的67次过渡，并得出如下结论：

> *在内部，基础广泛的公民联盟是实现妥协、共同价值和自律的环境。随着不同的团体学会与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其他团体合作，它们为作为民主关键组成部分的宽容与妥协创造了基础。与此同时，以群众为基础的公民运动成为后过渡期培养未来公民领袖、政治家、舆论制造者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摇篮。它们成为新领导团队出现的机制，常常创造出能够引导过渡时期走向自由的人才库。*

图18：非暴力公民联盟越强大，自由收获越大

来源：卡拉特尼基(Karatnycky)和艾克曼(Ackerman)，*《如何赢得自由》(How Freedom Is Won)*，第18页。

FIW = "世界自由" CAR = "综合平均评分"（FIW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分的平均值。打分范围为1-7分：1代表最高等级的自由，7代表最低等级的自由。



简言之，基础广泛的民主联盟可以向领导人和活动家灌输促成成功民主治理的原则和经验。[47]

图18根据公民联盟的力量将67次过渡分为三类：强、中、弱/无。该研究利用自由之家在世界自由指数中的综合平均评分(CAR)分析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收益。[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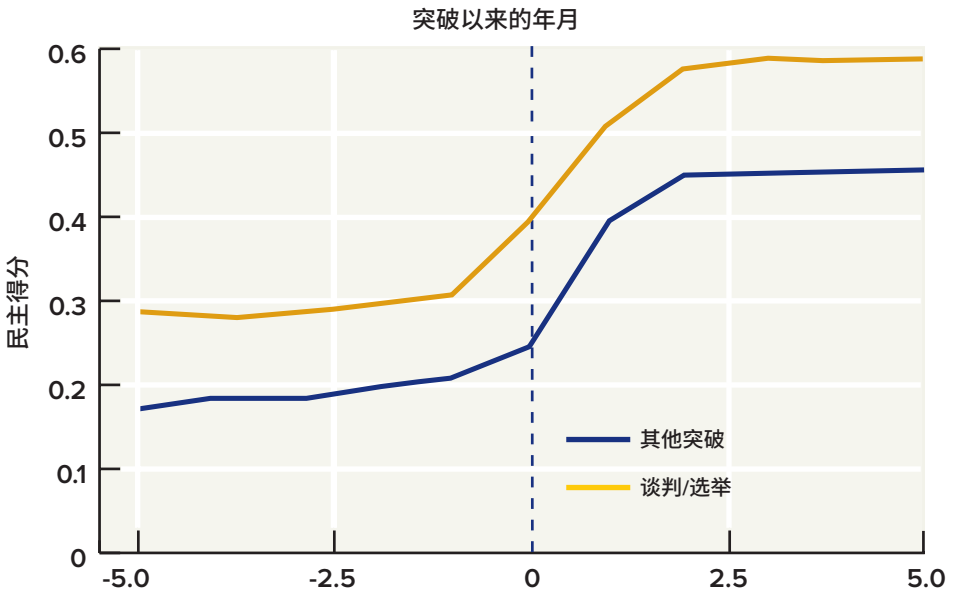
47 阿德里安·卡拉特尼基(Adrian Karatnycky)和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如何赢得自由：从公民斗争到持久民主》(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Struggle to Durable Democracy)*（华盛顿特区：Freedom House, 2005年），第12页。

48 自1972年以来，自由之家每年对每个国家进行排名，从1（最自由）到7（最不自由）。他们按《世界人权宣言》定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矩阵来分配评级。这两个数字的平均值是综合平均评分(CAR)。比如，自成立以来，朝鲜的双七排名一直没有改善，即CAR为7。

图19：不同突破的民主平均水平

来源：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如何赢得漂亮：公民抵抗突破和民主之路》(How to Win Well: Civil Resistance Breakthroughs and the Path to Democracy)*（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21年），第12页。

虚线表示突破年份。民主是用民主多样性项目（科佩奇(Coppedge)等人2018年）中的政体评分来衡量的，评分范围从0（完全不民主）到1（完全民主）。



每一个国家的综合平均评分（每年都会评分）可以进行独特的汇总，以显示全世界民主地位的趋势。例如，假设自由国家平均得分为2分，而非自由国家平均得分为6分，自由和非自由之间的差距约为4分。

与非暴力冲突结束时与开始时相比，自由之家给强联盟国家的打分改善了3.23分（总分7分），这代表了民主状态的大幅提升—几乎是从非自由到自由的整个过程。弱联盟国家得分仅改善1.32分。在非暴力冲突期间，联盟力量越大，冲突后社会就越民主。今天，如果每个总体上不自由的国家都经历3.23的评级改善，那么世界秩序与和平面临的最危险威胁就会消失。

当暴君失去合法性时，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公民之间关于未来民主形态的讨论应该更频繁、更具体。普遍认识到胜利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意味着公民抵抗运动应该能够容忍更多的分歧。一个关键的领导技能是在向新民主秩序过渡的过程中把握何时以及如何表明紧张局势。

最后一个可能破坏民主结果的风险因素是暴君及其效忠者拒绝接受失败。暴君的命运重新崛起，并可能在民众和异议人士之间制造新的分裂，前景如何？

为了防止这种后期逆转，需要一些事件来标志冲突的结束。平克尼确定了六个"突破性"事件，使公民抵抗运动"从街头走向权力走廊……从而导致……现任政权发生重大变化。"[49]它们是：

- 反对派与不民主政权的全国谈判
- 全国竞争性选举
- 不民主政权首脑辞职
- 外部干预
- 政变（暴力或和平）
- 压倒不民主政权[50]

图19显示，两个突破性事件尤其为长期民主治理提供了最佳前景：全国谈判和竞争性全国选举。[51]

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应该期望国际社会继续帮助促进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和平谈判。[52]

---

49 乔纳森·平克尼(Jonathan Pinckney)，*《如何赢得漂亮：公民抵抗突破和民主之路》(How to Win Well: Civil Resistance Breakthroughs and the Path to Democracy)*（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 2021年），第5页。

50 这相当于暴政解体时夏普的机制。

51 平克尼(Pinckney)，*《如何赢得漂亮》(How to Win Well)*，第13页。

52 有关国际社会作用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国内选举监督员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 of Domestic Election Monitors, GNDEM)发表的《全球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Global Principles)，该网络在8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51个成员组织，以及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最近发表的论文：《调解群众运动》(Mediating Mass Movements)，其中讨论了外部谈判者在调解非暴力运动结束方面的价值。https://www.hd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Mediating-Mass-Movement.pdf。

生活在最专制政权下的100万人民有可能大大提高对公民抵抗的可能性的认识。尽管这一数字与地球上数十亿的公民相比显得很小，但对于威权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因为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快速增长。

5

第五章

异议人士如何增强信心：

自由清单练习

前几章所述清单问题如果得到适当利用，可以成为异议人士的特别培训工具。这些问题为公民抵抗研讨会的毕业生提供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使他们能够在国内提升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技能。但是，以前从未参加过研讨会的异议人士是否也可以使用《清单》？答案是肯定的，这对世界民主的未来前景具有重大影响。

传统的公民抵抗研讨会课程为个体参与者提供了最有效的平台，以获得关于非暴力冲突的普遍见解。这八个清单问题有可能在公民抵抗运动的任何特定时刻形成团体对通往胜利最佳道路的清晰度和共识。最重要的是，本土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可以发现这条道路，而无需依赖国外所谓专家的建议。

从我获得博士学位到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我在华尔街工作了十五年。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一家著名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主管。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工作，让我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优秀高管，包括制造、服务、技术、食品、医疗保健和媒体。我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从不同部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和法律）吸引最优秀的员工，并说服他们致力于解决彼此的问题。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召集一次为期一两天的深入练习，其中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对彼此需求和限制的相互认识。下一步是集体讨论合作行为的最佳机会。最后一步是相互承诺执行具体任务，从而形成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促进企业的使命。

我们公司也进行了类似的练习。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要求公司财务和高收益部门的主要成员开会36小时。目的是寻找新方法，尽快增加我们的投资银行收入。起初，人们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抽象的理念上，而不是集中于需要立即注意的具体交易。然而，36小时结束后，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到共同经历的活动的价值。在10年的时间里，该公司的投行收入从第26位上升到了第1位。

自由清单练习是为了反映我作为一名金融家所经历的36小时。我预计，在不依赖外部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异议人士可以在类似的短时间内合作，找到方法大大改善他们相对于暴政对手的竞争地位。建立自信的团队文化将创造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当100万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完成这项练习时，世界上的暴君要小心了。

这本书中经常提到，暴君最大的资产是民众迷失方向。以下是解药：自由清单练习。

清单练习分为五个阶段：

- 组织
- 介绍
- 评估
- 创新
- 承诺

■ 组织阶段

第一阶段涉及筹备活动。包括任命一位引导员（或许还有一位助理）、招募参与者以及寻找合适的地点开会。

引导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每位参与者的想法被充分准确地传达。引导员对公民抵抗有深刻的理解是有益的，尽管不是强制性的。显然，引导员的一个来源将是那些过去接触过公民抵抗的人，尽管并非每个异议人士都必然成为最佳引导员。

引导员负责为36小时的课程招募20人。如果参与者代表了广泛多样的利益，那是最理想的。出现尖锐分歧的可能性越大越好。为什么?因为早期的摩擦可以演变为更高层次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参与者之间发生的转变事件是清单练习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引导员必须事先与所有参与者交谈，了解他们的背景和观点，并建立信任。特别重要的是确定每位与会者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并认识到第2章所列五项信息的用处（请参见第24页表4）。引导员的作用包括确保分歧不会影响练习。了解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对于建设性地使紧张局势浮出水面以及帮助解决紧张局势可能至关重要。

引导员的下一个任务是亲自找到一个地方开会。这可能需要寻求资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该地点必须避免外界干扰。地点应足够宽敞，足以容纳所有参与者，同时也能让大家单独讨论。此外，在36小时内，参与者需要获得必要的设施，以使他们能够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引导员还必须携带大画架垫和粗记号笔来记录所讲内容。当每张纸都填满了信息时，应该用胶带粘在墙上，这样每个参与者就能记录其他参与者的想法。最后，引导员需要确保每位参与者都有足够的纸张和笔来完成各自的任务。

■ 介绍阶段

介绍阶段的目的是让参与者知道房间里其他人都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有资格出席，消除他们的不适感。这也是确保每个参与者清楚公民抵抗的关键概念的时刻。参与者至少应该阅读这本书并吸收异议人士需要在第2章中了解的五个理念。

如果参与者不清楚每个清单问题的含义，本练习将无法发挥其潜力。在介绍阶段，如果与会者认为清单既不明确、不全面，也不现实，也许应该请他们表达自己的疑问。邀请参与者在这个阶段提出批评实际上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每个清单问题的含义和目的。

积极对话将使引导员能够向与会者澄清术语问题（例如解释公民抵抗与非暴力不同），这些问题可能在评估和创新阶段造成混乱。

最后，引导员将概述在评估、创新和承诺阶段对参与者的期望。

■ 评估阶段

评估阶段始于引导员要求每位参与者找到一个隐蔽的地点，按以下顺序从两个角度分析《清单》：

- 首先，用1至10的分数回答清单上的每个问题。非常强烈的“是”表示10分，非常强烈的“否”表示1分。
- 接下来，按重要性回答清单问题1-4（培养能力）。“1”表示最重要，“4”表示最不重要。
- 最后，按重要性回答清单问题5-8（应对冲突）。“1”表示最重要，“4”表示最不重要。

清单 自由练习

培养能力（问题1-4）

重要性排名1－4

- ☐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本着理想、领袖和获胜战略来团结大众？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同时使其战术选择多样化？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公民抵抗运动的战术使用顺序是否基于破坏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发现了让外部支持更有价值的方法？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应对冲突（问题5-8）

重要性排名1－4

- ☐ 面对暴政的公民数量和多样性是否有可能增加？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暴君对暴力镇压效果的信念是否会减弱？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暴君关键支持者中的潜在背叛者是否会增加？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 ☐ 冲突后的政治秩序是否可能与民主价值观出现一致？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

不应假设答案为最强烈的“否”的清单问题是小组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以下是清单练习最相关的地方。虽然清单问题是根据这些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假设拟订的，但只有当地异议人士才能根据他们的情况给予适当优先。

单独分析应在45分钟内完成，然后引导员应重新召集所有参与者。每个人都应展示自己的排名和推理，引导员则应在画架垫上张贴分数。假设20名参与者每人展示5分钟，那么所有的分数可以在100分钟内整理出来。评估阶段可在3小时内完成。

在每个阶段，每个参与者清晰而简洁地提出自己的观点非常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参与者的“尖锐观点”击退另一参与者的想法。在休息、用餐和承诺阶段，将有大量时间进行严格的辩论和批评。评估和创新阶段的目的是根据每位参与者独特的经验，从他们身上汲取最佳创意。只有在非强制性和自发的情况下，一致意见才能得到重申。

■ 创新阶段

创新阶段侧重于参与者认为最重要的清单问题，并每次解决一个问题。

引导员将重点放在小组选择解决的单个清单问题上，要求每位参与者前往单独地点45分钟，并列出他们关于如何改善当地情况的五个最佳想法，以将分数从1提高到10。

然后引导员重新召集参与者，每个人描述他们的五个最佳想法。引导员用尽可能少的文字在画架上写下他们的想法。引导员将列出20位参与者的100个不同想法（当想法重叠时，引导员将酌情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想法）。如果没有更多的书写空间，引导员应撕下画架的表，并用胶带粘在墙上，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和参考。

然后引导员要求每位参与者回到他们的单独地点待15分钟，看看墙上贴着的所有关于改善的建议，然后选出五个他人提出的最佳建议。重新召集时，引导员会在前述选择旁边打一个复选标记，创建100个独立的复选标记。然后，引导员可以在单独的画架垫上写下10个勾选次数最多的想法并按顺序排列。

创新阶段可在3小时内完成。

■ 承诺阶段

这个时候，参与者在目睹并评估同僚关于如何打败对手的不同观点后，会有强烈认同感。与其他阶段相比，承诺阶段结构性弱，主观程度较高。前几个阶段应该让这些人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来战胜暴君。承诺阶段寻求回答以下问题：我们当中谁应该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负责？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定了自由清单练习的目的。但是，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基于当地参与者的反应的真实答案，以及来自冲突地区之外、不受暴君压迫风险影响的参与者的非真实答案。

分离真伪要求引导员训练有素。他们必须避免提出自己的战术或战略观点，而是集中精力鼓励参与者表达他们认为最好的想法。如果每个想法都得到尊重，然后由参与者自己做优先性排序，结果将是更有信心采取行动。

成功承诺阶段的基础在头24小时奠定。半小时的休息和用餐时间允许参与者互相提问，探讨意见一致和分歧的领域，以及他们对公民抵抗运动下一步的想法。承诺阶段将允许参与者根据已在同僚面前测试的想法释放他们积累的能量和热情。

承诺阶段不需要单独分组。这是第一次允许激烈批评和辩论的小组讨论。承诺阶段结束时，参与者都认为他们都有足够的工作来推动冲突的势头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表16：36小时的清单练习计划	
第1天	
早上7:00 –早上8:00	早餐
上午8:00 –上午10:00	*入门阶段*
上午10:00 –上午10:30	休息
上午10:30 –下午1:00	*评估阶段*
下午1:00 –下午2:00	午餐
下午2:00 –下午4:30	能力建设的关键清单问题的*创新阶段*（45分钟独立思考，1:45分钟小组讨论）
下午4:30 –下午5:00	休息
下午5:00 –下午5:45	能力建设的关键清单问题的*承诺阶段*（第1节）
晚上6:15 –晚上7:15	晚餐
晚上7:15 –晚上9:00	构建能力的关键清单问题的*承诺阶段*（第2节）
第2天	
早上7:00 –早上8:00	早餐
上午8:00 –上午10:30	应对冲突的关键清单问题的*创新阶段*（45分钟独立思考，1:45分钟小组讨论）
上午10:30 –上午11:00	休息
上午11:00 –中午12:30	应对冲突的关键清单问题的*承诺阶段*（第1节）
中午12:30 –下午1:30	午餐
下午1:30 –下午3:00	*应对冲突的关键清单问题的承诺阶段*（第2节）
下午3:00 –晚上7:00	非结构化时间（例如，团队可能决定针对其他清单问题进行创新和承诺）

衡量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参与者是否选择在几个月后重新召开今后的清单练习，以便审查进展情况。这将表明他们明白他们拥有影响冲突进程的巨大力量。这也将表明他们决心再次承诺完成在此时需要做的事情，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获胜的可能性。清单练习是一种确认进展，同时应对非暴力冲突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方式。在经历了评估、创新和承诺阶段的力量之后，他们将对再次经历这些阶段的结果充满信心。他们甚至可能希望选出自己的引导员，这将表明他们希望自行召集新的小组。

通过自由清单练习可以大幅增加参与公民抵抗的人数。想象一下，离线和在线研讨会的参与人数[53]每年增加到2500人，并且每个人都学习如何引导36小时的自由清单练习。如果他们承诺每年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五次讨论会，每次有20人参加，那么在四年后生活在最专制政权下的100万人民就会非常了解公民抵抗的潜力。尽管这一数字与地球上数十亿的公民相比显得很小，但对威权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因为这一数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快速上升。

这表明时间的流逝是公民抵抗运动与暴力起义相比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暴力起义领导人必须迅速逆转政权早期的军事优势。他们通过杀死尽可能多的政府安保部队和制造脱党者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如果政府的军事优势不能迅速逆转，那么暴力起义将很快暴露在高级暴力之下，破坏其生存能力。

清单练习是一种确认进展，同时应对非暴力冲突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方式。

相反，非暴力运动可以慢慢来。可以先降级，然后再升级，之后再降级抵抗战术。可以对暴君玩长期消耗游戏，获取战略收益，即使他们的抵抗似乎在公开卷土重来之前已经退缩到私人和家庭空间。在这段时间里，威权主义者需要保持警惕，保持资源投入，这增加了维持控制的成本。

53 如果情况允许，清单练习的最佳选择是举行面对面会议。这将促进参与者之间持续的兴趣和深度互动。但是，如果公共卫生、财政限制或后勤或安全方面的挑战阻碍了面对面会议，人们可以尝试在在线会议平台上组织虚拟练习（如果可能实现，并且能确保通信安全）。参与者使用哪些平台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平台取决于参与者所在国家或地区对平台的可用性和使用安全性。

保持对战场新鲜感的一个方法是多做清单练习。

阅读这本书的暴君(可以预见其中一些人会阅读本书)应该意识到,公民抵抗运动不可能完全消灭。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公民总是可以召集一次自由清单练习。

暴君派他的亲信去夺取武器以对抗暴动。但当面对的是做清单练习的民众,暴君的亲信抓住了什么?试图破坏这些练习的结果可能是那些亲信反而希望成为背叛者。

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的斗争将取决于哪一方有信心继续冲突。自由清单练习让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持续站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到总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地位。即使面对最严重的压迫,异议人士也可以建立团结、多样化战术并与潜在背叛者互动。清单练习向暴君证明最终他必须交出权力。这不仅适用于"温和"暴君,也适用于所有暴君。

最近,世界上最残暴的领导人之一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通过公民抵抗运动被迫下台。他现在正在监狱里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斯蒂芬·祖内斯认为,在分享公民抵抗知识方面,人们付出了大量努力:

> *在革命之前的几年里,一些国际组织为公民社会团体举办了关于公民教育、解决冲突和其他问题的讲习班,这些讲习班可能有助于增强活动家的权能,尽管专门涉及公民抵抗战略和战术的培训仅针对苏丹人。*

在促进非暴力抵抗手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团体之一是非暴力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Nonviolence and Development)[ONAD]。多年来, 本组织在全国各地举办讲习班, 讨论建设和平、性别平等、人权、公民教育、体制发展、善政、冲突解决、宗教间对话和群体进程等问题。鉴于大多数公民社会机构在30年独裁统治以及独裁政权分而治之的战术下被摧毁, 这些看似无关政治的话题最终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除了这些领域的培训外, ONAD还主持举办讲习班, 直接侧重于战略性非暴力行动和在安保部队的袭击和其他挑衅面前保持非暴力纪律。

虽然ONAD制定了自己的课程, 但它受到来自欧洲和印度各团体的培训手册的影响, 其中包括甘地研究所、抗战者国际组织和瑞典和解协会。记录公民抵抗运动的DVD和其他材料, 以及活动家从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等美国教育基金会所学到的经验教训, 也很有价值。ONAD估计, 它直接培训了至少10000人, 间接培训了50000人。该组织对非暴力行动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近70%的培训集中于直接挑战政府和其他压迫性机构。[54]

巴希尔所发生的一切让地区专家大吃一惊, 这并非偶然, 而是教育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了解公民抵抗力量的结果。

ICNC将免费在网上发布这本书, 并将它翻译成多种语言。由于我们预期专制政权将设法阻止其公民在线阅读这本书, 我们也将以灵活的平装本形式进行分发。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将跨越国界, 即使暴君试图阻止, 所有想成为更有效率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人都将能读到它。书的传播不容易被阻断, 一旦进入一个国家, 它就可以被复制和分享。目前, 有一个能使拥有赢得非暴力冲突所需技能的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数量翻千倍的机会。

54 斯蒂芬·祖内斯(Stephen Zunes)《*苏丹2019革命: 公民抵抗的力量*》(*Sudan's 2019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Civil Resistance*)(华盛顿特区: ICNC Press, 2021年), 第14-15页。

目前，暴君可能低估了非暴力冲突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种自满所造成的脆弱性可能威胁到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委内瑞拉和缅甸等最根深蒂固的政权的生存。

6

第六章

历史性的选择：

默许暴政或点燃第四次民主浪潮

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命运将取决于异议人士和暴君之间冲突的结果。据估计，全世界有25亿 人口生活在暴政的祸害之下。无辜公民的生活被不负责任的统治者的反复无常所主宰，而这些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基本人权。这一事实的后果是影响巨大的。历史上许多最恶劣的人类行为都是由暴君制造的压迫和堕落中崛起的暴君犯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暴政已经改变了外表，但其内在动力和行为却保持不变。殖民地帝国与冷战独裁政权不同，后者反过来又与今天依赖技术的现代威权主义者不同。虽然这一区别可能很重要，但它不应使我们忽视暴政的普遍现实，无论它如何呈现给世界。无论暴政在外部人士看来是精通技术、孤立主义、不可预测；神权专制；家长式作风；意识形态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任何两者之间的组合，我们都可以通过它给生活在它之下的人民带来的苦难来识别它。在国内，专制政权创造了以下社会：

- 恐惧无处不在
- 腐败和明显不公平的政策导致财富和极端贫困之间的严重分层

- 工人被剥削而无所依靠
- 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危机更有可能发生，原因是权力拥有者的无能或故意漠不关心
- 个人的资产可以随心所欲地被没收
- 选举不公平、舞弊或不存在
- 司法制度公开存在偏见，服务于精英的利益，而个人则可能被任意拘留
- 媒体和教育环境被宣传和虚假信息所垄断
- 生活在该制度下的人试图挑战或改变该制度的企图遭到严重镇压和系统性的人权侵犯

暴政是国内人民遭受巨大人类苦难的主要原因，而暴政的存在也具有消极的全球后果。非民主政府增加了战争（包括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的发生率，导致暴行、极端主义、人道主义危机、侵犯人权、大规模难民移民和腐败（常常跨越国界）。这些威权主义者的政权增加了国家脆弱性，破坏了社会恢复力的源泉。它们还试图破坏现有的民主制度，并侵蚀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其成员身份改变人权理事会在联合国的使命。一个更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不稳定和危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

在暴君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之间持续的权力竞争中，赢家和输家长期循环往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民主经历了三波浪潮。根据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 *第一次“长”的民主化浪潮始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大部分男性都获得了投票权，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26年，形成了大约29个民主国家。但是，1922年，墨索里尼(Mussolini)在意大利掌权标志着第一次“反向浪潮”的开始，到1942年，这一浪潮已经将世界民*

主国家数量减少到12个。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引发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并在1962年达到顶峰，36个国家实行民主统治，但随后又出现了第二波反向浪潮（1960-1975年），民主国家数量下降到30个。[55]

第三次民主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然后浪潮蔓延到拉丁美洲、亚太、东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根据自由之家的排名，在这一时期（1972–2005年），有35个国家的评级从“不自由”或“部分自由”变成了“自由”。[56]第三次民主浪潮最显著的特征是绝大多数向自由的过渡是通过非暴力的公民抵抗运动实现的。

第三次浪潮的后半程，人们极为乐观。浪潮的精神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开创性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发表于1992年冷战结束后，此时第三次浪潮正在形成新的势头。福山的核心论点是：对于全人类，人类政治组织有一个最终的形态或平衡点，即西方自由民主。

所有政治团体都必须利用其对于获得认可的欲望，同时保护自己免受其破坏性影响。如果当代立宪政府确实找到了一种方式，让所有人都得到承认，但同时又避免了暴政的出现，那么这种政权相对于地球上出现的其他各种政权，对于稳定和持久会有更强的诉求。[57]

不幸的是，自2005年以来，自由之家对世界整体自由度的评分连续15年下降。随着第三次民主浪潮从记忆中消失，威权主义统治及其帮手（腐败治理）的发展似乎势不可挡。毫不奇怪，福山的论点现在被错误地嘲讽为天真的代名词。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反向浪潮结束后是否会迎来第四次民主浪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福山的核心论点最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

55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民主的第三次浪潮”(Democracy's Third Wave)，*《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第2卷，第2期（1991年）：1。

56 卡拉特尼基(Karatnycky)和艾克曼(Ackerman)，第18页。

57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州纽约：Free Press，2006年），第xxi-xxii页。

现实主义者拒绝接受第四次民主浪潮的可能性，认为暴政仍将是世界主导力量。他们认为，既然第三次民主浪潮已经过去，公民抵抗运动不再威胁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与国家权力竞争。

在第三次民主浪潮中，我们曾发现暴君在无数公民抵抗运动中打盹，而现在他们正相互合作，寻找最好的镇压手段。他们现在更善于通过少许公开暴力来巩固权力，通过明智地威胁和使用最低限度的暴力来保持权力。监视和跟踪技术的新用途是对抗公民抵抗的重要防御手段，同时也破坏了保护政治和人权的机构。威权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立法法令结束任期限制、关闭最支持人民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媒体渠道、以及更进一步地监禁或杀害亲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而不因此受惩罚。

现实主义者认为，威权主义现在崛起的关键原因是美国（“自由”的旗手）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反，美国正在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其他敌对独裁政权展开多维竞争。没有美国的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做了如此出色工作的民主促进团体现在正在全面撤退。

> *从越南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美国可以将所有国家转变为统一民主国家的自负已经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认为华盛顿仅应该用来树立一个光辉榜样的观点，是对当代世界危险的忽视。在当今世界，资源有限的团体和个人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国人。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但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58]

58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学习与暴君共处：民主推广的局限性”(Learning to Live with Despots: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omotio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99卷，第2期，（2020年2月10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02-10/learning-live-despots。

对于几乎所有以解释精英行为为重点的地区专家，现实主义的观点根深蒂固。他们很难理解发展基层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基层对于改变暴君抵御非暴力冲突能力的重要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和地区专家在预测公民抵抗运动何时可能开始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他们总是感到惊讶，并倾向于将大规模抗议、罢工和抵制视为偶然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没有任何后果。

地区专家认为，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不会尚未使用暴力就下台。伊朗绿色运动在发生之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就在2011年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爆发起义和占领前，地区专家确信突尼斯事件永远不会蔓延到埃及。在苏丹，奥马尔·巴希尔被剥夺权力并投入监狱似乎是幻想。

现实主义者不会区分失败的暴力起义和失败的非暴力起义的后果。暴力起义在遇到更强的暴君警察和军队的力量时就会被镇压。那些免于处决或坐牢的暴力起义分子在未来几年，甚至永远难以组成统一力量恢复战斗。然而，暴君永远无法完全消灭失败的公民抵抗运动。即使暴君获胜，他们仍然必须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否则他们将失去对民众漠不关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种妥协允许甚至已经奄奄一息的公民抵抗运动在多年后复苏并引领国家走向民主。

现实主义者和地区专家在预测公民抵抗运动何时开始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

在过去十五年的民主倒退中，现实主义者指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消亡证明民主的进步在未来将受到限制。但其他人则认为阿拉伯起义从未结束：

> *2021年，最普遍的信念莫过于阿拉伯起义失败了。独裁政权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都急切地推动这一思想，其吸引力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一切恢复正常。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在将目光转向该地区其他目标时都默认了这一观点—前者转向与伊朗进行核谈判，后者转向实*

现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一信念实际上只是一系列过早结论中的最新一例。尽管阿拉伯起义过早结束，留下了黑暗阴影，但2011年的革命浪潮并非昙花一现。十年过去了，该地区的独裁外表再次破裂。最近发生的大规模起义阻止了这位虚弱的阿尔及利亚总统连任，推翻了长期执政的苏丹领导人，也挑战了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派政治秩序。黎巴嫩在经历了一年的抗议、金融灾难和贝鲁特港口令人费解的爆炸后几乎没有组建政府。沙特阿拉伯目睹了国内的快速变化，准备迎接MBS登上王位。[59]

暴君永远觉得自己的权力还不够，难以确保安全。他们是阿克顿(Acton)勋爵那句臭名昭著的格言的典型代表，“权力往往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们对所统治的人民实施的控制越多，潜在的双重思想者就越有可能增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暴露的双重思想者，最终变成背叛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世界自由度整体减少，民权运动的人数仍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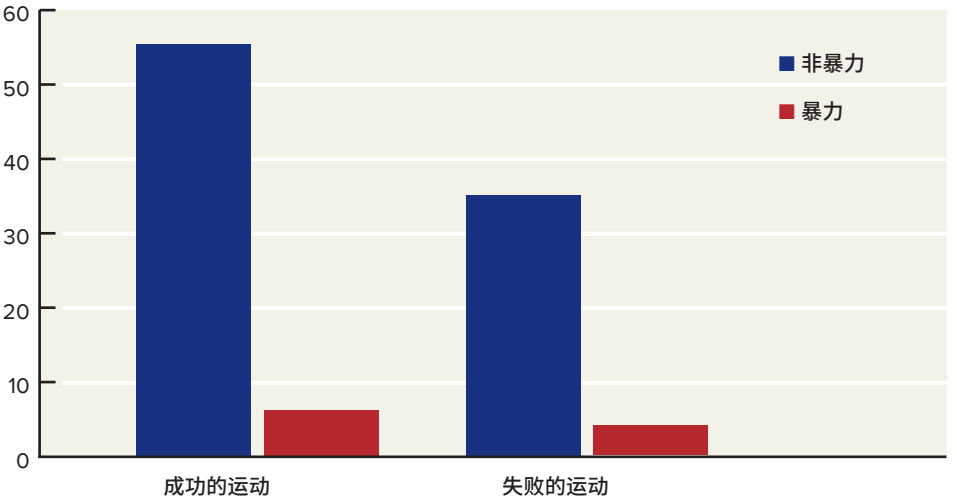
目前，暴君可能低估了非暴力冲突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种自满所造成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威胁到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委内瑞拉和缅甸等极权统治最根深蒂固的政权的生存。

为了准备提出清单问题，我在第二章列出了异议人士首先必须知道的五个理念。然而，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还有第六个理念最有希望帮助到他们(随着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完成自由清单练习，这个想法将变得更加清晰)：独裁者可以摧毁游击队，结束几十年甚至永远的暴力起义，但独裁者永远无法真正结束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公民抵抗运动。最令人鼓舞的研究数据之一是图20，图20显示，即使非暴力冲突未能实现目标，在未来五年内仍有35%的机会实现目标。

59 马克·林奇(Marc Lynch)，“阿拉伯起义从未结束：重塑中东的持久斗争”(The Arab Uprisings Never Ended: The Enduring Struggle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1月/2月）。

图20：一个国家在运动结束的五年后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

来源：埃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杰·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公民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抵抗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纽约州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年)。



那么我们缺乏什么呢？在《非暴力抵抗的未来》中，埃丽卡·切诺维斯提供了证据表明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技能水平正在下降。这包括：

- 公民抵抗运动的公众参与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2.7%下降到今天的1.3%。
- 相对于罢工和抵制等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其他战术，人们过度依赖大规模示威。
- 过度依赖人们自发参与线上组织，而不是规划关键的战术序列。
- 人们越来越愿意与暴力行动者间接联系，认为这将增加成功的机会。[60]

随着非暴力冲突运动的增加，如果不按比例扩大培训，提高成功率的可能性必然会下降。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完成自由清单练习的异议人士数量随着抵抗运动数量的增加而同步增长，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点燃第四次民主浪潮所需要的。

60 切诺维斯(Chenoweth)，《非暴力抵抗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在撰写本文时，美国及其民主（以及某些非民主）盟友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大国冲突正在加剧。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中，媒体专家、智库专业人士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完全专注于通过制裁、军事建设和联盟建设来向威权主义者施压—所有这些都是外部刺激的措施。尽管针对独裁统治的公民抵抗运动令人印象深刻，但对于如何放大暴君可能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人们却很少考虑。

即使是中国（一切暴政之母和民主国家最大的战略威胁）也不能免于这些漏洞。奥维尔·夏伟(Orville Schell)在他的“党的一生：中国共产党(CCP)有多安全?(Life of the Party: How Secure Is the CCP?)”一文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 *也许中国共产党成功建设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不需要自由、正义和自主等古怪的价值观。但现代历史表明，缺少这些元素可能会危及一个国家。想一想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日本帝国、弗朗哥主义西班牙、神权统治的伊朗和苏联。*
>
> *……可能中国人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尤其是西方人?也许有人说，中国公民满足于仅仅获得财富和权力，而不需要其他社会普遍认为作为人类应该拥有的生活要素。这样的假设似乎不现实，而且自以为高人一等。最终，中国人的渴望可能与加拿大人、捷克人、日本人或韩国人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以外的人现在看不到或听不到中国人对于普世价值的高度表达，并不意味着这种愿望不存在。他们只是暂时沉寂下来，这种愿望在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将来必将再次出现。*[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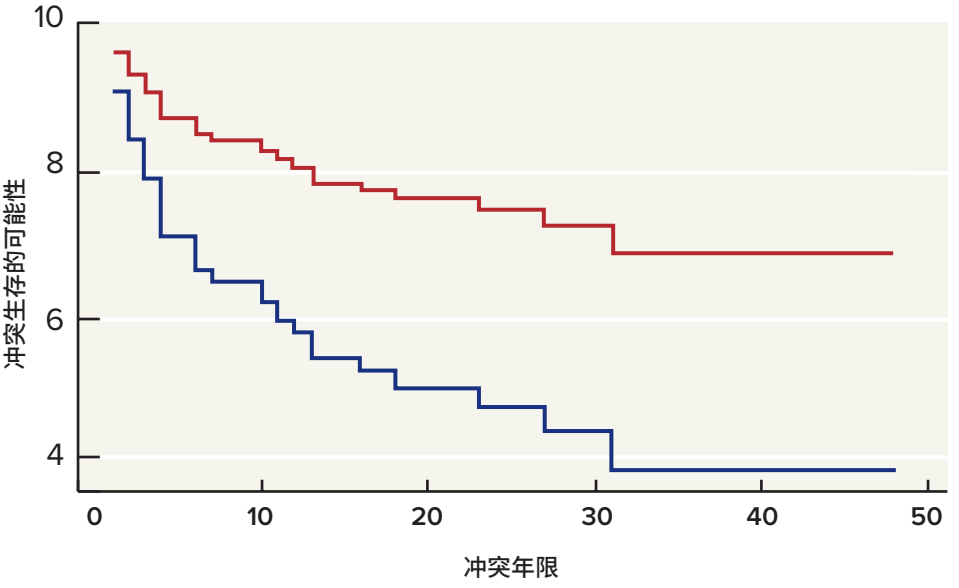
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政策分析家和来自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的媒体需要用新的眼光研究公民抵抗。他们需要抛弃广泛持有的信念，即公民抵抗必定失败，或者更糟，这种抵抗在与一个或多个暴力主体发生冲突时毫无意义。现实主义者最肯定的是，内战不可能引发民主转型。理由是，在如此激烈的暴力冲突结束时，胜利者必然会对失败者实施残酷的独裁统治。然而，卢克·阿布斯分析了近60年来有关内战中非暴力抵抗影响的数据，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61 奥维尔·夏伟(Orville Schell)，“党的一生：中国共产党(CCP)有多安全? (Life of the Party: How Secure Is the CCP?)”*《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7月/8月）：第74–75页。

图21在y轴上显示了内战"存活"的可能性，在x轴上显示了内战持续的年数。数据显示，在所有内战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当出现大规模非暴力运动时，暴力冲突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例如，经过5年的内战，当非暴力运动出现时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比没有暴力运动时高25%左右。[62]

图21：非暴力运动和内战持续时间（1955-2013年）

来源：卢克·阿布斯(Luke Abbs)，*《非暴力抵抗对内战和平转型的影响》(The Impact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War)*（华盛顿特区：ICNC Press，2021年），第33页。



通过政策机会了解外部人士如何帮助培养非暴力运动，这类运动已经形成了有机发展。在*《外部支持在非暴力活动中的作用》*这一研究中，切诺维斯和斯蒂芬最显著的发现是"培训支持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62 阿布斯(Abbs)，*《非暴力抵抗的影响》(The Impact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第38页。

培训是唯一与非暴力运动特点正相关的援助形式。在运动前期尤其如此，这个阶段，高培训率意味着高参与率、低运动伤亡率、安保部队高背叛率。在运动高潮时期，培训也与参与人员规模的增加和运动的最终成功正相关。在所有模型中，培训似乎没有系统的、可观察到的缺点，而且它是所有模型中唯一与运动成功持续正相关的支持形式。[63]

杰出的民主学者拉里·戴尔蒙德指出：

如今，世界陷入了思想、信息和规范的激烈全球竞争。在数字时代，这场竞赛每时每刻都在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并且正在影响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思考。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怀疑和威胁已经越来越大，民主国家输不起这场竞赛。[64]

扭转过去十五年的民主衰落需要异议人士越来越频繁地赢得非暴力冲突。如果要出现第四次民主浪潮，就必须培养远比今天更多的异议人士。

《*结束暴政清单*》为当地异议人士提供了在冲突地区培训同僚的工具，提高了他们“执行战略规划、战术纪律、资源调动和有效威慑国家暴力的能力”。[65]

这本书掌握在异议人士手中，是传播公民抵抗知识的下一步工作指南。在未来每一场非暴力冲突中可用并且战略性应用这一知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平衡，从暴君手里夺回本应属于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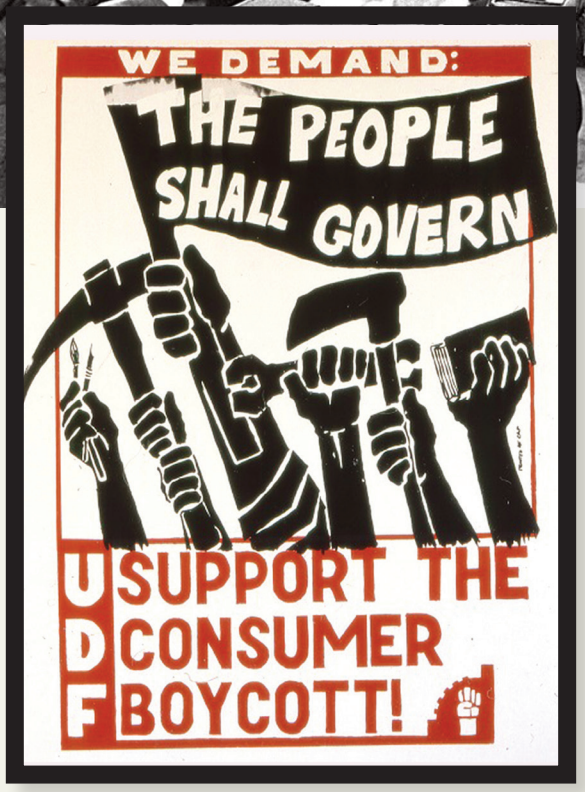
---

63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Chenoweth and Stephan)，《*外部支持的作用*》*(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第65-66页。

64 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美国的沉默帮助独裁者取得胜利”(America's Silence Helps Autocrats Triumph)《*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9年9月6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9/06/americas-silence-helps-autocrats-triumph-democratic-rollback-recession-larry-diamond-ill-winds/#。

65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Chenoweth and Stephan)，《*外部支持的作用*》*(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第67页。

右边：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庆祝1981年波兰农民联盟的成立。



上:1985年, 南非, 姆胡塞利·杰克(Mkhuseli Jack)领导伊丽莎白港消费者抵制种族隔离。

左:用来为抵制活动争取支持的海报。

附录

讲习班和在线课程评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ICNC收到了关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和参与运动相关的大量反馈。应具体要求，我们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和讲习班，还定期组织年度教育项目。这些定期项目包括：

暑期研究所：从2006年到2016年，ICNC与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合作，举办了为期5天和6天的针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公民抵抗讲习班。请参见第137页表17的暑期研习日程示例。

区域研究所：2018年2月，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与几个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在厄瓜多尔基多建立了一个研究非暴力冲突的区域研究所。同年，来自南美洲及其周围11个国家的35名与会者参加了为期六天的研讨会。2018年秋，第二个研究所在乌克兰基辅合作举办，重点针对东欧和中亚，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的40人参加。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与当地合作伙伴组织了第三个研究所，与当地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与异议人士和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分享研究成果、公民抵抗战略和运动经验，吸引了来自12个国家的36名参与者。

在线课程：ICNC于2012年开始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合作运营其旗舰在线课程。[66] “人民的力量：公民抵抗的战略动态”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与者参加为期7周的密集活动，涵盖以下主题：

模块1.课程简介：欢迎和迎新网络研讨会 · 参与者介绍 · 现有知识调查

66 2020年，ICNC开始在罗格斯大学之外开设该课程。

模块2.公民抵抗基金会：什么是公民抵抗？· 公民抵抗的有效性

模块3.全球公民抵抗案例：民族解放案例 · 公民安全与自治案例 · 维权与扩权案例 · 公共责任案例

模块4.公民抵抗的战略与战术：分析纳什维尔午餐柜台运动 · 妇女在公民抵抗中的作用 · 战略规划和战术选择 · 冲突分析工具

模块5.镇压、反作用和背叛：镇压与反作用 · 背叛的运动战略

模块6.暴力侧翼、煽动挑衅者和维持非暴力纪律：暴力侧翼 · 防煽动挑衅者预防指南 · 维持非暴力纪律

模块7.公民抵抗研究新前沿：民主化和公民抵抗 · 反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公民抵抗 · 公民抵抗与信仰社群 · 文化抵抗

模块8.完成本课程：学习收益调查 · 课程评估

除了书面和口头反馈之外，我们的量化数据还强化了ICNC计划校友、受赠人和合作者告诉我们的信息。例如，以下是ICNC为期7周的在线课程“人民力量：公民抵抗的战略动态”，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5至65人参与。为了评估这一课程，ICNC进行了：

- 即时课前评估以识别学员的知识、态度和活动
- 立即进行课程后评估，以便识别学员的知识、态度和活动，从而确定课程所带来的变化
- 课程整体评估，参与者对课程本身提供反馈

表17：暑期研究所日程样本

会议	星期一	星期二	周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 10:30	本周全体学员及教职员简介	非暴力纪律和暴力侧翼 练习–可选活动	镇压与反作用 练习–可选活动	运动中的语言和意义	混乱社会中的民间机构和/或打击暴力非国家行为体
10:30–11:00	休息				
11:00-12:30	公民抵抗简介	公民抵抗运动为何失败?	外部作用和公民抵抗运动	非暴力防御抵抗外来侵略	反腐败运动
12:30 – 2:00	午餐	午餐发言人：彼得·艾克曼	詹姆斯·劳森奖午宴	午餐	集体合影 午餐
2:00 – 3:30	运动的产生与可持续性 练习–可选活动	小组讨论：性别与公民抵抗	休息	休息 **分组课程2：** 建设和平和过渡正义的公民抵抗战略 反对不公正企业行为体公民抵制	巩固成果和民主转型
3:30-4:00	休息	休息	**分组小组** 练习及周中评估	**分组课程3：**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侨民和公民抵抗 暴力极端主义 数字抵制	休息
4:00 – 5:30	战略和战术 练习–可选活动	**分组课程1：** 公民抵抗运动如何以及为何导致背叛? 艺术与文化抵抗 公民抵抗与国际人权	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巡游	**分组课程4：** 公民抵抗的教学、分享和翻译知识 成功运动的媒体报道 晚餐	持续参与和最终评估 自由时间
5:30 – 7:00	晚餐	晚餐			
7:00 – 9:00	“点燃”演示公民抵抗故事	特别嘉宾介绍		自由之夜	毕业典礼及晚宴

- 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后评估，以便我们能够确定课程中的知识如何影响学员随后的选择和行动

以下是我们2018年三个月课程后评估的一些关键发现：

一、受访者表示，在规划和参与公民抵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 94%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ICNC课程后，*他们规划公民抵抗运动的技能*有所提高。
- 94%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ICNC课程后，他们*在公民抵抗运动或培训中更有效地实现了目标*，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效果“更好”（5分制，得分为5分）或显著提高（5分制，得分为4分）。
- 94%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ICNC课程后，他们*在撰写、教授或研究公民抵抗方面更有效率*，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效果“更好”（5分制，得分为5分）或显著提高（5分制，得分为4分）。
- 8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ICNC课程后参加的公民抵抗行动比课程前更有效果*，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参加的公民抵抗行动“效果更好”（5分制，得分为5分）或显著提高（5分制，得分为4分）。

二、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地参与公民抵抗运动，撰写、教授和研究公民抵抗运动。

- 56%的受访者表示，*ICNC的课程对他们随后决定参加公民抵抗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 62%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ICNC课程后，*他们变得更加积极地领导或规划公民抵抗运动*。
- 62%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ICNC课程后，*他们在撰写、教授和研究公民抵抗方面变得更加活跃*。

三、受访者报告说，他们直接应用了课程中介绍的知识，并在课程结束后会回顾这些知识。

课程结束后的即时评估结果：

- 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将课程中的知识应用于*规划公民抵抗运动*。

- 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通过课程获得*有关公民抵抗的培训或教学*知识。
- 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称赞了课程中的*公民抵抗写作*知识。
- 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直接参与非暴力行动时已经应用了从课程中获得的知识。

课程结束三个月后的评估结果：

- 100%的受访者表示，自课程结束以来，*他们曾返回ICNC的电子教室回顾课程材料*至少1-5次，50%的受访者表示曾这样做6–10次，6%的受访者表示曾这样做11–15次。
- 课程中介绍了六个战略规划工具。在课程结束后，不少于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其中每种工具的频率比课程开始前更高*，据报告69%的受访者使用三种规划工具的频率更高。

四、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兴趣在课程后学习公民抵抗，有相当多的人表示，课程结束后三个月，他们发现课程内容比课程刚结束时更有价值。

- 94%的受访者表示，在课程结束后，*他们更有兴趣了解公民抵抗*。
- 44%的受访者表示，在ICNC课程结束三个月后，*他们发现课程内容比课程刚结束时更有价值*。

五、受访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表示，他们在课程结束后保持联系。

- 44%的受访者表示，自课程结束后，*他们曾与至少一名其他课程参与者就公民抵抗问题进行过1-5次沟通*。
- 12%的受访者表示，自课程结束以来进行了6-10次沟通。
- 19%的受访者表示，自课程结束以来进行了超过21次沟通。

ICNC收到的其他量化评估数据证实了这些结论。比如，ICNC于2018年在厄瓜多尔基多成立了为期一周的公民抵抗区域研究所，该研究所的即时评估和一年后评估都显示出类似的结果。[67]查看关键计划结果[68]：

表18：关键计划成果

增加知识	**建设和平概念、理论和案例，使参与者能够融入实地，与其他实践者接触，并设计出更明智的干预措施，反映当前最佳实践和完善的变革理论。**
个人能力建设和专业发展	**参与者在关键任务方面变得更熟练，或者在工作、资助、学术项目方面更具竞争力。**
态度变化、灵感和动力	**鼓励参与者继续在实地工作或为建设和平工作投入时间/资源。**
新项目	**可包括非政府组织、运动、复制培训等，在未参加原始培训的更广泛社区中建立和平，并由原始培训方案（即项目孵化器）内提供的技术援助提供帮助。**
更大的社会资本	**访问校友网络或赞助组织门户** **a. 提高认识/获得机会和资源，使后续行动成为可能，** **b. 允许与其他地区或问题领域的人员合作，扩大较小的举措；以及** **c.传播信息。**
放大声音	**已发表的文章、访谈和通讯要点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参与者的和平建设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受众，让他们能够讲述自己的变革故事（而不是通过捐助者报告或其他调解传播渠道过滤这些故事）。**

67 其中一些结果也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请参阅杰弗里·皮尤(Jeffrey Pugh)的“行动的催化剂：作为和平项目网络平台的培训与教育”(A Catalyst for Actio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s Networking Platforms for Peace Projects)，*《建设和平与发展杂志》(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 Development)*第15卷，第1期（2020年4月）：第127–132页；杰弗里·皮尤，“编织跨国积极分子网络：平衡拉丁美洲非暴力行动的国际和自下而上的能力建设战略(Weav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t Networks: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and Bottom-up Capacity-building Strategies for Nonviolent Action in Latin America)”，《大西洋中部评论拉丁美洲研究》(Middle Atlantic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第2卷，第1期（2018年6月）：第130–144页。

68 皮尤，“行动的催化剂”，第130页。

表格清单

表1：非暴力行动术语：解释……6-7

表2：ICNC资源库中的74种语言……20

表3：ICNC提名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21

表4：异议人士必须知道的5个理念……24

表5：参与者评估的关键结果……34

表6：结束暴政清单……37

表7：41次使用非暴力战术的公民抵抗运动……50–54

表8：援助时间……65

表9：支持类型……66–67

表10：支持者类型……68–69

表11：接受者类型……70–71

表12：1949年至2013年间，有大量女性前线人士参与了95次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77–80

表13：人们服从压迫制度的10个核心原因

表14：安保部队大量背叛的非暴力运动……96

表15：评估阶段：自由进行清单练习……115

表16：36小时的清单练习计划……118

表17：暑期研究所日程样本……137

表18：关键计划成果……140

图表清单

图1：ICNC的变革理论 14

图2：1900-2019年的非暴力和暴力群众运动（每十年的情况） 15

图3：1930-2019年的非暴力和暴力群众运动的成功率（每十年的情况） .. 15

图4：ICNC的全球影响力吸引了各国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新闻记者参与其中 22–23

图5：战场共同观 27

图6：暴力起义：理论 28

图7：暴力起义：风险 29

图8：过渡前的民主水平和过渡后的民主水平 31

图9：按来源地分类的ICNC在线课程学员 33

图10：战场共同观 46

图11：机遇 47

图12：公民抵抗中断 47

图13：公民抵抗获胜 48

图14：按预期影响排序 61

图15：21世纪早期运动的八个历史

图16：参与对竞选成功概率的影响 81

图17：至少有一个公民抵抗导致过渡的国家（1945–2015年） 103

图18：非暴力公民联盟越强大，自由收获越大 107

图19：不同突破的平均民主水平 108

图20：一个国家在运动结束的五年后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 129

图21：非暴力运动和内战持续时间（1955–2013年） 131

照片来源

除了作者和吉恩·夏普在立陶宛的照片外，所有照片都是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

封面摄影人：拉娜·哈伦。

第ii页：摄影人：费提·贝莱德(FETHI BELAID)/通过GETTY IMAGES在AFP平台提供图像。

第iv页：摄影人：辛迪·卡普(CINDY KARP)/通过GETTY IMAGES在CHRONICLE COLLECTION平台提供图像。

第12页：照片由ICNC提供。

第17页：摄影人：谢尔盖·苏平斯基(SERGEI SUPINSKY)/通过GETTY IMAGES在AFP平台提供图像。

第38页：摄影人：贝特曼(BETTMANN)，通过GETTY IMAGES提供图像。

第73页：摄影人：彼得·查尔斯沃思(PETER CHARLESWORTH)/通过GETTY IMAGES在LIGHTROCKET平台提供图像。

第105页：通过GETTY IMAGES在通用历史档案馆/通用图像组(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提供图像。

第133页：摄影人：贝特曼，通过GETTY IMAGES提供图像。

第134页：照片摄影人：以利亚·约卡兹(ELIJAH JOKAZI)，通过《晚邮报》(EVENING POST)/《先驱报》(THE HERALD)/《提索黑星》(TISOBLACKSTAR)提供图像。

第144页：摄影人：布拉卡·纳德兹迪奇(BRACA NADEZDIC)/通过GETTY IMAGES在赫尔顿档案馆(HULTON ARCHIVE)提供图像。

下一页：2000年，塞尔维亚，Otpor联合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MENJAČNICA
GREEN UNION
OF SERBIA!!!
ГОТОВ

结束暴政清单：

培养能力

1.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本着理想、领袖和获胜战略来团结大众？
2.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同时使其战术选择多样化？
3. 公民抵抗运动的战术使用顺序是否基于破坏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4. 公民抵抗运动是否发现了让外部支持更有价值的方法？

应对冲突

5. 面对暴政的公民数量和多样性是否有可能增加？
6. 暴君对暴力镇压效果的信念是否会减弱？
7. 暴君关键支持者中的潜在背叛者是否会增加？
8. 冲突后的政治秩序是否可能与民主价值观出现一致？